

中國現代革命史

中國現代史研究委員會編著

中國現代革命史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9 1044B



~~1010429~~

上海圖書館藏書

中國現代史研究委員會編著

中國現代革命史

每冊實價八角

編著兼發行 中國現代史
研究委員會

經售處 全國各書店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初版(x)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二版(y)

目 錄

第一講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

- 一 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前中國的經濟政治狀況···1
- 二 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及其影響·····6
- 三 太平天國以前的農民戰爭·····12
- 四 太平天國的興起與失敗·····15
- 五 太平天國的制度與政策·····22
- 六 太平天國失敗的教訓·····28

第二講 戊戌政變與義和團運動

- 一 太平天國失敗後帝國主義的侵略和中國經濟政治狀況的變化·····32
- 二 戊戌政變·····43
- 三 義和團運動與八國聯軍·····48

第三講 辛亥革命

- 一 辛亥革命前帝國主義的侵略·····54
- 二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58
- 三 辛亥革命前的滿清統治·····60
- 四 辛亥革命前的革命運動·····62
- 五 辛亥革命的經過·····67
- 六 辛亥革命的失敗·····70
- 七 辛亥革命的經驗與教訓·····73

第四講 五四運動

- 一 五四運動前後中國的形勢.....76
- 二 五四運動的發生及其經過.....85
- 三 五四運動的意義和教訓.....91

第五講 中國共產黨的產生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

- 一 中國無產階級的產生及其特點.....93
- 二 中國共產黨的產生.....97
- 三 中國共產黨在工人中的活動.....101
- 四 『二七』的慘殺的經過.....106
- 五 『二七』的教訓與意義.....111

第六講 中國國民黨的改組與國共合作

- 一 國民黨改組前後及改組中的中國經濟政治狀況.....114
- 二 中國國民黨史的發展及其改組.....117
- 三 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新發展.....122
- 四 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及其對於國民黨的影響.....125
- 五 中共決定國共合作的經過.....128
- 六 國共合作後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132

第七講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

- 一 大革命的開始五卅運動.....141
- 二 大革命第一階段的發展——北伐.....166
- 三 大革命的第三階段.....189
- 四 廣州起義與中國革命新旗幟.....202
- 五 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總結.....221

第一講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

一 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 前中國的經濟政治狀況

要明確估計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必須正確了解太平天國的社會背景，首先是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前中國的經濟政治狀況。

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前，中國正處在滿清統治的時代，當時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

第一 當時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是封建社會經濟結構

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生產條件為土地。滿清皇帝就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地主。滿清皇帝入關後以圈為標幟（圈地）直接搶奪漢族土地，將所掠奪的土地一部分直接管轄，稱為皇室莊田。一部分分給皇族王公，是為宗室莊田（或稱封地），另一部分分配給滿洲軍隊（滿洲八旗），謂之旗地，此外尚

有所謂駐防莊田、屯田、官口（包括繕田、牧田、祭田、及學田），寺廟地等。顯然的，當時的土地大部分操於皇帝、官僚、貴族、地主手中。至於農民，則很少或全無土地。同時，地主兼併農民土地極爲流行，有謂『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爲佃耕之戶，每歲所入，難敷一年口食。』（見湖南巡撫楊錫綬奏書——『皇朝經世文編』卷三九）農民是在號寒啼飢的苦境中。

地主與整個統治階級就利用土地的壟斷來剝削農民。農民向地主貴族租田耕種須以收穫的半數或半數以上繳納給地主，以額外禮物孝敬地主。當地主家中有事或農忙時，佃戶須替地主進行無償勞動。而統治階級更實行徭役制度，當戰爭或皇室需要時，徵調無數農民進行無償的強迫勞動，因此而死亡的農民往往以千萬計。農民就在殘酷的剝削下殘喘着。

當時中國的經濟主要的是自然經濟。農民主要的生產品不是爲了出賣，而是爲了自己的需要和供給地主、官僚的需要，商品生產極少。農民繳納地租主要是用穀麥等農產品。農民的日常用具主要是靠自己製造。生產技術也很落後，耕種土地的工具都是粗劣的犁耙。

至於商業，則已相當發展，特別是鹽和鐵的營業更爲普遍，因此也就形成了不少的商業中心。商人還取得了一種特權，可以進出衙門與官僚勾通一氣。不過商品交換的基礎，一般說，還是地主從農民身上剝削來的物產地租。至於舶來的商品，則多半是供給官僚、貴族需要的奢侈品。關於商業資本的存在，『在榨取農民膏血這一點上，……並不讓於

一切封建代表。……這種原始積蓄形式的商業資本，在中國鄉村中，與封建統治及地主統治有一種特別形式的結合。商業資本借用封建制度剝削農民壓迫農民的中世紀方法。」（斯大林）主要的大商人本身一般的又是地主或官僚，這樣就使商業資本與封建勢力結成密切關係，使商業資本靠封建勢力而存在與發展，而成爲封建經濟的附屬品。此外，因爲商業的相當發展，商行也就形成了。現在尚存在的官商（明末發生），公所（發生於清代），大概就是以前商人基爾特的變相物。但這種商行同樣是在官僚的羽翼下組織起來的，它同樣不能成爲封建的對立物，而僅是封建官僚的附庸。

最後，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前，中國的手工業已有相當發展。手工業主要的是磁業、製鹽業、絹織、鐵器等。但手工業的生產却是小生產規模，工廠手工業才開始出現，一般說來，單純商品經濟的手工業生產佔優勢。手工業行會也已出現，不過行會在政治上異常羸弱，依附與束縛於專制政府。手工業被視爲末業末利，同樣地受地主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的殘酷剝削，並且受到國家的壓抑與限制，加上統治階級對於手工業的包辦（官營工業）與工奴勞役制的施行，使手工業不能順利發展起來。

這一切都說明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前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是封建社會經濟結構。

第二 當時的政治制度是絕對君主專制政體

當時在封建經濟基礎上建築起來的政治制度是絕對的君主專制政體。滿清皇帝爲最高的專制君主，其下設軍機處總

攬一切大權，省、道、府、州、縣則分置總督、巡撫、河道、知府、知州、知縣等官吏，各級官吏由皇帝直接任命。爲着防止漢族的反抗，統治階級一面採用所謂迴避政策——官吏不能在其出身的省內就職，近裁者不得任官於同衙門，一面厲行箝制漢人的政策——官職有所謂『滿漢兩缺之分』，滿人充當之官職，不得以漢人充任，漢人任官時，必同時置一滿人與之拮抗和箝制。爲着愚弄與消磨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思想，使其盡忠於滿清政府，乃廣泛因襲採行科舉制度。

統治階級所依靠武裝力量爲八旗。滿州八旗是滿族的軍隊，爲滿清政府最可靠的武裝力量，分駐於通都重鎮，以控制全中國。此外尚有蒙古八旗（爲蒙古軍隊），漢人八旗與綠營（漢軍）之編制。綠營兵額約六十六萬人，分駐各地關隘。軍隊組織日趨鬆弛，戰鬥力也很薄弱，紀律更壞，隨處掠奪百姓。鴉片戰爭時，調赴廣州之軍隊『奉調之初，沿途劫奪，……甚至指罵長官，擻毆貧民，……避難百姓，指爲漢奸，掠取財物。』（王鈞宰：『金盞浪墨』卷三引『羊城日報』語）鴉片戰爭的失敗，則充分暴露了滿清軍隊之腐敗無能了。雖然如此，但滿清政府却依靠着這一武裝力量來壓迫剝削羣衆，維持其絕對的君主專制政體的統治。

第三 當時對立的階級與階層

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前，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階級對立就是地主和農民。在這一主要階級對立的基礎上形成了當時兩個對立的集團：一方面是皇帝、貴族、官僚、軍官、地主、大商人、士大夫壓迫剝削的集團；另一面是農民、手工業

者、城市貧民、流氓、失學貧苦的知識分子被壓迫被剝削的集團。皇帝本身就是一個大地主，在中國佔領龐大的土地。貴族、官僚本身同樣是一個地主。商人與土地也有密切關係。士大夫在朝爲官僚，在野則爲豪紳地主。這些剝削階層就利用政治與經濟力量，對農民施行超經濟剝削，強佔農民的土地，利用土地的壟斷對農民施行超經濟剝削，使農民（剝削主要的對象）、手工業者、貧民、流氓、貧苦知識分子陷入凍餓死亡深淵中掙扎呻吟。官僚機關吸盡民血，窮括民膏與貪污枉法，使『富貴者諱惡不究，貧賤者銜冤莫伸』（見天地會首領萬大洪討清檄文）。士大夫則漁肉人民，至『權利之趨』（朱琦：『柏硯山房文集』書後、與『倚勢營私而終不知恥』（『養知書屋文集』）。軍隊則『鞭撻貧民』，『榨取財物』。地主利用其政治經濟權力，拚命兼併民田，使『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爲佃耕之戶』。地主商人更『而富戶登場之後，非得善價不肯輕售，實操糧價低昂之權』（『皇世經世文編』）去吮吸民膏。高利貸者的剝削竟至『秀才欠債未清，還不免於杖責，平民可知』（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綱』）。這樣就形成了兩個對立集團的不斷鬥爭。而且，在清朝的統治下，除階級壓迫之外，尚有國內的民族壓迫，滿清政府對於國內任何民族的反抗，均施行最殘酷的壓迫與屠殺。因此，廣大羣衆到處騷動與反抗，爆發了臨清、蘭州、台灣等處的農民貧民暴動以及三點會、捻黨的組織與鬥爭。

這就是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前和外國資本主義正開始東進叩關的時候中國政治經濟概括的圖畫。

二 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及其影響

十九世紀時代，西歐資本主義正在向上發展，積極尋找銷售商品的市場與爭奪殖民地。中國領土的廣大，人口的衆多，天然物產的豐富，就成爲西歐資本主義侵略的最好對象。於是各資本主義國家就開始輸出商品至中國銷售，積極要求與中國通商。可是，當時滿清政府，却處處拒絕與外國通商，固執其閉關自守的政策。這種閉關自守的政策，一方面是反映了中國中古的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對於大工業生產品的頑抗，另一方面，還有一個推動這種政策的主要原因，『就是清朝害怕外國人會扶助大都會中國人在十七世紀前半期或大約在這時期內所有過的那種不滿意滿洲人奴役他們的情緒。』（馬克思）但是，外國資本主義，就以槍炮來粉碎中國的鎖國政策，打開中國的萬里長城了。首先就是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

一 鴉片戰爭

先進的資本主義國——英國，產業革命後，積極向外侵略，在東方依據侵略的大本營東印度公司，首先向中國侵略，經過廣州與中國進行貿易。當時英國輸入中國主要的商品是棉織品與鴉片，而特別是鴉片。自一八三〇年起，由印度輸入中國的鴉片與日俱增，佔其對華輸入貿易額百分之六十以上。鴉片輸入中國的結果，使中國紋銀外溢，銀價暴漲。據統計：一八二一至一八三九年中國因輸入鴉片而外溢的金

銀竟達三萬萬兩以上。另一統計：一八二七至一八三三年中國金銀出口約達三千七百萬以上。至一八三三年後，金銀外溢更甚厲害了。就在一八三八年一年中，中國流出的金銀竟達一千萬以上。這樣，便直接影響滿清政府財政收入的銳減，造成當時的財政危機，此外，使人民生活受到惡劣的影響與鴉片流毒的薰染，同時也更加強了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對農民手工業者的榨取。而且，遠在鴉片戰爭以前，外人也早已直接間接地參加了對於中國人民的高利貸榨取了。

當時，滿清政府在輿論的壓迫下採取嚴厲禁烟的辦法，禁絕鴉片的輸入。一八三八年十一月兩廣總督林則徐任欽差大臣赴廣州查辦海口，以杜絕鴉片之輸入。林則徐抵粵時，首先捕殺與英商勾結之華商數名示戒並迫令英商交出鴉片，全數付諸燒毀。於是鴉片戰爭就爆發了。

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英國海陸軍攻廣州、廈門未克，轉攻浙江，陷定海，圍寧波，七月窺渤海，入大沽口，清廷遂與英議和，罷林則徐職，另以琦善為欽差大臣，琦善至粵，遂撤守備，英國要求因更苛刻。十二月『和議草約』擬就，英又有遠軍行動，清廷復議主戰。英軍陷虎門，佔珠江要塞，清廷乃又求和。當時和議已成，但英軍藉口清廷索肯定答覆六項要求及割讓香港之約，而又進兵。一八四二年四月至六月，英國先後陷吳淞、上海、鎮江、直逼南京。清廷大震，遂與英議和，七月清政府與英訂條約十三條於南京，即『南京條約』。主要內容是：

- 一、由清政府納賠款二千一百萬兩與英政府；
- 二、永遠割讓香港予英國；

三，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並許英國人民帶眷屬寄居，設立領事館；
四，英貨入口照例納稅後（稅則須秉公議定），准由中國商人運運內地，所過關口，不得重加課稅。

『南京條約』訂立後，美法兩國趁火打劫，要求利益均霑，滿清政府於是又與美法締結中美條約、中法條約（一八四四年），這兩種條約的訂立就確立了美法在華的領事裁判權。

由於滿清朝廷及其軍隊的腐敗不堪，鴉片戰爭是慘敗了，然而這戰爭還是表現了中國民族的抵抗力。一般的滿清軍隊固然腐敗，可是英軍除了在廣州遇到軍隊和民衆之頑強的抵抗外，當英軍逼近鎮江城的時候，中國軍隊也有一幕英勇的抵抗。事後很久，恩格斯這樣描寫過：那裏的中國軍隊『總數只有一千五百人，但他們却勇敢拚死地應戰，直至全軍覆沒為止。在應戰以前，他們好像早已料到戰鬥的結局：而將自己的妻子兒女絞死或淹死……清軍副都統，看見戰鬥已遭失敗，遂焚燒了自己的房屋，本人也投火死了。在這次戰鬥中，英軍損失了一百八十人。』

在戰爭中，廣東民衆平英團數萬人的組織及各地民衆自衛的再接再起，尤為當時中華民族不可滅亡的明證。當時中國沒有變成第二印度，並不是偶然的。

二 英法聯軍與中俄事件

鴉片戰爭及戰後，廣州羣衆反英運動（組織平英團等）興起，曾給英人以重創，南京條約雖已訂立，但英人仍不得

入廣州。在鴉片戰爭後，南方經常地進行了反對外國侵略的鬥爭。正如恩格斯所說的：「……民衆是積極地而且是狂熱地參加反對外人的鬥爭。」這種鬥爭，大都是採用那種原始的行動。這種原始的行動，正像恩格斯所說了的，『我們最好不要像英國貴族的報紙那樣去斥責華人可怕的殘暴行動，而來承認這是爭取自己生存的戰爭，這是謀保存中華民族的民族的人民戰爭。……對於奮起的民族在人民戰爭中所採取據手段，不應根據通常進行戰爭的公認法則的觀點，或者根據某種抽象的標準加以估計，而只應根據這個奮起的人民所已達到的那種文明程度的觀點來加以估計。』一八五六年，英國藉口亞羅船事件，攻陷廣州，『為着保護該處的船隻，而與華舉行第二次戰爭』，但終因廣州羣衆之反英鬥爭壓迫，的又退出廣州。一八五七年十一月英法（法藉口牧師在廣西被害）組織聯軍再陷廣州，俘總督葉名琛。一八五八年三月對該聯軍北犯，入大沽口，攻陷砲台，清政府求和，與英訂被天津條約。『天津條約』簽字後，規定次年在北京交換並批准條約，但當一八五九年英法公使抵京時，清政府因拒絕軍艦護送公使入口，於是英法聯軍再陷天津、北京，清政府乃又與英法議和，訂立『北京條約』（一八六〇年）。

當時帝俄在戰爭快完的時候就出來干預，結果，借口調停有功，迫清政府訂立『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北京條約』。此外，更乘英法聯軍之役，滿清政府無暇北顧之際，佔領了黑龍江以北之中國領土，事後則強迫滿清政府與之訂立『愛璦條約』，承認其已得利益。

『天津條約』主要內容是：（一）『南京條約』繼續有

效；（二）開牛莊、登州、台灣、潮州、瓊州爲商埠；（三）英國人民訟案，不論人產均歸領事辦理；（四）英國人民得在中國內地遊歷，長江流域各口英國商船可自由通商；（五）准英國耶穌教徒及天主教徒自由傳教；（六）賠款四百萬兩；（七）承認釐稅協定（值百抽五），中國政府不經各國承認不能增加關稅。當時與法國訂立之條約大略與中英『天津條約』相同，條約中并承認法國爲最（國）；賠償法國軍費二百萬元。

『北京條約』內容爲：（一）『天津條約』繼續有效；（二）增開天津爲商埠；（三）割讓九龍半島爲英國領地；（四）賠償英法軍費及損失費增至八百萬兩。

『中俄天津條約』主要的是准許俄國在華自由通商並設立領事館。『中俄北京條約』最中心內容是：將烏蘇里江以東土地割讓給俄國。『愛琿條約』（一八五八年四月訂立）主要內容：第一，黑龍江以北，爲俄國領地；第二，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只准中俄兩國船舶通航及兩國人民貿易。

三 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的影響

『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愛琿條約』的訂立，使中國喪失了許多權利，而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則攫取了在華的各種利益和特權。

第一，兩次戰爭的失敗，賠款達三千餘萬兩，使中國財源外溢，而外國資本主義却因此而淪得鉅量財富。

第二，中國喪失了香港九龍，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

東的廣大領土，而外國資本主義却取得了侵略中國的據點。

第三，開闢許多商埠，使外國商品可通行無阻的在中國推銷，用「價廉物美的射擊力」來掠奪中國。

第四，喪失了關稅自主的權利，使中國無權提高關稅，失却了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一種保障，而外國資本主義却可以順利的在中國實行不等價的交換。

第五，承認領事裁判權，外人可以在中國胡作妄為，准許外人自由在中國遊歷考察和傳教，從此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偵探尖兵，便可深入中國腹地了。

第六，允許外國軍艦商船在中國內河航行，實際就是准許外國武裝力量在中國內地自由行動，此後外國資本主義國家便可以隨時以武裝力量來威脅中國，控制中國。

最後，還訂立了所謂特惠條文，給外國以特惠權，外國資本主義取得了在華的各種特權，就更進一步向中國伸展其侵略的血手，首先是商品的大量輸入中國內地，使中國手工業日趨破產，農村經濟也迅速沒落，廣大的農民與手工業者在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下與中國統治階級加強的剝削下，走上失地失業的途徑。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的另外一個影響，就是滿清政府為着償清巨額的賠款，加強了對廣大羣衆的剝削，使人民生活進一步的惡化悲慘，使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間的鬥爭進一步的尖銳化。

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在中國整個政治與經濟生活中顯然就產生了兩種不同的趨勢：一面是滿清政府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壓力下屈服投降，逐漸走向依靠外國資本主義來支持其統治的趨勢；另一方面就是廣大的民衆在外國資本主義與滿

清統治的壓迫剝削下，開展着廣大的反對滿清統治的羣衆運動。

三 太平天國以前的農民戰爭

滿清政府入關時，曾用殘暴的手段屠殺反抗滿清統治的漢族（『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最著名的虐殺），以鞏固其統治。但在滿清政府殘暴的剝削下，中國農民反對滿清和地主的鬥爭遠在太平天國以前就已興起，掀起連綿不斷的農民戰爭，這些農民戰爭，正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先驅。

一 太平天國前農民戰爭的經過

一七七四年山東兗州貧民數千舉行起義，攻陷壽張、堂邑、陽谷各縣，圍攻臨清，領導者爲王倫。

一七八一年甘肅回民在馬明心的領導下企圖起義，結果領導者爲統治階級捕獲，於是回民羣起起義，圍攻蘭州，與滿清統治血戰數月。至一七八三年甘肅回民以爲馬明心復仇和號召，又起義於通渭之石峯堡。

一七八六年台灣之林爽文領導黎民起義於鳳山，攻陷彰化、蔴羅、淡水等縣，不斷與統治階級搏戰。

一七九五年湘西邊之苗民因反對統治階級之強佔土地而發動鬥爭，陷乾州，攻辰靖、秀山、松桃、銅仁等地，前後與滿清政府軍隊抗戰十餘年。

這些起義後來均爲滿清政府鎮壓下去了。可是繼之而起

的就是一七九三至一八〇二年北方五省著名的白蓮教暴動。

白蓮教本是元末漢族志士假借佛教迷信以驅逐胡元爲宗旨的一種祕密結社，力量頗大，明代參加白蓮教的農民貧民竟達二三百萬。至滿清統治中國時，白蓮教在『興漢滅滿』口號下進行反對滿清政府的鬥爭，一時附從者極衆。乾隆末年，河南白蓮教首劉之協等奉一小童假稱明裔李姓，密謀起事。一七九三年（隆乾五十八年）稟發，教徒多被誅殺，惟劉之協脫逃，清廷下令窮索，宜、荆被株連者數千人，於是白蓮教的暴動遂起，荊州、襄陽首先起義，未及數月，暴動蔓延及湖北、四川、陝西、河南、甘肅各省，起義羣衆到處沒收地主官僚的財產，並與滿清統治者搏戰，戰爭堅持了將近十年，始失敗。

北方白蓮教起義失敗後，接着在南方又有『海寇』的騷動，南方海寇爲失地失業農民與貧民聚集而成，以閩海粵海爲根據地。一八〇三年首領蔡牽率隊攻浙境。一八〇七年又與清軍戰於粵海，至一八〇九年始被清軍消滅。

不久在北方又爆發天理教的起義，天理教原是白蓮教的一支，遍布於晉、豫、魯等省，以李文成、林清爲領袖，加入者達數萬人，以貧農手工業者居多。一八一三年因李文成被捕下獄，暴動遂起，起義羣衆攻破滑縣劫出文成，同時林清亦在京師起事。起義區域蔓延及魯、冀、豫各省。

最後，在南方流行着天地會（又稱三合會或稱三點會）的組織，由福建而普遍到珠江流域及長江流域，由狹小的『亡國志士』的組織而發展成爲廣大羣衆的組織，在南方曾進行不斷的鬥爭，其目的在於『吾人討滅仇敵，恢復明朝。』

(見天地會書文)

此外，在太平天國前，各地尚發生不少零碎的起義，如陝西省三才峽的箱工起義，江西胡秉輝之亂，一八二二年八月河南教民的起義，一八三五年山西趙城的教民起義，一八三六年湖南武岡教民的起事，一八三八年貴州謝法真的起義，湖北崇陽的農民鬥爭，湖南茶陽的農民起義等。

二 當時農民戰爭的特性和失敗

太平天國前的農民戰爭顯然是滿清腐敗的橫暴的統治下，一種反對滿清統治的鬥爭。這一種戰爭帶着濃厚的宗教色彩與原始暴動形式的特性。不論是白蓮教、天理教、天地會都以迷信去團聚羣衆，暴動發動後羣衆很多發展成爲一種搶掠的行爲，並盡其破壞之能事以洩憤，這是當時社會背景的限制與農民落後意識的反映。

當時的農民戰爭是表現了極端缺乏組織性的。各個起義隊伍中本身極其渙散，而各個起義隊伍互相間又毫無聯系，更沒有統一的指揮。因爲，『農民的散漫，很使他們共同的合作發生困難』。同時又無明確的政治綱領，所謂『反清復明』僅是一種籠統的鬥爭目標，而沒有明確的具體的能動員羣衆參加鬥爭的行爲綱領。這些弱點都是由於當時中國沒有先進的階級與革命的政黨領導的關係。也正是存在着這些特性，就使滿清統治階級易於用各個擊破的策略來撲滅起義。

當時的農民戰爭雖然此起彼伏尚綿延了五六十年。雖然戰爭的區域普及至南方與北方各省，可是結果都失敗了。失敗原因除了本身存在的各種弱點外，在客觀上還是由於滿清

政府的兇殘的鎮壓。當時統治階級除調動正規軍隊外，更組織豪紳地主的武裝（鄉勇）協剿農民的暴動，用殘酷的屠殺對付起義農民，如對天地會的刑律，治以『謀叛未行律』，後經訂則加爲『斬絞』，最後更加至不問首從『都立斬』，以至自譚啟劉之協案在荆宜便株連數千人，對付天理教的暴動便『除教匪殲除外，良民被戮者二萬餘人』。（見國史第十一冊）

屠殺是不能解決農民戰爭興起的根本原因的，因此接踵而來的就是更廣泛的，更有力的農民戰爭——太平天國。

四 太平天國的興起與失敗

一 中國過去歷史在新週期的再現

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對於地方生產的破壞，對外戰爭賠款的負擔，舊稅是更加繁重起來，而新稅又見增設，農民日益貧困不堪，日益陷在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的剝削下，而土地則愈益集中在地主的手裏。在中國過去歷史上幾乎每二百年一週的農業大饑荒（這種饑荒，完全是人爲的剝削的發展所造成的），在這時，便以加緊的速度再現出來。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〇年全中國不斷爆發大災荒，被災區域在黃河流域有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六省，長江流域有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蘇、浙江等省。災荒種類包括旱災、水災、風災、風沙災、雹災、歉收等。以至『當此苦旱異常，小民顛沛情形，不忍設想』、道光朝『東

華續錄』卷五十六。在廣西則於一八四九年爆發食糧騰貴的恐慌，餓民顛沛流離無所依歸，在『劫富救貧』的口號下，掀起了成千累萬飢民的鬥爭和騷動。

這裏，我們又正可以看到中國過去歷史，幾乎每二百年一週緊接着農業大飢荒所形成的政治大恐慌——農民大起義，在這時候，也正以更新穎的形式再顯現出來。

當然，不能把這次太平起義和過去歷史上的農民戰爭一樣看待。問題是中國已不是簡單閉關自守的中國了。海禁已開放，中國農民的敵人，已不限於舊的剝削者，而且有新來的民族敵人，而且中國社會已在醞釀着新的變動，在這時候，農民戰爭恰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序幕，在客觀上正是更明顯地謀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的。

太平運動是在鴉片戰爭後，在那首先和西洋資本主義接觸的南方爆發起來的，而經過英法聯軍之役清朝可恥的喪權辱國，這個運動就更加磅礴和瀾漫。在一八五八年，恩格斯這樣寫過：『一些動搖不定的亞洲帝國，一個一個地變成歐人營業精神的犧牲品，我們這裏又看到這樣的一個亞洲帝國，這個帝國，極其衰弱，極其殘破，它甚至沒有力量來渡過人民革命的危機，甚至武裝起義的劇烈爆發，在這個帝國內也變成了慢性的和顯然不可治療的痼疾。這個帝國，已極其腐化，它未必能夠在什麼地方約束本國民衆或抵抗外國的侵入。』（『俄國在遠東之成功』）是的，中國人民經過歐人的打擊，已在開始覺悟腐化不堪的滿洲朝廷不能成為自己民族的保護者，他們已開始覺悟自救更生的必要，太平運動就是用原始形式表現出來的第一次大規模的中國人民的民族自

救更生運動。

二 太平軍的起義

太平天國是以上帝會的形式去組織羣衆：『朱九疇倡上帝會，誓以恢復明室爲志，洪秀全與同邑馮雲山往師事之。九疇死，秀全被推爲教主……後以傳教遊廣西，居鵬化山。』一八四四年洪秀全入廣西，以教學爲名，進行組織上帝會的活動。至一八五〇年，上帝會的勢力在廣西有了極大的發展。一八五〇年因鵬隘山（桂平屬）燒炭工人（上帝會羣衆）反抗官吏索勒，而直接引起金田（桂平屬）的起義。一八五一年二月太平軍東出大黃江（洪秀全在此稱太平王），後又折回。復擊敗清軍於平南，乃北出佔永安州，建太平天國於永安。洪秀全稱天王，封楊秀清爲東王，蕭朝貴爲西王，馮雲山爲南王，韋昌輝爲北王，石達開爲翼王，秦日綱胡以晃任丞相軍師等職。

一八五二年二月，太平軍棄永安北出，大敗清軍，進逼桂林，出興安陷全州；直入湖南攻克道州、江華、寧遠、嘉禾、桂陽、柳州等地，逕趨長沙。圍攻長沙兩月餘不能下，乃轉陷岳州。佔岳州後又下長江，佔漢陽、武昌，復沿江直下，佔九江、安慶。一八五三年一月佔金陵，建國都於此，號稱天京。當時太平軍銳不可當，清軍望風披靡；沿途太平軍陸續發出『奉天誅妖檄』、『諭救世人檄文』、『奉天討胡檄文』以號召羣衆，此時加入太平軍的羣衆極衆，太平軍出湖南時不過數萬人，及至長江流域則逾二百餘萬人了。

當太平軍攻佔南京時，滿清政府的反動武裝有所謂江甯

大營與江北大營，分駐金陵城東之孝陵衛和揚州，以與太平軍對抗。一八五五年太平軍攻下揚州，摧毀了敵人的江北大營。一八五六年江南大營亦被太平軍攻陷。此時滿清統治正如風中殘燭了。

太平軍定都南京後，在軍事上繼續舉兵北伐。分兩路由林鳳翔、李開芳統率。北伐軍首先佔領江蘇鎮江、揚州等地，再由臨淮進逼滁州，陷鳳陽，入河南渡黃河，轉山西入直隸為清軍所敗，乃進襲天津又敗退，守靜海、獨流鎮、楊柳清等處；後來林李均遭擒，黃河北岸之北伐軍全被覆滅。這是太平軍軍事上第一次所遭受的重大打擊。

林李北伐出師後，太平天國又分遣胡以晃等西攻皖贛、以爭長江上游。以晃軍入安徽再克安慶，乃分兵攻南昌、九江、侵入湖北，復取漢陽、武昌。湘軍興起時石達開部又大破湘軍，三克武昌、漢陽。

這時上江上游重鎮均落於太平天國之手，正是太平天國的全盛時期。

三 太平天國內部的衝突與瓦解

太平軍進駐南京後，偏安享樂的太平觀點便發展起來了；太平天國領袖也日趨墮落腐化了！建都南京後不去利用當時有利的時機，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反而偏安享樂。當時的領袖『今踞江南為繁華迷惑，養尊處優，專務於聲色貨利』（『賊情彙編』卷六）。對於太平天國的各種政策也沒有切實執行，開始走向『禁令則徒立科條，軍務則全憑文告，氣脈不通，已成麻痺不仁之象』（同上）。在領袖間則『往之

僑爲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蹶隔，猜忌日生」（同上）。於是太平天國就發生內訌，爆發楊韋之變。

建都南京後，洪秀全深居簡出，軍政事宜均取決於馮秀清，於是秀清大權在手，威壓全朝，引起秀全之猜疑，一八五六年七月，秀全與昌輝合謀，謀殺秀清及其全家與衆徒。石達開在安慶聞訊逃歸，責昌輝殘殺過甚，昌輝又謀殺達開，事洩，達開乘夜出走，昌輝乃殺達開全家。達開至安慶，召兵靖難，師次寧國，秀全大恐，乃殺昌輝以謝達開。達開至京後，秀全對達開又起猜疑之心，乃用其兄以款賊軍，達開被迫，遂逃回南京，另成一軍，別圖發展。從此，太平天國就日益向瓦解沒落的道路上前進。於是「自翼王出京之後，殺東、北王之後，至蒙得恩手上辦事，人心散變，做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專，因東、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那時各有散意……，因聞清朝將兵，凡拿是廣西之人，斬而不赦，是以各結爲團，故未散也」（『李秀成供狀』）。

這說明太平天國已經日趨崩潰，後起的英王陳玉成與忠王李秀成，雖則忠勇無雙，雄才大略，不斷地戰勝過敵人，企圖挽救太平天國的命運，然而更歸無效了。

四 反革命的反攻與太平軍的失敗

在太平天國內部的衝突，偏安享樂的情形下，反動的滿清政府就能够在組織其反動武裝，對革命勢力施行反攻。

太平天國的發展，促使滿清政府、地主、官僚、商人和列強結成反對革命的陣綫，一致反對太平天國，他們組織了

許多地方的反動武裝與太平軍相抵抗，其中以湘軍淮軍爲主力。

一八五二年曾國藩以湖南巡撫張亮基所檄調的湘鄉團丁爲基礎，成立湘軍於長沙。一八五四年二月湘軍水陸沿江而下，建旗東征，爲太平軍擊敗於岳州與靖港。至七月湘軍始克岳州，復武昌，進逼九江，與太平軍主力石達開部激戰，爲太平軍擊敗，水軍被太平軍封鎖於鄱陽湖，太平軍乘勝三克武漢。而湘軍遂處於危殆之境。

反太平天國的反動武裝的主力除湘軍外，尙有淮軍，主要的領導者爲李鴻章。後來，太平軍在浙江方面勝利的發展時，江蘇紳士請求援師，曾國藩乃奏遣李鴻章率淮軍赴上海。此後淮軍在帝國主義的援助下，就成爲東南一支反太平天國最有力的軍隊，與上游的湘軍東西呼應，夾擊太平軍。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同時也威脅着列強，於是英、法、美等國在天津條約締結後便與滿清政府合作，共同來進攻革命了。當太平天國進攻淞滬一帶時，蘇淞道尹吳熙募勇數千，請美人華爾教練統率，號爲『常勝軍』，又名『洋槍隊』。華爾死後，美人白齊文代之，最後由英人戈登統率。一八六二年，李鴻章率淮軍抵滬時，更擴大常勝軍的組織，以後常勝軍便參加江浙一帶的戰爭，常破太平軍。後來李鴻章恢復淞滬，亦全得助於常勝軍。

正當太平天國內部互相殘殺之際，反革命開始向革命勢力反攻了！一八五六年十一月曾國藩之湘軍克武昌，清軍略漢陽。一八五八年四月湘軍佔領九江，兩湖與江西全入湘軍之手。這時太平軍雖在長江下游仍着着勝利，但總的形勢已

陷入退守被迫的局面了。一八六一年湘軍攻陷安慶。太平軍健將陳玉成援安慶失敗後，退守廬州，復敗至壽春，結果遭擒殺。曾國藩在陷安慶後，分三路進攻太平軍：曾國荃攻取金陵；左宗棠取全浙；李鴻章取蘇淞。一八六二年——一八六四年常勝軍與李鴻章部克蘇州、常州。一八六四年左宗棠陷杭州，江浙各郡縣均次第落入清軍之手。曾國荃全部早已抵金陵城外圍困金陵。李秀成部曾與湘軍激戰，但均不奏效。

南京被圍，城中糧食久絕，秀全見大勢已去，乃於一八六四年末服毒自盡。六月十八日地道炸發，湘軍衝入南京，當時城中尚有太平軍十餘萬，兩軍遂進行劇烈的巷戰，太平軍十餘萬人全部戰死，無一士一卒投降，南京遂陷；秀全逃出，旋亦於鄉間遭擒。

太平軍的另一支康王汪海洋部，自杭州陷後，走安徽入江西，至閩邊，旋又敗入粵之嘉應州，一八六五年為清廷消滅。太平軍李世賢部，一八六五年敗入福建，據漳州後亦為清軍撲滅。

在北方之太平軍，賴汝光、陳得才兩部，轉戰於冀、魯、晉、陝各地，卒被消滅。西方之石達開部從南京出走後，馳騁於皖、贛、浙、湘、桂、黔等省。後由滇入川，至大渡河，為清軍困於河邊。一八六三年南京尚未陷落時，便已被清軍消滅了。

南京陷落時，太平天國已遭受決定的失敗，至此十五年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便完全失敗了。

五 太平天國的制度與政策

一 太平天國的階級性與民族性

太平天國是民族的資產階級性的農民戰爭。參加革命運動的基本羣衆爲農民，雖然領導人物爲知識份子——洪秀全、馮雲山等，雖然也有富農份子韋昌輝、石達開、胡以晃等參加。洪秀全供狀曾說：『天王常在深山內藏，密告世人敬拜上帝。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從，或十家八家肯從，也有讀書明白之士子不從；從者俱是農夫之家，窮苦之家，積多結成聚衆。』後來太平軍進入長江流域等地，參加太平軍的廣大羣衆，還是因天災人禍而凍餓流離的農民。另一記載當時安徽的情形文件說：『皖省賊匪因年荒糧盡，竄會饑民數十萬，由黃梅……等處間道上竄。』（『見賊情彙纂』）太平天國之所以能夠支持十五年，也就是廣大農民不斷的參加鬥爭。太平天國的制度與政策也就是農民要求的反映。

太平天國是反對滿族壓迫、爭取漢族獨立解放的民族的農民戰爭。這在『奉天討胡檄』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慨自滿洲肆虐，混亂中國，而中國以六合之大，九洲之衆，一任其蹂躪，而恬不爲怪，中國尙得爲有人乎？妖氛虐燄燿蒼穹，淫毒穢交極，腥風播于四海，妖氣慘於五胡，而中國之人反低首下心，甘爲臣僕，甚矣哉，中國之無人也！……中國有中國之形像，今滿洲悉令削髮，拖一長尾於後，是使中

國之人變爲禽獸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民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爲妖康熙暗令韃子一人管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欲中國之人盡爲樹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爲奴爲妾，三千粉黛，均爲羈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言之痛心，談之汚舌，是令中國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洲造妖魔條律，使我中國之人無能脫其網羅，無所措其手足，喙令中國之男兒而脅制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言語，今滿洲造爲京腔，更中國音，是欲以胡言漢語惑中國也。凡有水旱，略不憐卹，坐視其餓殍流離，暴露無葬，是欲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汚吏，布滿天下，便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旁，是欲我中國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道，貧民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俊抑鬱而死也。凡有起義復興中國者，動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謀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欺侮中國者，無所不用其極，巧矣哉！……昔文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諸公之所熟聞也。予總料滿洲之衆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衆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萬受制於十萬之衆，亦孔之醜矣！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復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予與義兵，上爲上帝報晴天之仇，下爲中國解下首之苦，務期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從這一檄文中以及太平軍的行動中，都說明了太平天國雖然是一種農民戰爭，可是由於當時外國勢力的侵入，更促成了中國人民對於反抗滿族壓迫的覺醒，而新的

更大的民族危機的到來，像上面已提到的，也使中國人民覺醒到需要首先推翻滿清的壓迫，以謀民族的自救，這樣，就使這一農民戰爭塗上了濃厚的民族的色彩。也由於太平天國帶上了民族的色彩，就使這種運動更爲廣泛。

二 太平天國的原始共產主義烏托邦

當時廣大農民生活的悲慘，刺激農民不僅對當時的統治不滿與反抗，而且使農民幻想一個新的社會，幻想恢復原始農村公社時代的制度。這種幻想就是太平天國所倡議的社會制度。太平天國所理想的社會是一種原始的共產主義烏托邦，這種烏托邦的單位的圖畫是：

以二十五家爲一個農村公社的單位，『凡二十五家中設國庫一，禮拜堂一，兩司馬居之。』在這一公社裏是『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所以『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具，但有限制，不得多用一錢。』國庫是村中的公產機關。農民多餘的農產品要繳到國庫保存，『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餘則歸國庫。』此外『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屬伍長及伍卒爲之，農隙治事。』在這社會裏買賣婚姻是沒有的，『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同時『婚娶吉期等事，總是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舊時歪例劃除。』在教育方面則『童子俱日至禮拜堂，兩司馬教讀「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及「真命認旨書」焉。』每禮拜日要『至禮拜堂分別行男女行聽講道理』（均見『天朝田賦制度』）。

這種理想的社會首先試用於太平軍的軍制上，因此太平

軍一方面是軍事組織，同時，又是一種羣衆組織與行政的組織。在軍隊中設有聖庫。洪秀全所下的詔令寫道：「衆兵將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官長也無薪俸，「僞官雖貴爲王侯，並無常俸，惟食肉有制。」更「立諸匠營及各典官，使被脅百工技藝各有所歸，各效其職役。」（見『賊情彙纂』）當然，這種理想的社會制度除在軍隊中多少實行外，是沒有而且也不能實行的。

這種理想社會帶着濃厚的宗教色彩，認爲「天下皆是上主皇上帝一大家，……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降臨也。」因此，更設禮拜堂嚴禮拜，要「頌讚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見『天朝田畝制度』）而太平軍所到之處，則『引飯馮驩，傳集兵衆或百姓，於何日何時何處聽講道源。』這種理想社會，固然反映農民對過去農村公社的追憶，可是新宗教色彩與民主思想的滲入，却又是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的影響。

三 太平天國的政策

太平天國在各方面的政策，是多少染有上述的烏托邦共產主義的色彩的。在土地問題上，太平天國會頒布『天朝田畝制度』，廢除土地私有制度，實行土地國有，不僅多餘的農產品須繳歸聖庫，同時人民所受之田亦不得認爲個人私業。認爲『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處，……務使……有田同耕，……無處不均匀，無人不

他族。』……」

在土地分配上，把土地分成九等：分爲上上田，上中田，上中下田；中上田，中中田，中下田；下上田，下中田，下下田。以人口和勞動力混合爲原則去分配土地，『不論男婦，按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凡『男婦每一人自十六歲以上受田多踰，十五歲以下一半，如十六歲以上分上上田一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其半，分上上田五分……』分配土地時『雜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醜田，好醜各一半。』（『天朝田畝制度』）

這種土地政策是澈底平分土地的辦法，是當時農民迫切要求的反映。不過因爲當時戰爭環境的影響，以及缺乏執行土地政策的堅強決心，使土地政策一般說都沒有實行，以至蘇州百姓應納糧稅并未足收，田畝亦是聽其逃納并不深究（見『李秀成供狀』）。『照依舊規，收該捐糧。』（見『青巖選定錄』）。

至於太平天國的工商業政策，雖然根據其烏托邦的共產主義，宣布『……商賈資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國庫。』雖然在軍隊中也組織了『諸匠營』，可是這些政策實際上是無法執行的，因而在工商業政策上還是維持着舊有的狀態。所以當時英人林和這樣寫道：『余等遇一重載之貨船，細察之，滿載現銀。余怪而訪問之，以爲匪徒充斥，何能出此？則答曰：凡誣毀太平者皆誑也。……人所誣太平軍，曰擄亂，曰劫掠。然太平軍惟不是擄亂，故境中尙產絲，故人尙敢携現銀入境也！……』『地距上海約六十英里，帆檣雲集，絲船尤夥，閭閻不擾，市廛不驚。』（『太平天國外紀』）

在財政政策上一面依舊徵收錢糧，一面則實行募捐與打土豪，但對於羣衆則『絲毫無擾』：「太平軍由長沙陷武漢，軍衆餉缺，間亦芻掠，美其名曰沒入。然必擇達官富紳行之，民間則絲毫無擾也。每以攫取得衣物散給貧者，並言將來治平，概免租稅三年，鄉民德之。」（「見太平天國野史」）。

太平天國的對外政策，在開始時，在某程度上，曾和外國保持了友好的關係，準許外人自由通商。『天王乃遣使延船將與歷覽各營，且曰：彼此通商，理所應然，……將來事定，只有洋烟再勿來吞中國，其餘自由貿易，無所禁止。……彼船將歸上海，天王使弟洪仁玕同行報聘，見英、法、美各領事。』（見『清季野史』）而列強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則與滿清政府發生衝突，這樣，就使外國最初對太平天國採取中立態度。一直到天津條約締結後，列強爲着保持、實現與擴大其從滿清政府手中取得的各種利益與特權，而且鑒於太平天國勢力的勝利發展，結果會沖壞外國資本主義在華的特權，於是他們便與滿清政府聯成一氣，來向太平天國進攻了。

最後，太平天國確立男女平等、禁止買賣婚姻、禁止蓄婢納妾、禁止賭博、廢除奴隸制度、廢除黑暗的刑法制度、禁煙鴉片等，都是有意義的民主主義思想的表現。

太平天國的政策，特別是土地政策，說明太平天國不簡單是和過去一樣的農民戰爭，而正是近代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序幕的農民戰爭。在太平天國的政策中帶有不少的民主主義思想，特別是平分土地的思想，這種思想在太平人物主觀上是烏托邦的共產主義，但客觀上却正是要求資本主義廣大

的發展，在這一思想的裏面是包含着沒收地主土地，肅清封建勢力的內容，因而有可能經過廣大的農民戰爭在客觀上替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肅清道路。當然太平天國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基本上還是農民戰爭；但它與過去的原始的農民戰爭有許多不同之處，這種不同，不僅僅是在地域上普及到中國各主要區域，不僅因為運動本身上吸收了最廣大的羣衆參加；而在於它有比較明確的主張，它有較嚴密的組織，它更有較進步的各種政策，也就是說它帶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特點。這種不同，是由於太平天國所處的時代的條件所致。

六 太平天國失敗的教訓

堅持十五年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終於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是：

第一，最基本的原因是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所致。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在轉化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同時也在醞釀着資本主義的種子，但當時還沒有新興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還沒有可能組織與形成一個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政黨來領導太平天國。而農民則在基本上還是落後的，保守的，散漫的，無組織的。農民戰爭要取得勝利，要在資產階級（如在過去法國）或無產階級（如在俄國）領導下才有可能。農民要取得徹底解放，則唯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才能達到。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就使太平天國沒有那樣一個革命階級與政黨領導而走向失敗。從這失敗的基本原因出發

，也就使太平天國產生其他許多的錯誤。

第二，因為沒有那樣一個革命階級與政黨的領導，所以太平天國就沒有能夠去團結滙合統一當時所有的農民運動。當時中國各地的農民鬥爭到處風起雲湧，特別是北方捻子的鬥爭與南方三合會運動的發展，太平天國都不能進一步地去團結這些革命運動，去增強革命的力量，以摧毀反動統治；反給敵人以各個擊破的機會。

第三，在戰略上的錯誤是沒有集中主力去摧毀敵人的最後堡壘——北京。沒有乘敵人慘敗之際，迅速殲滅敵人（當時僅僅派出一個兵力薄弱的支隊北伐，結果遭受失敗），反而保守南京，使敵人能從容整理與組織反革命力量對革命施行反攻。同時又犯了分散兵力，疲勞兵力的錯誤，使自己常處於被動的地位。特別是後半期的戰爭，太平軍多半採取被動的防禦戰，造成東援西救南奔北走的戰局，常處於不利條件之下。應該退却時，又不曾組織適當的退却。雖然當時名將李秀成曾三番五次主張退却，謂『京師危急，坐斃非策，不如親征鄂疆，握上游以號令天下，襟帶蘇州，以利饒源，即使金陵有失，猶擁兵五六十萬，尙足并驅中原，若戀此危城，征調不至，必亡之道也。』又謂『京都斷難久持，臣已智窮力盡，無以爲謀，惟有力請親征……若守危城，譬處籠中，以待食絕，萬不可也。』（均見羅惇勳：『太平天國戰紀』）可是洪秀全却置之不顧。結果，死守南京，爲敵人撲滅。

第四，沒有能夠更明確地去組織羣衆，武裝羣衆，深入羣衆的鬭爭，特別是土地鬥爭；沒有認真建立強固而有力的

政權，創造許多更鞏固的革命根據地，而形成一種單純的軍事行動。結果雖然佔領了許多通都重邑，却不能鞏固起來，造戈隨得隨失的現象，形成流動式的活動。

第五，太平天國領導者內部不團結，互相猜疑，互相殘殺。沒有能夠從領導者內部的團結形成整個革命運動領導的核心。在奠都金陵後，便日益脫離羣衆，逐漸失去原來的面目，不能繼續爲羣衆利益奮鬥的共同目標下，緊密團結起來；反而爲聲色玉帛所迷，走向墮落腐化，一直發展到自相殘殺。而石達開的率師西行（大部是太平軍的清覈），更影響到太平軍的失敗。

最後，在客觀上是由於當時統治階級地主、官僚、貴族、商人等形成一條反革命的陣綫，在後一時期，更加上列強積極幫助，聯合向革命進攻，就使太平天國在敵人的聯合的攻下失敗了。

這些，就是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也就是太平天國的教訓。雖然太平天國失敗了，然而太平天國却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了光榮悲壯的一頁。它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驅，它的意義對於我們今天依然是存在的。絕不能因爲太平天國的失敗而過分斥責太平天國與磨滅其光榮的意義。應該清楚：當時中國的社會條件，只能產生這樣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

一八五七年馬克思恩格斯對於太平天國事件，曾這樣說過：『就讓中國的社會主義（指太平天國當時的烏托邦共產主義——編者註）與歐洲社會主義之相差，像中國的哲學與黑格爾的哲學之相差一樣吧。可是有一件事情終究是值得我

們高興的，就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堅固的帝國，因受了英國資本家紡織品底影響，八年來已處於社會革新的前夜，這種社會革新，對於文明，無論如何，應有非常重大的結果。我們歐洲的反動派，在最近的將來，勢必向亞洲逃跑，一跑跑到中國的萬里長城，跑到這個最保守的堡壘的門口，那時候，安知他們在那里不會碰到「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這幾個大字呢？」事實上，太平天國就正是創造這中華共和國的先聲，他們已開始在寫着『自由，平等，博愛』這幾個大字。太平天國雖然失敗了，但太平天國先烈所流的血，却是在開始渲染着中國歷史的新篇幅。

太平天國在運動的中途，雖然有些上層份子開始腐化了，有些上層份子（如韋昌輝）自相殘殺，有些上層份子（如石達開）進行分裂太平運動，使太平軍許多精銳陷於無出頭的道路，有些上層份子（如錢江）的中途變節，然而太平天國在歷史上曾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如李秀成之輩，他們在滿廷敵人的面前，在西歐列強的面前，堅決不屈服，實永成爲我民族後起者的模範。中華民族是永遠不能忘記這些英雄的祖先的。反之，像曾國藩李鴻章之流，他們爲異族朝廷效忠，率領外國侵略者的軍隊（戈登軍）來屠殺太平天國的男女，是已被歷史寫在最可恥的名冊上了，正如孟子所說的『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這段歷史，對於我們今天有何等重要的意義，是可以不言而喻的。

第二講 戊戌政變與 義和團運動

一 太平天國失敗後帝國主義的侵略 和中國經濟政治狀況的變化

太平天國——這個偉大的農民民族革命軍的失敗，列強利用中國的弱點，侵略中國就更變本加厲起來了。當時滿清政府也進一步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前面表示讓步、屈服與投降，特別在列強幫助滿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革命中，使滿清統治與外國資本主義列強形成更密切的關係。各國就利用滿清政府來實施進一步向中國的掠奪。

中國藩籬的喪失

太平天國失敗後，列強對中國的侵略，首先是割據中國的邊疆，使中國的藩籬全部喪失，使中國原有的藩屬淪為外

國資本主義的殖民地。

首先，是日本吞併琉球。琉球原是中國的藩屬，日本竊盜藉口台灣事件（琉球居民至台灣，爲台灣人所殺），以替琉球人雪恨爲名，於一八七四年發兵征台灣。事後中日訂和約，而琉球從此就爲日本的殖民地了。

其次，是法國佔領安南。安南同樣是中國的藩邦。法國向安南的進攻，一八五八年便已開始。一八七四年更訂立『西貢條約』，使安南淪爲法國的保護國。一八八三年安南軍再與法軍激戰，安南軍敗北，訂立『順化條約』，安南政府自認爲法國之保護國。一八八四年因爲中法雙方撤退在安南軍隊問題而引起中法之諒山衝突，法國艦隊乃在福建之馬江向中國艦隊宣戰，并攻擊台灣，封鎖鎮江，掠奪龍州。滿清政府乃於一八八五年與法國訂立『中法和約』，中國承認安南爲法國保護國，從此安南便成爲法國合法的殖民地了。

第三，是英國割據緬甸。緬甸本來也是中國的藩屬。一八八一年英國利用緬甸政變，發兵攻緬，佔南緬各地，一八八五年英軍再度進攻緬甸，至一八八六年一月，英國乃完全吞併緬甸。事後，滿清政府與英國締結『中英協約』，中國承認英國對緬甸有最高宗主權，緬甸從此便淪爲英國的殖民地了。

第四，是帝俄之割據新疆、外蒙邊境。一八七一年帝俄乘回亂之際，藉口維持邊境治安，出兵佔領伊犁。一八七八年清廷派全權代表赴俄交涉歸還伊犁事，遂訂立第一次的中俄『伊犁條約』，訂明伊犁既歸還中國，應將可西河以西及麗山以南之地，以至底克斯河盡讓與俄。依此條約，伊犁雖已

歸還，但伊犁附近各要地均為俄國所有，因之全國朝野均一致反對。

至一八八一年中俄重訂『伊犁條約』，規定中俄二國之境界，從別珍島山沿霍爾果斯河過伊犁河南至烏宗島山，同治三年塔城界約規定的齊彙湖以南之國境，尚有不妥，應自奎洞山過黑伊爾持什河至薩烏爾嶺，劃一直線為中俄國界。『伊犁條約』締結後，實際上外蒙、新疆邊境均為帝俄所有了。

最後，一八八七年葡萄牙割據澳門。一八九〇年，英國又吞併中國之藩屬哲孟雄。

從此，中國原有的屬地便全部淪為外國資本主義的殖民地了！中國的屏障已經全部喪失了！

中日戰爭

太平天國失敗後，列強加緊對中國侵略的過程中，爆發了一八九四——九五年的中日戰爭。

中日戰爭前數十年，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不僅積極侵略中國，同時也向日本染指，當時日本的鎖國政策，終敵不過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勢力的侵入，結果就引起了日本民族的覺醒，於一八六八年施行明治維新，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明治維新後，日本便在資本主義的道上邁進了。可是，明治維新並不是徹底的資產階級的革命，而是地主，資產階級聯合共同自上而下的一種改革。

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有下列特點：

第一，在資本主義發展中，封建勢力不但沒有剷除而且

還相當強大。特別是鄉村農民受地主階級封建的剝削，極為貧困，以致國內市場非常狹小。

第二，日本工業的發展偏重於輕工業，重工業非常落後，所以日本迫切需要國外原料的出產地與國外市場，特別要求殖民地。

第三，日本資本主義很快地走上帝國主義的道路，這是一種封建的軍事的帝國主義，特別富於侵略性。

日本向外侵略首先是企圖吞併朝鮮。中日戰爭的爆發，就是以朝鮮的內爭為導火綫。朝鮮原為中國屬邦。一八九四年，朝鮮爆發東學黨之亂（反政府的組織與鬥爭），中日雙方均出兵至朝鮮。日本便乘機進迫朝鮮王宮，強迫朝鮮政府屈服日本，與中國脫離關係；同時日本海陸軍開始向中國軍隊進攻。中日戰爭就此爆發。

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滿清政府正式對日宣戰。日本亦於同日宣戰。戰爭結果，中國軍隊被日軍擊敗於朝鮮之平壤，日本乘勝渡鴨綠江，陷九連城、鳳凰城、岫巖州、全州、大連、旅順等地。遼寧南部全為日軍佔領。中國海軍亦同時敗潰，北洋艦隊全部覆滅，威海衛、劉公島、渤海南北港口、澎湖羣島相繼為日軍佔領。

中國戰敗後，乃派李鴻章與日本訂立『馬關條約』（一八九五年四月），主要內容為：

- 一，中國承認朝鮮為獨立國，廢除朝貢。
- 二，割遼東半島（由鴨綠江至鳳凰城，海城及營口為止）、台灣全島及澎湖羣島於日本。
- 三，中國賠償日本軍費二萬萬兩。

四，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爲通商口岸，日本得設立領事於商埠。

五，爲担保本條約實行，日本暫以軍隊佔領威海衛。

中日戰爭中國之所以遭受慘敗，主要的原由是由於當時滿清政府的極端腐敗。在軍事建設上更是腐敗不堪。在中日戰爭形勢緊急時，滿清政府內部也沒有統一的主張，翁同龢極力主戰，而李鴻章則企圖以妥協政策來求得中日間衝突的緩和。統治階級表裏猶豫不決，對於戰爭毫無準備。甚至袁世凱電請海陸軍增援時，而李鴻章却置之不問。以至戰爭開始時，中國方面表現措手不及，這是一。

其次，在軍事上沒有集中優勢的兵力與日本決戰，形成陸續增派隊伍作戰的形勢，以致當北方的隊伍已遭慘敗時，而湖南、四川等地隊伍才開始趕赴前線，結果就不能挽回戰爭失敗的形勢。此外，在軍事指揮上也極不統一，形成各自爲戰的局面，給日軍予各個擊破的機會。

第三，是沒有得到羣衆的擁護。政府軍隊不僅與人民隔離，而且殘酷的壓迫與剝削羣衆；不僅在中國是這樣，就在朝鮮也是如此：『是時中國軍隊并屯平壤，高麗之舊京也。朝民素親中國，聞大軍至，爭獻酒漿餉軍，而軍士殘暴奪財物，役丁壯，淫婦女，衛汝貴軍尤甚，朝民大失望。』（羅莘畹：『中日兵事本末』）

當時滿清政府的這種腐敗，當時這種沒有準備的、局部的、片面的抗戰，其結果當然就只能失敗。

中日戰爭引起的中國國際地位和關係的新變化

中日戰爭不僅給中國以直接的影響，同時也促使國際關係起了變化。

第一，中日戰爭充分表示了滿清政府的腐敗與無能。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之役，雖然說明了滿清政府的無能，可是還沒有澈底的暴露。這次中日戰爭結果，中國海軍覆滅，陸軍敗北，已往全部軍事建設宣告破產，偌大的中國為小小的日本所征服。這樣就在全世界前面指明：中國完全是一個腐敗無能的國家，各帝國主義因此都看穿了中國的實質，因此便毫無忌憚的向中國肆行侵略了。中日戰爭後，各帝國主義均到處強迫中國承認各種條約，強迫中國租借土地，把中國劃分為各國的「勢力範圍」。這樣，中日戰爭後中國實際上已為各帝國主義所統治了，確定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地位了。

第二，中日戰爭前，英國與帝俄在掠奪中國上發生了劇烈的衝突，英帝國主義以為中國尚有力量反抗俄國，因此企圖聯合中國反對俄國，以擴充英國在華的勢力。可是，在中日戰爭後，中國的弱點暴露無遺，因之，英國便放棄了聯合中國反俄的企圖，而轉向與日本聯合共同反對帝俄的方向了。這是中日戰爭對於國際關係所起的變化。

第三，中日戰爭後，日俄衝突極度的加強了。帝俄向外侵略，首先就找尋出口，原想從西方向波羅的海找出口，結果受到英國的制止，後來想從黑海出土耳其的韃靼爾海峽，也被英國所擋駕，最後只好向東方發展，首先取得海參威。可是海參威每年有三月凍冰，不能為軍事商業的最好根據地，於是又將其勢力伸長於遼東半島，企圖從旅順大連出口以伸張勢力於太平洋。可是中日戰爭的結果，『馬關條約』訂

由中國割遼東半島於日本，使帝俄的企圖將成泡影。因此，俄國乃聯合法德二國反對日本佔領遼東半島。在各國的勢力下，日本不得已乃放棄遼東半島，而中國則納銀三千萬兩與日本^⑥，以爲遼東歸還之報償。後來遼東半島又爲俄國強租去了。顯然的，在滿洲問題上，自中日戰爭後，日俄衝突已逐日日益尖銳化了。（至一九〇四年就暴發了日俄戰爭。戰爭結果，俄國敗了。於是遼東半島又歸還給日本了，并劃定南滿爲日本勢力範圍，北滿則爲俄國勢力範圍。）

所以，中日戰爭是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的一個主要關鍵，同時，又是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間衝突特別尖銳化的開始。

各帝國主義在中國勢力範圍的劃分

中日戰爭後，歐美各國已從古典資本主義進到帝國主義時期，從自由貿易轉到壟斷時期。在中日戰爭前，鴉片戰爭後，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主要的目的是開闢通商口岸，以利自由貿易；可是在中日戰爭後，一方面，帝國主義的商品固然是更大批地湧進中國來，另一方面，却同時也由輸出商品到輸出资本，而爲着取得對華投資的保障，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轉到勢力範圍的劃分就更成爲必要，而這點就如上面所說的，是利用中國新敗之餘來進行的。

當時俄國一面借大批款項給滿清政府，一面與李鴻章訂立密約，取得在東三省建築鐵路的特權，強租旅順大連；此外，其勢力更伸入新疆外蒙，還企圖向長城以南整個中國北部侵略。因此，當時新疆、外蒙古、滿洲都是俄國的勢力範

國。

英國則以香港爲根據地，在中國南方、中部積極擴充它的勢力範圍。一八九八年強租威海衛以制俄，并租借九龍半島及香港附近四十餘島與大鵬深州二灣。英國更在中國攫取了許多鐵道的興築權與採礦權。一八九九年英俄訂立協約，規定長城以北爲俄國勢力範圍，長江流域則爲英國勢力範圍。這樣，英國在華的勢力範圍便包括雲南、貴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河南、浙江十個省了。

德國是後起的帝國主義國家，向中國侵略比較遲慢。一八九七年德國藉德教士二人在山東被殺爲口實，派遣艦隊佔領膠州灣，事後強迫租借膠州灣，并取得在山東建築鐵道，開採礦產的權利，於是山東便成爲德國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了。

法帝國主義則以安南爲出發點，積極向中國的西南侵略。一八九七年法國向滿清政府要求，取得了兩廣雲南礦山開採權與建築鐵道權。一八九八年更租借廣州灣，同時與滿清政府約定兩廣、雲南三省不割與他國。這樣一來，雲南、廣西、貴州以及廣東之一部份（南路），實際上已是法國的勢力範圍了。

日本自戰勝中國，佔領朝鮮後，更進一步向中國侵略。一八九八年強迫滿清政府申明中國之福建省及沿海一帶永不割讓租借與他國。清廷備文承認。日俄戰爭後，又從俄國取得南滿勢力範圍。

至於美國，則因爲資本主義發展較爲遲緩，待美國顧及東方時，中國已被各帝國主義劃分完了。因此美國國務卿海

約翰，便在一八九九年發表宣言，主張中國門戶開放，實際上就是使美國也能够侵略中國的聲明，不許各帝國主義壟斷的主張。這主張成爲後來美國對中國的主要政策。

顯然的，中日戰爭後，中國的領土已經完全成爲各帝國主義劃分的勢力範圍了。在每個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內，一切政治經濟支配權都操縱在帝國主義手裏，從此中國在名義上爲一個獨立國家，在實際上則已淪入半殖民地的悲慘命運了。

帝國主義侵略新發展對於中國經濟政治變化的影響

中日戰爭後，各帝國主義的積極侵略與勢力範圍的劃分，使中國政治經濟都起了基本的變化。

首先是各國的商品在中日戰爭後，更如潮水般的湧進中國來。從一八四二年至一八九九年間帝國主義在中國開闢了五十一個商埠，各國的商品就經過五十一個商埠運進中國來，而中國原料則大批輸出。下面的統計便非常清楚：

年 代	輸入總額 (單位兩)	輸出總額 (單位兩)	入 超 (單位兩)
1854	72,760,758	67,147,680	5,613,078
1894	162,102,911	128,104,522	33,998,389
1895	171,696,715	143,293,211	28,403,504
1896	202,589,994	131,081,421	71,508,573
1897	202,828,625	163,501,358	39,327,267
1898	209,579,334	159,037,149	50,542,185
1899	264,748,456	159,784,832	68,963,624

帝國主義商品的大量輸入中國，使中國舊有的手工業農業均日趨破產。同時因為入超的結果，中國現金源源外溢。再加上許多賠款，滿清政府一面只能債上加債，大借外債以資應付。另一方面則更殘酷向人民榨取，使中國人民生活日益困苦，而走上鬥爭騷動的道路。

滿清政府自從中日戰爭後，因為要應付巨額的賠款，便不能不大量向外借款。這點使清廷更要依附於帝國主義者，同時更不能不加強對於人民的榨取，使人民負擔日益增加。下邊就是一個關於外債的統計。這些借款，主要是以鐵道礦山做抵押品。

年代	債權國	數 量
1894	英（滙豐）	1,635,000（鎊）
1895	英（滙豐）	3,000,000（鎊）
1895	英（麥加利）	1,000,000（鎊）
1895	端記借款	1,000,000（鎊）
1895	俄法借款	15,820,000（鎊）
1896	英德借款	16,000,000（鎊）
1898	英德借款	19,000,000（鎊）

外貨充斥中國，借款賠款束縛中國，手工業者農民的急劇破產，就是帝國主義侵略新發展的結果。

因受西方資本主義侵入的影響，中國本來已開始了資本主義新工業的萌芽。太平運動後第一年，曾有從暹羅回國的華僑張道藩開始創辦絲織廠（因為人民反對，遷往澳門）。隨後即不斷有新式的官辦的軍事工業的經營：一八六二年曾國藩在安慶設立軍械所，李鴻章在上海設立製砲局；一八六

四年南京設金陵兵工廠；一八六五年設江南製造總局；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在福州設船政局；一八七六年設四川機器廠；一八八二年金陵成立火藥局；一八九三年漢陽兵工廠成立。和軍事工業相追隨而發展起來的，如開平礦務局和漢冶萍公司的開辦，鐵路的開始敷設等。此外官辦或官商合辦的輕工業也在萌芽，如在上海之機器織布局、紡織新局、紡織局、華盛紗廠；廣東之繅絲局、織布局、武漢之織布官局、火柴廠等。這說明帝國主義侵略的影響，使當時先進的政府官僚感覺到軍備改良的需要，而從事軍事工業的建設，使一部份商人官僚也開始投資於工業。中日戰爭後，因『馬關條約』的規定，允許外人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工廠，從此外資的工廠紛起，使中國自己企業的發展，造成了新的可怕的桎梏。但另一方面却也反轉而給了中國新企業的建立一個某種程度上的刺激。

跟着帝國主義侵略與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新官僚與歐美留學生知識份子，便產生了資產階級革新的意識有了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思想。當時在中國形成了不少的革新黨派與小組織。首先，一八八八年上海有廣學會的設立，以啓發中國文化，輸入泰西科學及圖謀中國之自強爲目的。這是中國科學文化的最早的啓蒙運動。其次是新官僚的強學會的組織。最主要的還是一八九五年康有爲、梁啓超領導的桂學會的建立。桂學會帶有濃厚的政治意味，以改革政治爲目的。桂學會後來就成爲戊戌政變的策動力。這些革新的小組織，經過報紙積極鼓吹革新運動，在全國發生極大的影響，引起各地紛紛組織各種改革團體，而桂學會就儼然成爲

國內改革運動的中樞領導組織。桂學會改革的政治綱領，亦隨之而日益具體化；及後遂有保國會的組織，其領袖為康有為。戊戌政變的運動就是在此組織之下開展的。

帝國主義的侵入中國雖然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可是這並不是帝國主義者所願意與所望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目的是在於如何加強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剝削。帝國主義在中國勢力範圍的劃分，正阻礙着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的統治，在殖民地需要一種社會的倚靠，因此首先和以前的社會結構的統治階層封建地主、商業與高利貸資產階級結了聯盟，進攻大多數的民衆。帝國主義到處企圖着保持資本主義前期的榨取形式（尤其在鄉村中），用作反動聯盟生存的基礎。』（國際六次大會決議）當時帝國主義一面勾結滿清朝廷，一面在每一勢力範圍內又與當地封建勢力結合，維持當地封建統治，並經過中國的封建統治階級加強對中國勞苦羣衆的剝削。帝國主義勢力範圍的劃分與每一勢力範圍內封建勢力的結合，就逐步造成了後來中國軍閥封建割據的新局面。並加強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所有這些，就是中日戰爭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所發生的影響，也就是中國政治經濟基本上的變動。

二 戊戌政變

康梁變法

中日戰爭前後，當時中國新官僚與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

份子（主要是出身官僚地主的留學生）滋長着資產階級革新的思想，他們在中日戰爭失敗的教訓下，更深深感覺到中國的危亡，企圖以改良主義的方法從上而下來挽救中國，使中國富強起來。這些新官僚改革運動的主要的領導者便是康有爲、梁啟超。

這些新官僚與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革運動並不是去組織與發動羣衆，領導羣衆去推翻舊的統治。他們只祈望說服統治階級，找尋一個開明的皇帝，經過開明的皇帝來自上而下的實行變法，來改造中國，使中國富強起來。

基於這樣的一個立場，康有爲在中日戰爭前，在一八八八年就開始提倡變法。至一八九五年康有爲起草奏書痛論改革救亡。集公車一千三百人簽名上書請變法，這就是所謂『公車上書』事件。當時康、梁提出的主張，主要的是：一、扶助農業（務農）；二、發展手工業（勤工）；三、扶植商業（惠商）；四、賑濟貧民（恤窮）。具體的辦法就是：助商業組織，以抵抗外商的壓迫，取消厘金，興辦重工業，獎勵殖邊運動，建築國營鐵路，普及國民教育，改良科舉制度，取消買賣官爵，訓練新式官吏，注意人民健康與衛生，改良刑罰監獄，建造軍用鐵道與軍艦，給兵士以現代軍事教育等。這些主張都是自由資產階級的政綱，都是自由資產階級改革的主張。當時這些新官僚與知識分子認識了如果中國不急速進行變法，便將走上滅亡的道路，他們企圖以這種主張，來說服光緒皇帝。

康、梁這些維新的提議終於得到了年輕的光緒皇帝的同意與接受。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即戊戌年）四月，德

樂（光緒帝）乃下詔國中，斥責守舊派的空言談論，主張變法，引用思想進步的新黨人物。從四月至七月德宗下了數十道詔諭，如廢八股、改科舉、興學堂、汰冗員、廣言路、保薦經濟特科人材、開辦京師大學及各科學堂、興辦銀行、設立鐵路礦務局、廢祀典不載之寺廟、裁汰老弱無用之額兵等。這些都是當時變法的具體綱領。

滿清整個統治都掌握在封建地主貴族官僚手中。因之光緒皇帝的這些變法主張的命令始終是沒有執行的。同時以慈禧太后爲代表的舊派反動勢力也就在德宗實行變法中對改革運動與新黨施行鎮壓。慈禧太后經過袁世凱對於維新黨的出賣，下詔幽禁德宗於北海之瀛島，捕殺新黨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康廣仁等六人（後來大家稱爲六君子），同時流放、監禁、革職所有附和贊成變法的新黨人物。當時康有爲、梁啟超則逃亡海外。在反動勢力的鎮壓下戊戌政變就只經過一百天而完全失敗了，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百日維新』。當譚嗣同被捕殺前，尙留下悲壯激昂的說話：『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戊戌政變的評價

戊戌改革運動只是曇花一現就失敗了！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沒有力量的依靠。當時雖然新官僚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贊助改革，可是人數很少，力量不大。整個滿清統治則掌握在反動勢力手中，他們積極反對變法；康、梁等所依靠的光緒皇帝又沒有掌握實權，這樣當然經不起反動勢力的一個進

攻和鎮壓而失敗了。

至於當時下層羣衆的力量，又是這些維新派所看不見的，同時也是他們所害怕的。他們只祈望經過上層的統治來進行改革，至於如何去領導當時發展着的農民鬥爭，依靠羣衆力量來實施改革，那是康、梁等所夢想不到的。

當然，當時六君子慷慨就義英勇犧牲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不過他們的犧牲流血是離開羣衆的，他們的赤血沒有與羣衆聯結起來：這個沒有力量依靠的改革只有走向失敗。

戊戌政變的失敗，證明用改良主義的方法，自上而下來改造中國，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是不可能的。戊戌政變的失敗就是中國改良主義第一次嘗試的破產。同時也指出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才能取得勝利，辛亥革命就是戊戌政變的改良主義的否定。

如果以日本的明治維新來和戊戌變法比較，後者失敗，前者成功就在於：第一，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是因為當時日本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依其歷史的條件，不像中國那樣的對於大工業商品的頑抗，是因為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已經較為成熟，商品經濟已較普遍化，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階梯的工廠手工業已經發展，在封建諸機中產生了代表資本主義發展的分子，依靠他們的力量，使明治維新獲得成功。第二，在國際環境上說，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時的情形也不同。明治維新時，外國資本主義還處於工業資本主義的階段，對於日本的染指還僅限於獲得在日本貿易的自由，同時當時列強又為俄法戰爭（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的克里米亞戰爭）與美國南北戰爭（一八五六——一

八六五年)所牽制，不能集中力量向日本侵略，使日本統治階級得乘機進行順利的改革。第三，日本的特殊的地理環境也是日本順利進行明治維新的一個附屬原因。日本是處於由西方至遠東航路的終點，也就是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最後目標；當時列強正忙於侵略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中國，對於狹小貧寒的日本之侵略自然較為放鬆，因而對於日本的維新也就沒有給予極大的阻礙。

當然日本的這些有利條件，顯然在中國是不存在的，因而戊戌政變也就不能如明治維新一樣獲得成功，而必然遭受失敗。

有人將戊戌政變比之於一八二五年俄國十二月黨的宮廷事變，這是因為俄國十二月黨的政變是宮廷政變，而康、梁的變法也正是如此。那時俄國資本主義開始發展，農奴制度尚未取消。俄國當時一些留學生與急進軍官主張實行改革，組織十二月黨，企圖解放農奴，取消專制，結果是失敗了。康、梁之主張變法與失敗原因也正與十二月黨的宮廷事變相彷彿。宮廷事變失敗時，十二月黨分子的英勇犧牲也正如六君子的就義一樣。同時這兩種事變的失敗都說明：如果希望依靠幾個先進的英勇戰士來實施改革，那只能是一個幻想。但俄國與中國的政治經濟情形究竟是不相同的，因此十二月黨的宮廷政變與戊戌政變也各有其特點。

誠然，戊戌政變是失敗了，但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階段上，也自有其進步的意義：戊戌政變曾大大地促進了全國人民的新覺醒，在客觀上幫助了革命運動的發展，這是無疑問的。雖則戊戌代表人物如康有為日益墮落到墳墓中去，但六

君子的血却正不是白流的。

三 義和團運動與八國聯軍

義和團運動

戊戌政變前後，廣大的農民鬥爭在黃河流域特別是山東、山西、直隸等省普遍的開展起來，農民的鬥爭騷動的進一步發展就是以後的義和團運動。這是南方太平運動在當時落後的北方之變態的再版。

義和團是由義和拳(又名義和團或梅花拳)得名的。義和團的興起與發展是與白蓮教的遺黨有密切的關係(有謂係白蓮教之支流)。義和團雖然是一種迷信的農民的組織，可是它又帶有一種民族思想與反對統治階級的情緒。這是由於各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滿清統治的腐敗，羣衆生活極端痛苦與破產所引起的。這種組織和運動以宗教迷信的觀點誇張自己的神術，揚言符咒神術可使炮火不燃，可使槍炮不能傷身，到處設壇焚香。因外國人到處欺侮他們，剝削他們，他們充滿了對外國人的憤恨，所以到處拆教堂，殺教士。事實上，義和團所看到的外國人，並不是外國真正的民衆；因此，事實上，他們也並不是仇恨外國真正的民衆。正如列寧所說的：『中國人並不仇恨歐洲的民衆，他們不會和他們發生過爭鬥。他們是仇恨歐洲的(當時還應加上：日本的——編者註)資本家與服從(當時日本也在內——編者註)的政府。』那些來中國只是爲了謀

錢的外國人？那些只是用他們誇張的文明來實行欺騙，劫掠與暴虐的人？那些對中國作戰，以取得對中國的鴉片——用來麻醉中國民衆的——貿易權的人？以及在宣傳基督教的名義之下，假善地施行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民應該有這樣的仇恨。可是，不幸的，由這樣仇恨所引起的義和團運動，因為沒有正確的領導，却沒有走上正當鬥爭的道路。

光緒庚子年（一九〇〇年）義和團運動在山東、直隸、山西等省的開展直接威脅着滿清統治。因此在滿清政府中對義和團運動有兩種不同的主張：一部分人（以榮祿爲首）主張對義和團採取武力的鎮壓，另一部分人（舊黨）因爲外人來到中國，影響到他們舊日剝削的生活，並和他們分取剝削的血汗，存着報復的忿怒觀念，此時就主張利用義和團來反對外國人，轉移羣衆鬥爭的目標爲『扶清滅洋』。當時慈禧太后採用了這一種辦法，召集義和團入京，鼓動與領導義和團在北京殺外國人。在義和團的恐怖政策下，外人被殺者共數不少。日本書記官杉山彬與德國公使克德林，亦先後遭殺。義和團更協同軍隊大肆圍攻東交民巷之外國領事館。

各帝國主義得到了藉口，向中國聯合進攻了。英、俄、德、法、美、日、意、奧便組織八國聯軍總攻中國。首先佔領大沽炮台，當時滿清政府亦下詔與各國宣戰，命各省招義和團助戰。不久聯軍陷天津進北京，慈禧太后逃入山西、陝西。義和團在每次戰役中，都表現得極其英勇，前仆後繼，視死如歸，但因爲沒有正確的鬥爭道路，結果，義和團暴動在帝國主義的炮火下就完全失敗了。

帝國主義的八國聯軍入京後，施行最野蠻、最慘酷的搶

掠、姦淫、燒殺！聯軍總帥瓦德西（德人）承認：『聯軍佔領北京之後，曾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其後更繼以私人搶劫……』所有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將永不能查出。……又因搶劫所發生強姦婦女之殘忍行爲，隨意殺人，無故放火等事，爲數極屬不少。』這些野蠻的、殘暴的、獸性的胡作妄爲，就是當時資本主義『文明國』的『文明行爲』。

『辛丑條約』

各帝國主義在進佔天津北京後，即企圖直接瓜分中國，瓦德西曾經直接供認：『關於近年以來時常討論之「瓜分中國」一事，若以該國現時裝備之虛弱，財源之衰竭，政象之紛亂而論，實爲千載難得之實行瓜分時機。現在所欲問者：只是各國對此問題究取何種態度？……』當時除美國外，各帝國主義都企圖依照其已劃定之勢力範圍與利益關係來分割中國。不過最後還是沒有實行直接瓜分中國，這裏主要的原因，一方面還是因爲中國民族意識的發展，中國人民反抗的堅強，義和團的行動雖然是原始的野蠻的，最後歸於慘敗，但這運動却證明了中國民族是不可輕易征服的；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各帝國主義間存在着強烈的衝突，在瓜分中國上始終不能取得妥協與一致。正如瓦德西所說的一樣：『但余對此事，却認爲絕對不能實現，英國並不願意法國進據雲南，日本佔領福建。日本方面對於德國之據有山東則認爲危險萬分。各國方面對於走人之壟斷長江，認爲勢難坐視。至於美國方面則早已決定，反對一切瓜分之舉。俄國方面若能聽其

獨佔滿洲，毫不加以阻撓，則該國對於他國之實行瓜分中國，尚可袖手旁觀；蓋彼固深信各國對於此事，彼此間必將發生無限糾葛故也。』美國之所以不主張瓜分中國，則因美國在中國尚無確定的勢力範圍，并非美國之特惠於中國。

中國戰敗後遂向各國求和。一九〇一年清政府與列強締和約十二條，是為『辛丑條約』，主要內容為：

- 一，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從一九〇一年起至一九四〇年每年平均付二千萬兩。合計本利一起共十萬萬兩。
- 二，中國政府劃各國使館境界，使館區域內全為公使管理，不准中國人居住。各國為保護公使館，得置護衛兵於使館區域。
- 三，中國政府允將大沽炮台及有礙北京至海濱間交通上各炮台一律削平。
- 四，各國得駐兵北京與天津諸城障之間。
- 五，永禁加入排外團體，違者處斬。
- 六，各省督撫文武官吏及有司各官倘遇有傷害外人之事不能立即彈壓嚴辦者，革職永不復用。

『辛丑條約』之巨量賠款是以中國之關稅、鹽稅為抵押品的，因此『辛丑條約』後，中國之關稅、鹽稅便落入帝國主義手中了。經過『辛丑條約』的訂立，帝國主義在政治上財政上已經進一步統治了中國，半殖民地的鎖鍊更緊緊地加在中國人民的頸上了。

義和團運動的評價

在義和團運動中，帝俄派遣了大軍佔領東三省，且設置關東總督府，在和議後，仍不撤兵，因此，一方面卒促成了英日同盟（一九〇二年），另一方面卒促成了日俄之戰。在日俄戰爭後，日本與帝俄成立了掠奪朝鮮和中國的協調，日本帝國主義者代替了帝俄的地位，從此便日益進行單獨滅亡中國的陰謀，而成爲中國民族最危險最切身的大患了。

義和團運動雖然帶着濃厚的宗教的迷信色彩，雖然是無組織的散漫的行動，可是絕不如統治階級之所謂『拳匪之亂』。義和團運動是中國民衆對於帝國主義侵略的回答，是對於帝國主義仇恨憤怒的爆發，是原始的民衆的反帝國主義運動。

可是義和團這種民衆的反帝運動，却爲反動的滿清政府所利用了。義和團運動不僅未能將反帝的鬥爭與反對滿清統治的鬥爭聯結起來，而且反爲滿清政府所利用，使義和團運動染上反動的色彩。

沒有革命階級領導、而又爲滿清政府所利用的義和團運動，雖然它是原始的反帝國主義的廣大羣衆的運動，却只能走向失敗了。

義和團在歷史上之積極的意義，一方面像上面所指出的，是表現了中國人民的反抗力，另一方面，又正是進一步地表現了清朝已無法再行照舊繼續自己的統治了，清朝被迫而要去利用義和團，這表明清朝已是搖搖欲落了，已是完全無力了。辛丑條約後，最頑固的統治者（慈禧爲代表）震懾於帝國主義者炮火的威力，已完全掃清了排外的念頭，更完全地，更污穢地拜跪在帝國主義的足下，求外人來庇佑自己的命

運，所謂『寧贈友邦，勿與家奴』，便成爲牢不可拔的國策了。然而這又是更進一步地使廣大中國人民了解清朝的真面目，痛切國家危亡的命運，他們更加昂頭起來了，他們起來要收拾清朝這個污穢的廢物，開闢中國的新歷史，以求民族的生存。

第三講 辛亥革命

一 辛亥革命前帝國主義的侵略

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獲得了許多特權，取得了對華投資的保障後，便開始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侵略了。我們上面已指出過，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特徵之一就是輸出資本，在馬關條約和義和團運動後帝國主義便開始向中國投資。除了政治上的投資外，這種投資，一方面是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紛紛設立工廠（如紡織、製粉、烟草等輕工業），並經過各種方式，奪取了中國各地重要的煤礦鐵礦，使之在外資支配之下（如英得開平煤礦，日得撫順煤礦、鞍山鐵礦…），另一方面就是在中國建築鐵路。這是爲了控制每一勢力範圍內的政治經濟，爲了便利於帝國主義輸入商品，輸出原料，運輸軍隊以鎮壓中國的反帝運動所必要的。

帝國主義在中國建築鐵路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帝國主義用自己的資本開辦，直接投資經營的，如中東、膠濟、滇越路等；另一種就是名義上由中國借外債建築，實際上權力操

縱在帝國主義手裏的，如滬杭甬、京漢、京奉路等。

下面便是帝國主義直接投資經營鐵路：

名稱	所屬國	長度	資本	獲得年代	序
中東	俄	1544哩	66,239,800 (鎊)	1896	一
膠濟	德	277哩	2,700,000 (鎊)	1898	二
滇越	法	263哩	6,280,000 (鎊)	1895	
九龍	英	21哩	—————	1898	

這種為帝國主義直接經營的鐵路，權力完全操在帝國主義手裏，這是一種。下邊便是中國借債建築的，把鐵路抵押債權國。

名稱	債權國	長度	借債額	序
京漢	日英法	827哩	5,000,000 (鎊)	三
京奉	英	611哩	2,300,000 (鎊)	
滬寧	英	220哩	2,200,000 (鎊)	
津浦	英法	685哩	8,000,000 (鎊)	
廣九	英	389哩	1,500,000 (鎊)	四
滬杭	英	203哩	1,500,000 (鎊)	
吉長	日	79哩	21,500 (鎊)	五

當時以中國資本建築的鐵路僅有吉綏（長八〇〇哩，資

註 一、日俄戰爭後，對三四哩給日本。二、後為日本奪去，一九二一年交回中國。三、原曾比擬築好，借款贖還，轉抵日英法三國。四、本線有二十一哩，係通過九龍路英管理。五、由俄國轉給日本的。

本爲二千一百萬元)，漳厦(一八哩，資本爲一千三百萬元)、潮汕、新寧路。

中國借款建築鐵路的條件簡直是駭：聽聞的剝削，俄國作家卡崗諾維夫在他『關於外資與中國鐵路』一書上指明以下的特點：

第一，外國資本家，根據鐵路條約獲得巨大的利潤，這些利潤主要的來路，就是中國實收借款數較名義借款額爲少，通常如借一百元，實收僅九十元，但利息不按九十元計算，却按一百元計算，利息當爲要担保的。此外建築鐵路的資本團還取得代購建築鐵路材料的一切權利。這樣，借款的銀行，不僅獲得利息，而且在購買材料中，又可以賺到不少的錢。

第二，鐵路的管理權，實際仍落在外人手裏。雖然中國政府經常委任督辦職員，但實際管理者不是那些督辦，而是外國工程師，一切重要職權大部份操縱在外國人手裏。

最後，更特別的，就是當中國政府不付給利息的時候，鐵路就歸建築人所有了。這就是說，若是中國政府無力償付利息的時候，就拿這條鐵路的財產來抵賬。僅僅到後來中國政府才變動了付債的方法，用關稅的收入來担保借款的付還。

中國建築鐵路的借款，即所謂鐵路借款約達十五萬萬元，其中有許多鐵路借款移作他用，使鐵路沒有建築起來。這些負擔都加在中國民衆身上。

帝國主義不但經過鐵路侵略中國，同時又依靠河道，發展航業，建立許多輪船公司。如：

國別	公司名	隻數	噸數	創立年代
英	怡和	52	58,847	1855
英	太古	47	60,495	1875
日	日清	12	25,807	1878
日	大連	5	—	—
德	美最時	6	6,790	—
德	禮臣	4	4,483	—

下邊則是中國輪船的統計：

公司名	招商局	開源礦務局	甯紹	政記
隻數	35	6	5	5
噸數	37,683	6,042	4,941	4,097

這一對比就說明中國的航業已經掌握在帝國主義的手裏了。

辛丑條約後帝國主義陸續在中國開設許多銀行。下邊就是辛亥革命前帝國主義在中國設立的銀行的統計：

國別	銀行名稱	資本總額
英	麥加利	3,000,000 (鎊)
英	匯豐	20,000,000 (美金)
法	東方匯理	72,000,000 (法郎)
英	有利	3,000,000 (鎊)
美	花旗	5,000,000 (美金)
俄	華俄道勝	55,000,000 (盧布)
德	德華	20,000,000 (元)
日	正金	100,000,000 (元)
日	台灣	60,000,000 (元)
比	華比	100,000,000 (法郎)

外 荷蘭 荷蘭 60,000,000 (馬克幣)
 可是在同一時期中（辛亥革命前）中國的銀行則僅

有：

銀行名稱	開設年代	資本總額
中國通商銀行	1897	5,000,000(兩)
中國銀行	1904	60,000,000(元)
交通銀行	1907	10,000,000(兩)
浙江興業銀行	1907	2,500,000(元)
四明商業銀行	1908	1,500,000(兩)
廣東銀行	1908	1,200,000(鎊)

這樣，帝國主義就經過其資本雄厚的銀行來壟斷中國經濟命脈，因為無論軍事的、政治的與實業的借款，帝國主義都經過他自己的銀行。這些銀行除借款外還保留有中國關稅的收入，從中國軍閥官僚方面吸收大量的存款並發行大批的鈔票，利用帝國金銀比價的變動進行各種投機事業，壟斷對外貿易與匯兌，更經過錢莊、當舖與各種經紀人（地主商人、高利貸），用很高的利息，貸款給中國人民，用最低的代價收買農產品。他們就這樣控制着中國的經濟命脈。

所有這些，都說明辛丑條約後，帝國主義開始向中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侵略，使中國經濟命脈，被帝國主義者所操縱，中國資本主義不能獨立發展的基本原因也就在此。

二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辛亥革命前帝國主義對華投資建築鐵路與開辦各種企業的結果而又反轉來刺激了中國的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投資於工業，中國資本主義就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初步的發展。

下面的統計便是一個明例——

紡織工業的情形：

名稱	地點	年代	資本
申新第二廠	上海	1907	100 (萬元)
大生二廠	崇明	1907	120 (萬元)
振新	無錫	1906	100 (萬兩)
大昌	太倉	1906	—
利用	江陰	1905	72 (萬元)
廣益	河南	1909	150 (萬元)
和豐第一廠	寧波	1907	90 (萬元)
和豐第二廠	寧波	1907	60 (萬元)

麵粉工業也有微弱的發展：

廠名	地點	開設年代	資本
立大	上海	1906	20 (萬兩)
中大	上海	1907	20 (萬元)
裕豐	上海	1905	20 (萬兩)
大豐	清江浦	1906	10 (萬元)
海豐	海州	1905	—
裕隆	漢口	1909	—
漢隆	漢口	1906	—

其他工業在這一時期也有一些建立。如山東之中興煤礦公司（一九〇五年開辦，資本八十萬兩），漢冶萍公司（一九〇八年，資本二千萬兩），楊子機器公司（一九〇七年），雲南之錫務公司（一九〇八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九〇六年）及東三省的一些火柴廠都是在這一時期興辦的。可見辛丑條約後，在帝國主義對華投資的刺激下，中國民族

資本主義已有一些發展，雖然這一發展還很麗弱。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開始，就受到帝國主義的阻礙。因為帝國主義在這一時期中不僅取得了在中國的各種特權，而且已經操縱了中國的經濟命脈，控制着中國整個的經濟，就使中國資本主義不能順利的獨立的向前發展。同時滿清的封建統治與對帝國主義的屈服，實際是幫助帝國主義來絞殺中國幼稚的工業。這說明當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已經發生衝突，生產力向前發展，非打破舊有的生產關係不可。這一衝突反映到政治鬥爭上來就是帝國主義、滿清政府極力要求現狀的維持，舊有生產關係的保證，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工人、資產階級、華僑資本家、知識分子、新官僚、農民、手工業者則要求打破現狀，打破阻礙生產力向前發展的舊有生產關係，也就是要求推翻滿清政府的封建統治與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開闢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道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之發展，就展開了辛亥革命。

三 辛亥革命前的滿清統治

當時滿清政府完全成爲帝國主義壓迫與剝削中國民衆的工具，滿清政府擔負着巨大的外債和賠款，同時又須供給官僚機關的揮霍，這樣，滿清政府就不能不殘酷的榨取民衆以償付外債和賠款。實際上，滿清政府就成爲帝國主義在華的稅收機關了。滿清政府對羣衆血汗榨取的加強，使中國民衆的生活更形惡化。羣衆的反抗也就不斷爆發。辛亥革命以前，羣衆反抗苛捐雜稅的運動到處發生，特別在一九〇六年，

這種運動差不多已遍及全國，計共數千百起，參加每一次運動的鄉民人數，往往從一千到十餘萬。廣西歸順縣數百餘村鄉民反對抽捐運動，河南葉縣萬餘人反對加稅，山東鄒縣十餘萬人因地丁而起的運動，就是明例。據河南葉縣鄉民所發的傳單，稱當時縣官在一年內已抽捐七次，這可見當時農民的痛苦了。當時滿清政府對於羣衆的反抗均採取屠殺的手段來鎮壓，以維持其腐敗的、動搖的統治。

在羣衆抗捐運動開展，滿清政府進一步腐敗的情況下，立憲運動又再度的發展起來，當時一些自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新官僚等到處進行立憲運動。立憲團體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首先是梁啟超組織東京政聞社，以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相號召，要求滿清政府實行立憲。接着上海一些紳士則組織立憲公會，在湖北有憲政籌備會的出現，在湖南有憲政分會的建立，在廣東有自治會的組織。當時力量較大的就是朱福誥、張謇等組織的預備立憲公會。在預備立憲公會的領導下，這些新官僚知識分子曾進行不斷的請願運動，要求滿清政府實行立憲政治，以挽救當時的危局。

在立憲運動的壓力下，滿清政府開始讓步，一九〇六年頒佈預備立憲的上諭，規定九年後實行立憲政治。一九〇七年各省設立諮議局，可是諮議局却僅僅以『遵諭旨採各省輿論、指陳各省利害、籌劃地方治安』為宗旨，當然不是民意的機關，而僅僅是一些新官僚活動的場所。此外，在宣統皇帝之下設立資政院，由欽選議員與諮議局議員各百名組織而成。因而資政院的所謂議員，實際大多數却是滿族的貴族官僚，當時大家稱之為『皇族內閣』，責任是名符其實。至一

九〇八年頒佈憲法大綱，主要內容爲：（一）大清皇帝爲帝國主權所有者，不能侵犯；（二）清帝有立法、司法、召開解散議會、制定官制、統率海陸軍宣戰、媾和、爵賞、恩赦發命施令諸權；（三）臣民在法律範圍內有言論、出版、集會、財產、居住諸自由權，非依法不得逮捕監禁；（四）臣民有納稅、當兵及遵守法律之義務。顯然的，這種欽定的憲法大綱只能是給滿清的統治權以保障而已，但就是這樣的一種立憲，滿清政府也盡量設法使之拖延。當時各省諮議局又不斷聯名請願，要求速開國會，而清廷則以宣統五年召開國會相搪塞。可見當時滿清政府的準備立憲固然是一個讓步，可是這種讓步，是極其渺小的，不僅廣大羣衆不會因此而感到滿意，就是當時的新官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對滿清統治表示完全的失望。這樣就使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與民衆，不能不大踏步向革命的道路前進了。

四 辛亥革命前的革命運動

辛亥革命前，中國形成革命與反革命兩個營壘的對立，兩種力量的鬥爭。一面是革命階級反對滿清政府的革命力量：首先是廣大的下層羣衆，工人、農民、手工業者、貧民、游民。他們受到帝國主義和滿清政府的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小私有者日益破產，凍餓死亡，因而積極要求推翻滿清政府而參加革命，他們經過哥老會的鬥爭與新軍的革命化和暴動而顯示着參加革命的堅決和英勇。其次，革命力量的另一種就是資產階級，華僑資本家和商人。中國資產階級爲着解脫

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束縛，求得中國資本主義的順利發展，而積極的參加與領導反對滿清政府的鬥爭；旅居國外的華僑資本家則企求將他們積蓄的資本投入國內的企業，可是當時的滿清政府不僅不能保障他們的投資與經營，而且協同帝國主義將要損害他們的投資與經營，因而華僑資本家同樣要求推翻滿清政府而參加革命。此外，當時一部分士大夫新官僚因窺破滿清政府之無能與中國民族的危亡，亦走向同情與參加革命推翻滿清統治的方向。這些就是辛亥革命的力量，這些力量，在推翻滿清的共同目標下形成一支強有力的統一戰線，在辛亥革命前不斷的與滿清政府鬥爭。

另一方面反革命的營壘就是滿清政府與擁護滿清政府的腐敗官僚、大地主、舊軍閥、大買辦。這些反革命，有的與滿清統治休戚相關，有的與帝國主義相互聯結，企圖維持其對羣衆的榨取而積極擁護滿清統治，以各種方式來反對革命。至於各帝國主義對中國當時的革命運動，形式上雖然表示中立，或有個別對清朝不滿，但一般的則實際上從各方面幫助與支持滿清的封建統治，因為滿清政府的統治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究竟是適合的。

這兩個革命與反革命營壘的對立和爭鬥就掀起了辛亥革命前革命運動的發展和領導革命運動的政黨的出現。

首先，就是興中會與同盟會的出現。興中會是在中日戰爭後一部分市民層和少數會黨分子組織起來的，主要的領導者為孫中山先生。興中會最初沒有明確的政綱，且帶着濃厚的改良主義色彩，只要求「富國強兵」，使中國能與歐美并駕齊驅，只要求政府施行改革，並沒有明確企圖以羣衆力量

來推翻滿清政府。及後，因為滿清政府進一步的腐敗與喪權辱國，才推動了他們新的覺醒，明確地由改良主義走向革命的方向。孫中山先生首先確定了三民主義的主張，並從自己活動的經驗，進一步地認為會黨是當時最可依賴的力量。隨後興中會即與光復會（以章太炎為首領）、華興會（黃興為首領）合併，組織同盟會。同盟會的綱領已經比興中會更為進步與明顯，同盟會宣言的口號是：驅逐韃虜（滿清政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同時又公佈黨綱六條：（一）推翻滿清政府；（二）建立共和民國；（三）維持世界真正和平；（四）主張土地國有；（五）主張中日兩國國民的聯合；（六）要求世界列邦贊成中國革命事業。這些綱領是根據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定出來的，而這些綱領正說明了：市民層的代表者已經進一步地放棄了過去改良主義的企圖，代之以推翻滿清政府的綱領，指出了新的革命政權建立的必要。可是，興中會與同盟會綱領雖則都同樣地表現了自己痛切當時列強的環伺，國勢的岌危，對於救亡圖存，大聲疾呼，但也有其共同缺點，就是兩者都沒有明確提出反帝的具體主張，沒有明確將反帝當作一個鬥爭的任務。當時興中會與同盟會的領導者，還以為列強能夠同情與援助中國革命，這正說明當時的革命政黨還沒有清楚看到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和滿清政府對帝國主義的屈服投降與變質為奸。可是不管如何，同盟會是市民層代表分子和當時工人農民及一新士大夫推翻滿清統治的聯合戰線的革命組織，是領導辛亥革命的政黨，那是無疑的了。

辛亥革命前，中國同盟會根據中山先生所指示，由已往

的教訓與實際鬥爭的經驗，覺悟到革命的勝利非有力量的依靠是不可能了，於是便在三合會特別在哥老會與華僑留學生中活動，另一方面則積極在滿清的軍隊（所謂新軍）中進行工作。這種轉變顯然和過去自由資產階級上層知識分子與勞苦羣衆相隔離的改良行動，完全不同了。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夠很快地推翻滿清政府，一方面是由於有廣泛的反滿統一戰綫，另一方面也就是由於有力量的依靠。列寧說得正好：「如果沒有民衆底偉大精神的和革命的高漲，中國民主派就未能推翻中國的舊制度，就未能爭得共和國。這種高漲，就需要和產生一種對勞苦羣衆的狀況所表示的極懇切的同情與對他們壓迫者及剝削者所表示的極熱烈的仇恨。」

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平均地權，就是在這樣需要中產生出來的；而聯合會黨的政策也正是這樣需要的反映。

本來哥老會三合會「反清復明」運動的發展，是由於滿清政府對於漢族的壓迫，使當時帶着民族獨立運動性質的羣衆秘密結社到處興起，這些組織均以「反清復明」相標榜，首先就是三合會，三合會活動的主要區域爲廣東，福建一帶，後爲滿清政府壓迫，又多數逃往海外。一九〇〇年三合會曾與興中會聯絡共同起義於廣東之惠州。除三合會外，尚有哥老會的組織與活動，其性質大略與三合會同，主要活動地區爲長江流域，勢力頗大。清末曾企圖舉行暴動，推翻滿清，事洩，旋遭失敗。這些秘密結社以後在同盟會的指導下，曾不斷參加鬥爭。

在同盟會的推動下，不僅哥老會等積極參加反對滿清政府的鬥爭，而新軍亦日益革命化。他們大都是破產的農民、

手工業者和游民，他們對於滿清的統治充滿仇恨，因而任辛亥革命前會不斷的譁變和起事，至辛亥革命時新軍就成爲一支革命的主要力量。

辛亥革命前，華僑是積極地參加革命運動的。他們不僅在國外積極支持興中會同盟會的活動，而且紛紛回國參加直接的革命鬥爭。辛亥革命前興中會同盟會在各地進行的暗殺行爲與軍事陰謀的起事，都有華僑的積極參加。

在興中會與同盟會的領導下，發動了不少的革命鬥爭。如興中會奪取廣州城的企圖，一九〇〇年的惠州起義，一九〇四年的長沙企圖起事的失敗，一九〇六年（同盟會領導，哥老會亦參加）革命軍在湖南瀏陽的起事（萍鄉礦工是這次起義的主力，是中國工人自發參加英勇政治鬥爭最重要的一幕）。其次是欽廉與鎮南關、河口之役；一九一〇年廣東新軍的譁變。最後是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七十二烈士死難之役。這些鬥爭在滿清政府的血洗下都失敗了，然而這些鬥爭却是辛亥革命的序幕。在辛亥革命前，一九〇八年八月，列寧在「世界政治上的引火物」一文中，曾寫道：「在中國，近幾月來，反中世紀制度的革命運動也特別表現得很厲害。固然，關於這運動（正是這個運動），還不能做出什麼確定的結論出來——因爲關於運動的消息很少，而關於中國各地變亂的消息倒很多；可是中國「新精神」及「歐洲潮」底厲害的發展，尤其是日俄戰爭後，這是毫無疑義的；因此中國舊式的暴亂也必然會進爲有覺悟的民主運動。」列寧觀察得是很正確的，那些散亂的起義，結果就結合爲一個有力的革命的爆發。

五 辛亥革命的經過

帝國主義對華投資，在中國興築鐵路，而滿清政府則出賣築路權利。這種行動給了中國人民很大的刺激而資產階級又正企圖投資於交通工業，想自己來建築鐵路，於是就爆發了一九一一年的爭路風潮。

一九一一年四月，滿清政府宣佈鐵路國有。實際上這種鐵路國有，就是將鐵路的一切權利交給帝國主義。所以當時直隸的人民、商人、資產階級就首先反對鐵路國有，堅持鐵路商辦的成案。接着湘、粵、川、鄂各省人民紳商羣起反對，有謂『今政府忽又宣佈國有政策與民爭利，是不啻奪我生命財產付諸外人。』川、鄂、湘各省議員亦聯合爭路。海外華僑如旅美華僑與日本留學生亦羣起響應，許多地方發生罷市、罷課，甚至築路工人舉行暴動（如川漢路宜萬工人）。川、粵更設立『保路同志會』，與滿清政府交涉。滿清政府對於人民的反抗，採取高壓政策（趙爾豐在四川開槍擊斃爭路羣衆四十餘人），這樣就使爭路風潮愈演愈烈，加以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七十二烈士死難對於人心的激動，成爲辛亥革命的導火綫。

在全國民衆反對滿清的憤怒下，在滿清政府腐化動搖崩潰的情況下，在湘、鄂、粵、川爭路運動的基礎上，辛亥革命爆發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革命黨策動下的新軍一部分——工程營首先起義於武昌，佔領軍械局，進及督署。鄂督瑞澂棄城而遁，武昌乃入革命隊伍手中。起義新軍即改番號

稱民軍，改諮議局爲中華民國軍政府。武昌佔領後旋又佔漢陽、漢口。這是辛亥革命的第一幕。

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響應。湖南革命黨人與新軍聯合攻入長沙；南昌宣佈獨立；陝西新軍亦起義，佔渭南、臨潼、鄠城；山西新軍譚變，攻入撫署；雲南蔡鈞率軍起義佔省城；江蘇各地先後宣佈獨立；浙江革命黨圍攻撫署擒巡撫；廣東諮議局宣佈獨立；廣西諮議局亦宣佈獨立；福建革命軍擊敗廣兵。接着山東、四川、貴州、甘肅、新疆亦先後獨立。對武昌起義後不及一月，革命軍已佔有十餘省，滿清政權乃隨之瓦解。當時革命之迅速蔓延廣大，一面是由於廣大羣衆對滿清政府的不滿與新軍之革命化，隨武昌起義而到處響應；另外是一部分新官僚與各省商民，資產階級對革命的同情與擁護，隨武昌起義而威逼各省各地統治者實行獨立；而當時滿清統治的腐敗無能，正有利於革命迅速開展。

武昌起義後，滿清政府曾企圖作最後的掙扎，挽救其崩潰的統治。一方面希望用再度的讓步來緩和革命，於是頒佈憲法十九條，對君權大加限制，命袁世凱組織內閣，任袁爲內閣總理大臣；一面派軍向武漢民軍反攻，佔領漢陽，張勳則企圖固守南京與民軍血戰。可是這些企圖終不能挽救其崩潰的統治。

武昌起義後，各省代表齊集上海，在上海召集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議。會後各代表至武漢，起草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及民軍佔領南京，各代表乃回南京成立臨時政府，選孫文爲臨時大總統，從此中華民國正式出現於世界。接着南北

職和，清帝退位，事支革命暫告一段落。

臨時政府成立不久，就製定了有名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臨時約法」的內容為：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

第二條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第三條 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

第四條 中華民國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其統治權。

第二章 人民

第五條 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

第六條 人民得享有下列一項之自由權：

一、人民之身，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

二、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

三、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

四、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

五、人民有書信秘密之自由。

六、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

七、人民有信教之自由。

第七條 人民有請願於議會之權。

第八條 人民有陳訴於行政官署之權。

第九條 人民有訴訟於法院受其裁判之權。

第十條 人民對於官吏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為，有陳訴於平政院之權。

第十一條 人民有應任官考試之權。

第十二條 人民有選舉及被選舉之權。

臨時約法全文共七章五十六條，十二條以下全部從略。

六 辛亥革命的失敗

辛亥革命雖然在表面上推翻了滿清政府，但封建勢力並未剷除，反革命的力量仍未受到致命的打擊。在反革命尚保存有優勢力量的情形下，民軍方面就開始與反革命妥協了。

民軍與反革命妥協的表現，首先就是民清議和。在民軍佔領武漢、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民軍方面大多數的領導分子均以爲革命已經勝利，主張南北議和，以求得南北統一。爲着求得表面上的南北統一，求得清帝退位，孫中山先生向袁世凱提出五項保證和條件：第一，清帝退位，由袁世凱轉知民國政府；第二，袁須宣佈政見，贊同共和；第三，孫中山接到清帝退位之通知後，即行辭職；第四，由參議院舉袁爲臨時總統；第五，袁被舉爲臨時總統後，誓奉行參議院所定之憲法，乃能授受事權。

民軍與反革命妥協的另一表現，就是爲着取得清帝退位，不惜承認清帝遜位的條件。其內容：（一）保存清帝尊號；（二）每年發給清室經費四百萬兩；（三）保護清帝及皇族原有財產及宗廟陵寢；（四）清王公世爵概仍其舊。顯然的，當時民軍不僅沒有去摧毀封建統治政治機構及其武裝力量，而且對滿清政府亦表示妥協優容。民軍方面的這種妥協的發展，結果使革命由勝利轉到失敗，使中國反革命力量從滿清政府轉向以袁世凱爲中心的政府了。

在民軍妥協行動下，臨時總統選舉會的結果，袁世凱當選爲總統。從此袁世凱便掌握了政府的大權。袁世凱當選後，

發生了國都的爭論。孫中山先生主張以南京爲國都，這樣可給北洋軍閥以束縛。袁世凱則極力反對。南京參議院雖曾派代表北上歡迎袁世凱南下就職，但終無結果。袁世凱並且故意在北京天津製造兵變，爲不能南下的藉口。參議院因此決議允袁世凱在北京就職，袁世凱乃於北京就總統職，以唐紹儀爲內閣總理，政府乃從南京遷入北京。袁世凱當選總統、政府遷入北京是反革命北洋軍閥進攻革命的第一步計劃和第一步勝利。

袁世凱進攻革命的第二個步驟便是掌握政府中的全部權力，實行總統個人的獨裁。當時唐紹儀任內閣總理，但在袁世凱的束縛與逼迫下終於辭職了，同盟會的閣員亦隨之而相繼辭職，袁世凱乃提出陸徵祥代理，陸稱病不就，乃以袁黨趙秉均組閣。從此內閣就成爲北洋軍閥的御用機關，袁世凱就遂行其個人的獨裁了。此外袁世凱更積極設法刺殺革命黨的領袖。宋教仁在滬之被刺殺，就是袁世凱所指使的。

反革命進攻革命的第三個步驟，就是擴充反革命的武裝力量，向革命大舉進攻。袁世凱當時最主要的依靠，便是日本帝國主義，而一九一三年袁世凱更藉日本之助，向五國銀行團（英、法、德、日、俄）借款（所謂善後借款）達二千五百萬磅（以鹽稅爲担保），爲添置軍械擴充軍隊之用，以進攻革命。同時積極剝奪革命黨人職權，下令（民國二年）免國民黨都督職（即江西之李烈鈞，廣東之胡漢民，安徽之柏文蔚），以遂行其反動統治。

在北洋軍閥對革命的着着進攻下，國民黨（當時同盟會改爲國民黨）不能不於一九一三年在袁世凱之免國民黨三都

督職命令發出後發動二次革命，這是革命黨在妥協完全失敗後，企圖挽救革命局勢的反攻。二次革命是以討袁相號召，出動的民軍均稱「討袁軍」。當時李烈鈞起兵湖口；黃興則進佔南京；安徽、福建、廣東、湖南亦相繼響應。討袁軍發動後，隨即派出隊伍至徐州塔擊袁軍南下。其時袁世凱即組織「國軍」，大舉南下向討袁軍進攻。結果國民黨之討袁軍完全失敗，北洋軍閥的統治遂得到暫時的穩定。

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乃向革命作最後的進攻，這就是修改約法與解散國會。袁世凱首先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議員資格，不久又下令停止國會開會，解除兩院議員職務。各省省議會亦相繼被解散，另以北洋軍閥御用的政學會議代之。末後更組織約法會議，修改「臨時約法」，另制新約法。袁氏詔依新約法的規定廢除國務院，設立政事堂，至是名義上之內閣制亦宣告解體，而袁世凱事實上則成為唯我獨尊的「皇帝總統」了。袁氏之由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助，獲得獨裁，就是以後袁世凱稱帝的基礎。

至此辛亥革命是流產了，在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代表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的摧殘下完全失敗了！雖然北洋軍閥的統治代替了滿清政府的統治，雖然中華民國代替了大清帝國，可是辛亥革命並沒有完成推翻帝國主義肅清封建勢力的革命任務，並沒有開闢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道路，而整個中國民衆且由於北洋軍閥的出賣，則依然並進一步在帝國主義的奴役下，封建勢力的榨取下，度着黑暗慘痛的生活。

七 辛亥革命的經驗與教訓

辛亥革命是中國第一次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一革命所需要完成的任務，是推翻封建勢力和爭取民族獨立，客觀上是要求開闢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大道。至於辛亥革命的動力，無疑的是工人、農民、手工業者、資產階級，在實質上，資產階級則是這一革命的領導者。

辛亥革命是失敗了。雖則如此，辛亥革命也是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第一，辛亥革命第一次在中國推翻了世界歷史上最古老的專制皇帝政治制度，開闢了中國和重新亞洲民主共和國的新陽光，這對於中國後來的歷史的發展，甚至對於世界一般文明歷史，都有很大的意義，特別因為中國是擁有四萬萬數千萬人口的國度，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這在亞洲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國度。明白了這點，我們正可以進一步地明白：為什麼亞洲新起的反動的堡壘——日本帝國主義者在辛亥革命後，會那樣起勁地幫助袁世凱消滅革命，幫助他建立一切可憐反動的統治。辛亥革命的第二個歷史意義，就是：在當時中國人民反帝爭取民族獨立自主的鬥爭中，首先推翻了滿清在中國所建立的民族牢獄，這在當時客觀歷史上，曾是一個正確的步驟，而帝國主義者為維持其在華的統治，正是要維持這中國國內自己為滿清所建立的民族牢獄的。

所以說，辛亥革命會有其成就的某一面（當然，這是不可誇大的），這就是推翻了代表數千年來專制皇帝制度和代表國內牢獄的滿清朝廷；而革命在這點上之所以會那樣迅速

地成功，就是因為當時有最廣泛的反滿民族統一戰綫，革命所聯合的階級範圍及革命直接間接的後備軍，都很廣泛，使清廷陷於孤立。各帝國主義者雖希望維持滿清的統治，但在革命力量的脅迫下，表面上却不能不採取中立的態度，還沒有立即公開幫助反革命來進攻革命。

辛亥革命的所以失敗，重要的原因之一，也就是因為當時革命統一戰綫的分裂。因為反帝的意識不明確，當時以同盟會為中心的統一戰綫聯盟僅僅是在推翻滿清政府的共同目標下形成的，因此在滿清政府推翻後，這一聯盟跟着瓦解，革命力量隨之渙散，同盟會也就瓦解完了。當時流行着一種口號，所謂：『革命成功，革命黨消。』許多同盟分子另組織其他政黨，反對革命的繼續，同時，當時同盟會又與統一共和黨等合併而成的國民黨，集合官僚政客為一集團，喪失了革命的性質，而其黨員也就僅僅進行一些議會的活動。革命陣線這種分裂，以及當時革命黨人這種腐敗，恰給反革命的進攻以最大的便當，而當時反革命的代表者——袁世凱也正是首先從分化革命營壘和腐化革命分子來着手，以進攻革命的。

辛亥革命失敗的第二個原因，可以說是還沒有把廣大羣衆真正動員起來。雖然同盟會的活動已經不像過去自由資產階級上層分子那樣同羣衆完全隔絕，而在哥老會中曾進行不斷的工作。可是哥老會中工作的目的是經過哥老會去進行新軍中的活動，以實現其軍事陰謀，而不是真正去改造哥老會的組織，去訓練教育哥老會的羣衆使成為革命的力量。正因為辛亥革命是單純憑藉軍事力量的軍事投機，所以在組織羣

衆發動與領導廣大羣衆到革命運動中來的任務是沒有做到。譬如當時廣大羣衆的抗捐抗稅的運動與爭路風潮，同盟會並沒有認真去組織與領導這一運動。中華民國成立後，雖則中山先生曾到處呼籲民生主義呼籲平均地權，但革命黨人關於改善羣衆生活，發動羣衆的問題則終究置諸腦後，而沒有真正把羣衆發動起來，保障革命的發展和勝利，都是不可能的。

辛亥革命失敗的第三原因，是革命對反革命的妥協。革命沒有去謀破壞數千年來腐敗的官僚軍隊制度，而且相反地把革命政權讓渡給這種制度的萬惡代表者——繼滿清而起的代表者——袁世凱，讓他假借民國的名義，去做禍國殃民的勾當。事後孫中山先生對此是極痛心的，而且屢次拿這個事實來警戒革命黨人和國民。

辛亥革命失敗的第四原因，是帝國主義者援助反革命進攻革命。革命開始時，帝國主義者表面上雖則採取中立的態度，客觀上有利於革命的發展，但事實上帝國主義者正暗中進行軟化革命黨人，逼其走上妥協的道路，同時用各種方法以幫助袁世凱的上台，直到袁世凱掌握政權，各帝國主義更公開積極援助北洋軍閥來進攻革命了！各帝國主義付給袁世凱巨量的善後借款便是明顯例證。北洋軍閥統治的維持與鞏固正是便利於帝國主義向中國的侵略的。

然而辛亥革命的失敗，並不能完結中國的革命。反之，這種失敗的教訓，却會教育出更偉大的革命。

第四講 五四運動

一 五四運動前後中國的形勢

一 世界大戰中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

一九一四年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英、法、俄、德、美等帝國主義都忙於內部的戰爭，不能以政治經濟的力量，大規模向中國侵略了。不僅無形中放鬆了對中國的侵略，而且處處向中國表示好意，允諾修改關稅稅則，緩付庚子賠款等，以便拉攏中國參加世界大戰。但日本每利用其接壤中國的特殊地位，利用歐美各帝國主義放鬆對中國侵略的時機，大舉向中國侵略。

日本帝國主義首先利用對德宣戰的機會，於一九一四年調海陸軍二萬餘人，佔領膠州灣、青島及膠濟鐵路全綫與附近礦區。從此山東就由德國的勢力範圍一變而為日本的勢力範圍了。

其次，日本帝國主義又利用歐戰時機欲獨吞中國，一九

一九一五年向中國政府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二十一條內容分五部分，最主要爲：

第一號，第一款：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本國政府擬向德國政府協定，所有德國關於山東省依條約或其他關係對中國政府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處分之即行承認。第二款：中國政府允諾凡山東省內並其沿海一帶土地及各島嶼，無論何項名目，概不讓與或租借與他國。

第二號，第二款：日本人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爲改造工商業應用之房廠或耕作，認可其需要土地的租借權或所有權。第六款：中國政府允諾如中國在南滿洲及東部蒙古，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顧問教習，必須先同日本國政府商議。第七款：中國政府允將吉長鐵路管理經營事宜委任日本國政府，其年限自本約畫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爲限。

第三號，第一款：兩締約國互相協定使將來相當機會，將漢冶萍公司作爲兩國合辦事業，並允如未經日本國政府同意，所有屬於該公司一切權利產業，中國政府不得自行處分，亦不得使該公司自行處分。

第四號，中國政府允許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島嶼概不讓與或租借與他國。

第五號，第一款：在中國中央政府內須聘用有力的日本人充爲軍事、財政、政治等項顧問。第三款：向來中日兩國屢起警察案件，以致釀成糾葛不少，因此須將必要地方之警察作爲中日合辦，或在此等地方

之警察官署，須聘用多數日本人，以資籌劃改良中國警察機關。第四款：向日本採辦一定數量之軍械（爲中國所需要的軍械之半數以上），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並採買日本材料。……

日本帝國主義當時一面以援助袁世凱稱帝的誘惑，一面遣艦隊集結廈門、吳淞、大沽，增兵山東、南滿相威脅，逼使袁世凱政府承認二十一條，五月七日日本乃向袁世凱提出袁的美敦書，至五月九日（一九一五年）袁世凱政府乃正式承認二十一條約。這就是歷史上的「五九國恥」。

袁世凱死後，安福系領袖段祺瑞上台，段祺瑞素來是親日派，日本經過段祺瑞任中國獲得了許多特權。後來段祺瑞以參戰（中國參加協約國作戰）等爲名，大量向日本借款，使日本在中國獲得更多的權利。日本也就利用借債給中國來施行其對中國進一步的侵略。段祺瑞向日本的借款有這樣的十個統計：

名 稱	數目(日金十位)	借款年代
第二次善後借款	10,000,000	1917年
交通銀行借款	20,000,000	1917年
吉長鐵路借款	6,500,000	1917年
第一次軍械借款	16,000,000	1917年
直隸水災借款	5,000,000	1918年
第三次善後借款	20,000,000	1918年
有綫電報借款	20,000,000	1918年

無線電報借款	530,000	1918年
吉會鐵路借款	10,000,000	1918年
第二次軍械借款	23,643,762	1918年
金鑛森林借款	30,000,000	1918年
滿蒙四路借款	20,000,000	1918年
濟滬高徐鐵路借款	20,000,000	1918年
參戰借款	20,000,000	1918年

據日本的報告，還有滿蒙鐵路正式借款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修路借款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沒有算在裏面。

當時中國官僚政府，藉參戰為名大借外債，實際上並沒有參加外戰，而是將這些借款用在軍閥內戰之上。當時有句說話，『對外宣而不戰，對內戰而不宣』，正是描寫得很恰切的。

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日本帝國主義一方面懼怕革命運動影響到日本來，另一方面卻又藉口所謂共同『防敵』，乘機對中國進行軍事佔領的陰謀，勾結段祺瑞，締結所謂『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同時也即是『防共』的軍事協定，依該協定日本軍隊可以自由進駐吉林、黑龍江與外蒙古，而中國之軍事扼要地，皆可被日軍駐紮。日本進攻蘇聯與拉攏中國加入防共陣綫，本來並不是今天開始的。

二 世界大戰中和大戰停止時候中國的分裂

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中國的形勢一面是日本帝國主

義的拚命侵略，另一方面便是中國內部的分裂。當時中國陷於一種混亂的內戰的局面。而這種內戰的局面，主要的是由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謀所造成的。

自從辛亥革命完全失敗後，袁世凱已成為唯一的獨裁者了。袁世凱首先得到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援助順利地進行了反對二次革命的戰爭，隨後袁世凱即企圖恢復君主專制政體來維持與鞏固其反革命的統治，在帝國主義大戰中以日本帝國主義為後援，積極進行其帝制運動，首先指使其黨徒組織籌安會（即帝制籌備會）與陰令各省之袁黨響應贊助所謂君主立憲制。其次是利用公民團的請願與組織御用的國民大會以達到其稱帝的目的。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凱乃正式稱帝。

袁世凱稱帝的消息傳到各省後，中國南方便積極的反對。首先是雲南唐繼堯通電反對，宣告獨立，於一九一六年一月組織雲南都督府，并令蔡鍔率護國軍向四川進發，與曹錕、張敬堯等部苦戰於敘瀘之間；貴州、廣西、廣東、湖南等省亦相繼宣佈獨立；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護國之役』。護國運動的開展，迫使袁世凱不得已於三月下令撤消帝制，以保全其總統地位。當時護國軍堅持要袁氏退位，不久袁世凱乃憂懣而死。袁死後，黎元洪代大總統職，以段祺瑞任國務總理。

一九一七年因對德宣戰問題，黎元洪與段祺瑞發生爭執，段乃利用各省督軍團之力，一面反抗國會關於罷免段內閣主張，一面脅迫大總統解散國會，黎元洪被迫，國會乃遭解散。至七月，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下，張勳復辟運動發生，擁宣統聽政，盡復清朝舊制。當時黎元洪逃入日使館中，並

通電各省出師討逆。不久討逆軍進逼北京後，經過十餘天的圍攻與巷戰，復辟軍全被擊潰，復辟運動乃撲滅。繼而曹錕辭任總統，段祺瑞乃組織御用的新國會（世稱為安福國會），北方政府進入馮段專政時期。

當國會被段祺瑞解散時，國民黨議員在南方進行護法運動，以孫中山為首領，在廣州召集非常會議，成立護法軍政府，選孫中山為海陸軍大元帥，至此中國乃正式形成南北的對立。當時北方政府之段祺瑞，在日帝國主義的援助下，採用武力政策，乃爆發南北之戰，南北軍激戰於湖南，互有勝敗。

此時在北洋軍閥系統中分裂成直皖二派，直派以馮國璋為首，以英帝國主義為其依靠，皖系以段祺瑞為領導，以日本帝國主義為其主人。但事實上，日帝國主義者對於兩派也都加以操縱。後來日帝國主義者因段祺瑞宣言軍事協定作廢，就利用另一親日勢力——張作霖做首領的親日勢力，與吳佩孚結合起來，爆發了直皖戰爭（一九二〇年），皖系敗北；日帝國主義在段祺瑞敗後，因又陰謀挑撥奉直戰爭，以及北方不斷的軍閥混戰。

在南方軍政府下亦發生分裂。桂系陸榮廷主張與北方政府議和，孫中山被迫辭職，以後孫中山又利用陳炯明擊敗桂系，爆發粵桂戰爭；可是不久陳炯明又回頭驅逐孫中山，形成南方不斷的分裂與戰爭。

民國以來，中國不斷的內戰，一方面正反映了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中矛盾的加劇，另一方面也是軍閥間爭奪地盤壟斷封建割據局面的鬥爭。

三 世界大戰中和大戰停止初期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因爲在世界大戰中歐美帝國主義放鬆了對中國的侵略，使中國資本主義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首先從外國機器的輸入可以看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情況，雖然機器輸入也有爲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工業的。下面便是機器入國數目的統計：

年 代	輸入中國機器價值 (單位百萬美金)
1913 — 16	55.0
1617	6.7
1918	10.2
1919	21.5
1920	18.5
1921	44.7
1922	42.8

其次，是紡織工業的發展。下面便是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國紡織工業發展的情形：

年 代	廠 數	紡 錠	布 機
1915	22	544,010	2,254
1919	29	659,721	2,650
1920	37	856,894	4,540
1921	51	1,238,903	6,650
1922	64	1,593,034	9,817

麵粉工業在歐戰中也開始發展。一九〇〇年中國只有二所麵粉工廠，一九一六年便增加到六十七所了。(至一九二五

年調查中國國內有新式麵粉廠一百二十餘所，中國廠佔一百零七所，中外合辦五所，外廠佔十二所。在歐戰爆發之後，中國曾由麵粉輸入國一躍而為輸出國。至一九二二年，中國麵粉工業才開始低落。請看下表：

年 代	入口(担)	出口(担)	入超或出超
1912	3,261,501	637,484	2,624,017(入超)
1914	2,166,318	87,000	2,080,000(入超)
1915	158,237	216,225	57,952(出超)
1916	223,464	284,747	56,283(出超)
1918	4,551	2,011,906	2,007,355(出超)
1920	511,021	3,960,779	3,449,758(出超)
1921	752,673	2,047,004	1,294,331(出超)
1922	3,600,667	593,255	3,107,721(入超)

絲業方面，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七年上海共開設絲廠六十三家，這說明歐戰後中國的絲業也在發展中。

其他，如火柴業、水泥業等等，於歐戰時期中及歐戰後也開始發展起來了。

銀行事業也在歐戰之後開始發達。滿清時，僅有七行，一九二三年已達一百餘家了。最著名的約有七十家，如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鹽業銀行、金城銀行、中南銀行、上海銀行、大陸銀行、中孚銀行等都是很著名的。下面有這樣的一個統計——辛亥革命後中國新設銀行的統計：

年 代	新設銀行數目	資 本 總 額
滿清時代	7	34,739,000 (元)

1912	7	75,145,000(元)
1913	1	5,000,000(元)
1914	3	8,000,000(元)
1915	3	26,000,000(元)
1916	6	3,420,000(元)
1917	7	13,778,000(元)
1918	11	14,400,000(元)
1919	12	82,165,000(元)
1920	19	56,290,000(元)
1921	28	46,153,000(元)
1922	8	————
1923	15	————

在歐戰期中，以及因歐戰後初期各國革命的爆發，不管日本帝國主義如何侵略，中國內部如何軍閥的混戰，因為歐美帝國主義放鬆了對中國的侵略，中國資本主義總是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當然，這些發展還是有限的，而且只是限於輕工業方面，至於重工業的發展則是極其微弱的。正因如此，中國資本主義仍然脫不了對帝國主義的依賴，依然不能不受到帝國主義的束縛，而不能獨立發展起來。

跟着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資產階級的力量比較強大起來。同樣，無產階級的力量也更加壯大了。這樣就奠下了『五四』運動的社會經濟的基礎。

二 五四運動的發生及其經過

一 中國自覺的發展——新文化運動的發展

隨着中國物質力量的新發展，中國正也走上新的自覺的道路。當日本帝國主義者利用歐戰機會在中國煽惑內亂，煽惑袁世凱稱帝，煽惑張勳復辟……進行這種無恥的勾當，企圖把中國拉回黑暗的中世紀時代的時候，在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中國反抗的黎明。中國歷史上不朽的革命偉人——李守常（大鈞）在民國五年已做了這樣的號召：『……吾族青年所當信誓旦旦，以昭示於來世者，不在齷齪辯證白首中國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年中國之再生。吾族今後之能否立足於世界，不在白首中國之苟延殘喘，而在青春中國之投胎復活。』要求中國的再生——這就是當時中國的覺醒。爲着得到中國的再生，這位哲人號召中國青年和黑暗相搏戰：『青年之自覺，一在衝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圍園，勿令殭屍枯骨，束縛現在活潑潑地之我……』從民國四五年開始，中國即在騷躍着新文化運動（啟蒙運動）的洪流，當時大部分先進的智識分子，都投稿到『新青年』雜誌，因此，使『新青年』成爲這潮流的代表刊物。

當時啟蒙運動偉大的功績，第一便是敢於公開向舊的教條挑戰，提倡科學和民主；第二便是敢於公開宣告『古文』爲死文學，而主張白話文，並以身作則，寫白話的文章。活潑，新穎，而理智——這些就是當時文化的新氣象，而李大

劍、魯迅、吳虞——這些人實是當時最猛進最優秀的代表。陳獨秀雖因為是「新青年」的編輯而得到了大名，但思想上究竟不如他們深刻，而且隨處表現了悲觀主義（如他寫道：「予於國之老者壯者與夫比諸老者壯者之青年，無論屬何社會，隸何黨派，於生理上心理上，十九懷抱悲觀，即自身亦在詛咒之列。」），毀謗民意（認為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是由於「多數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在哲學上，陳獨秀正表現了自己是一個標本的二元論者。

新文化運動的開展，正是表現了中國人民愛國意識的開展。這種愛國意識的發展（基於物質力量的發展），一到了相當時機，羣衆就會以驚天動地的行動表現出來——這就是五四愛國運動。

二 世界革命運動對中國覺醒的影響

在歐戰中和歐戰後，世界革命運動對於中國的覺醒，是有鉅大的影響的。特別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蘇維埃政府曾發表一個宣言，取消帝俄時代與中國訂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帝俄時代在中國的一切特權，主張援助中國民族獨立解放運動。這一宣言發表後，使中國對聯蘇的態度一新，對蘇聯表示好感，在天津、北京方面更有一部分工人學生，自動建立一種組織，宣傳蘇聯的革命勝利，對蘇聯的勝利表示無限的欣喜與真誠的慶祝。的確，「十月革命，在世界是一次空前的大革命，它喚起了東方被壓迫民族勞動羣衆的迷夢，而引起他們與帝國主義鬥爭（在波斯、中國、印度……）」（斯大林）

俄國十月革命後，開端着世界革命潮流的高漲，全世界捲入『革命與戰爭』中。十月革命後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中不斷爆發德國革命、奧大利革命、芬蘭無產階級革命、匈牙利蘇維埃紅旗的暴動、日本的稻米暴動等。此外殖民地革命運動則有土耳其的民族資產階級革命，印度、埃及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以及朝鮮的暴動。世界革命運動的高漲，更推動了五四運動的來臨。

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結束時，在和平會議上美國總統威爾遜在世界各國前面提出了騙人的十四條，其十一條說『扶助弱小民族』。這樣騙人的提議在全世界被壓迫民族中引起了一種幻想，這也給予五四運動的產生以相當影響。

三 五四運動的發生與經過

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結束，一九一九年各帝國主義舉行巴黎和會。這一和會當然是帝國主義的分贓會議。當時中國政府亦企圖在和會中撈回一些權利，在和會中提出下邊的希望條件：（一）希望列強放棄在中國的勢力範圍；（二）撤退各國駐華軍隊；（三）撤消各國在華的郵政電報；（四）取消領事裁判權；（五）歸還租借地；（六）歸還租界；（七）關稅自主。此外，並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條的陳述書及請求歸還歐戰時在山東被日本奪去的各種權利。當然帝國主義是不會答應這些要求的，所以和平會議也異常滑稽地解決中國提出的要求。帝國主義的強盜們說，二十一條不在和平會議的討論範圍內；至於希望條件呢，現在不是希望時期，將來再說。將山東問題列在和平條約十五六條說：『德國根據一

八九八年三月六日的中德條約，及其他關於山東省一切條約，所獲一切權利特權，膠州之領土、鐵路礦山、海底電線等一概讓於日本。』『德國所有膠濟鐵路權及其他支線權，及關於此項鐵路一切財產、車站、店鋪、車輛、不動產及礦山與開礦材料和附屬一切權利利益讓與日本。』『自青島至台灣之海底電線及其附屬一切財產無報償讓與日本。』結果中國的要求，都沒有得到絲毫的解決。和平會議所給予中國的利益，便是歸還八國聯軍入京時被德國奪去的天文儀器。中國參戰（參加世界大戰）的代價，便是無用的天文儀器。巴黎和會中中國完全失敗的消息傳到中國後，就掀動了中國人民的怒憤，五四運動就如火山的爆發開始了。

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中國後，中國民衆怒吼了！五四運動爆發了，中國民衆廣泛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來臨了。首先是中國留法學生起來反對巴黎和約的簽字，接着北京的學生也動員起來了，在『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絕和約簽字』、『廢止二十一條約』、『誓死爭回青島』、『抵制日貨』等行動口號下，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五千餘人在天安門集合舉行盛大的遊行示威。示威羣衆首先以懲辦親日派賣國賊曹汝霖（任交通總長）陸宗輿（幣制局總裁）章宗祥（駐日公使）爲目標，示威洪流擁至趙家樓，放火焚燬曹汝霖住宅，並痛毆章宗祥。當日反動政府立即派大批軍警鎮壓，拘捕大批學生，由此便引起了北京學生的總罷課，以示反抗。這一運動開始後全國各地紛紛響應，天津、上海、南京、武漢、福州、兩廣、山西、陝西、浙江、江西以及東三省等地學生也動員起來了！全國學生都捲入反帝的怒潮中去

了。全國學生及愛國人民首先是北京學生發出通電，散發傳單，並組織無數的講演團四出講演。講演的學生都充滿了愛國的熱情，講演時都『垂淚而道』，而聽衆則都『掩面而泣』激發了廣大人民對運動的同情援助與對賣國賊、賣國政府的切齒。這樣五四運動就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國了。

當時賣國政府，對於五四運動採取嚴厲鎮壓的手段。首先在北京除五四那天拘捕大批學生外，六月二日、六月三日更大肆逮捕講演學生達數千人，牢獄爲滿。被捕學生毫無懼色，在被解送的途中更發出『中華民國萬歲』等等悲壯激昂的呼聲，使當時道旁行人爲之洒同情熱淚！此外，當局更派大批軍警監視學校，不准學生外出講演，而學生依然衝出校門進行救國運動。反動政府不僅在北京，同時在其他各地，並對救國運動施行鎮壓：在南京，警察刺傷學生二十八人；在武漢，學生亦大批遭捕，並被軍警毆死一人；在福建，被殺學生爲數不少。這些說明當時的賣國政府，正努力替帝國主義者來鎮壓中國的救國運動。

當局的壓迫，絲毫也不能遏止開展着的愛國潮流，相反的，使學生更加團結組織起來了。於是在北京『五四』爆發後兩天，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領導着當時的北京學生救國運動。至六月，北京、天津、南京等處學生代表因情勢惡劣，集中上海，會商互相聯絡與援助等事，感到全國學生聯合會成立之需要，乃通電全國各地學生聯合會，各派代表來滬舉行成立大會，並進行籌備工作，至六月十六日開成立大會，這樣全國學生聯合會便誕生了。

至六月初，五四運動轉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由學生的罷

轉到商人的罷市、工人的罷工了。上海商人於六月五日罷市，其他各商埠也陸續罷市，資產階級開始捲入到運動中來了。工人的罷工，首先是上海銅鑄業機器工人罷工，接着印刷、紡織、火車、電車工人亦舉行罷工，其中以滬寧鐵路工人的罷工影響最大，這說明無產階級也進入到戰鬥中來了。這使五四運動成爲工商學聯合的廣大羣衆運動。

在廣大羣衆運動的壓力下，統治階級不得不讓步了。六月九日反動政府不得已乃罷免曹、陸、章的職責，並答應拒絕巴黎和約的簽字。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約中國拒絕簽字的電訊傳到全世界，就給了世界一個大震動。在帝國主義者心目中，弱小無能的中國這種舉動是太驚人了，而這種驚人的舉動，正是中國人民的力量所創造出來的。

四 五四對於新文化運動潮流的激發

上面說過，在五四運動發生數年前，中國已開始了新文化運動，一直陪着五四運動的爆發，而隨着五四運動的爆發，新文化運動在全國民衆中，就更如大海狂潮似地激發起來。提倡白話文，反對舊禮教，介紹新思潮，隨着愛國運動，普及到全國各角落。各種刊物，通俗報紙，新叢書，更如雨後春筍般發露。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潮，也正在這個時候較有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來。新文化思潮的往後發展，知識分子內部也開始了明顯的分化，有的看到國內民衆運動在愛國運動中所表現的偉大力量，看到中國工人階級在愛國運動中戰鬥的英姿，看到俄國革命的成功，因而追求根本改造中國的遺囑，這一部分知識分子的代表者，如李大釗、毛澤東、瞿秋

白、鄧代英……等，因編輯「新青年」而獲得了大名的陸獨秀，當時也是其中之一；有的則在學生前面，提出「讀書救國」，引導一部分學生研究國故，在哲學上主張美國杜威的實驗主義，在政治上主張一點一滴的改良——所謂「好人政治」，這部分知識分子的代表者，如胡適等；有的則完全失却本來英勇的氣概，頹唐消沉，高吟風花雪月，或崇拜佛敎，這部分知識分子的代表者，如朱謙之等。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以民國十年社會主義問題的論戰和民國十二年人生觀之論戰，為一個終點。此後很快地就走上政治上狂風暴雨的時代了。

三 五四運動的意義和教訓

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的羣衆革命運動。因為五四運動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抵制日貨、「廢除二十一條」、「爭回山東權利」、「拒絕巴黎和約簽字」的民族獨立運動，同時也是主張民主、主張自由平等、反對封建思想與封建勢力的一種民主運動。五四運動不僅使全國學生捲入了運動的漩渦，同時也吸引了資產者、小商人、工人參加戰鬥。它不是官僚、軍閥、政客、上層分子的活動，更不是軍事投機或軍事陰謀的行爲，而是一個廣大的羣衆運動。它把中國革命運動向前推進一步。同時它也是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大革命前夜的啟蒙運動。

五四運動中的主要力量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與工人。運動首先由知識分子發動起來，繼而商人、資

本家、小有產者與工人也捲進了運動的漩渦。它是知識分子、商人、資本家、小有產者與工人聯合的一種運動。這一運動的領導者，一般說來，是代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要求的知識分子。在運動中表現了知識分子愛國的熱情與英勇犧牲的鬥爭精神，同時也暴露了他們沒有革命堅持性的極大弱點。

五四運動的特點，從上面各方面的分析，可以特別地指出四點：第一，這運動是工商學自發的反日民族統一陣線；這自發的民族統一陣線對於當時反賣國賊和拒絕簽字巴黎和約的勝利，是起了決定的作用；第二，中國人民成千成萬集合起來，高舉反抗的旗幟在大街上示威遊行，中國學生成羣結隊到鄉村下去為喚醒國魂的呼號，中國學生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團結的組織，這些在歷史上要算是真正的第一遭；第三，這運動是新文化運動和羣衆愛國運動的合流，新文化運動是整個愛國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愛國運動意識上的表現，而又在愛國運動狂流中廣大地開展起來，中國自有新文化運動以來，到了這次，才表現了真正羣衆的性質；第四，這運動推動了中國民族最嶄新的人物——工人階級開始在各方面團結自己的力量，推動他們準備以嶄新的英姿走上中國政治上的大舞台。

五四運動要算是當時行將到來的中國大革命之序幕。啟導廣大人民的覺悟，準備革命力量的團結，這是五四運動最偉大的功績。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是在這運動發展中形成起來，同時，這運動也引導了業已陷於瓦解狀態的中華革命黨（國民黨）的新生。而如果沒有中共的產生和國民黨的改組，是不會有後來的大革命的。

第五講 中國共產黨的產生 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

一 中國無產階級的產生及其特點

帝國主義的侵略，一方面強大自己在中國工業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刺激着中國民族工業的相當發展，而中國無產階級也就跟着強大起來。直至今日，帝國主義在中國已經創造了與團聚爲自己掘墓的巨人——將近三百萬的近代產業的中國無產階級。

據一九三〇年的統計，南方九省二十九個城市中，工人的數量總計有一百二十萬零四千三百七十七人（第二次『中國勞動年鑑』）；同年據鐵道部交通部的統計，鐵路工人共有九萬九千七百五十四人。

據一九二七年蘇兆徵的統計，中國產業工人爲數達二百七十五萬，城市手工業工人有一千二百萬人。

蘇聯卡贊寧的估計，中國紡織工人有三十萬；絲織工人

約二十萬；礦工約有二十五萬；鐵路工人則在二十萬至二十五萬之間。至於工廠手工業的鹽業工人將入七十萬人（四川約有十萬人）；人力車夫約有一百五十萬人。

據另外一個統計（李達：『中國產業革命』），則中國工人的數量為二百七十五萬：

部門	人數	部門	人數
紗廠	280,000	絲廠	160,000
礦山	540,000	海員	160,000
鐵路	120,000	運檢(碼頭)	300,000
五金	50,000	建築	200,000
電氣	80,000	交通(郵電)	90,000
市政	250,000	鹽業	250,000
烟草	40,000	糧食業	60,000
印刷	50,000	其他製造業	120,000
總計			2,750,000

這些統計雖不是精確的（好些不是產業無產階級也計算在內），可是從此也可以知道，中國真正的產業無產階級的數量當在二百五十萬至三百萬之間。

在工人成分上說來，雖然佔絕對多數的是成年工人，可是在某些產業部門中（特別在烟草絲織工業中）也有不少婦女和兒童。至於在紡織工業中，則因地而殊。在上海百分之七十三為婦女，百分之六為兒童；在無錫男子僅佔百分之二十三；南通男子佔百分之三十。當然，在其他地區情形又不同了。武漢男子佔工人總數百分之五十三；天津佔百分之六十；而青島則佔百分之九十三了（見卡贊寧：『中國經濟地理』）。

中國無產階級在數量上雖然不大，但在質量上却有其許多特點，這些特點是在中國社會特性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

第一，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度，中國無產者是在這個國度中生長起來的。因為帝國主義在中國建立工廠獲得了特權，並佔有優越的資本和技術，民族工業是受帝國主義在華工業的排擠的，帝國主義在華工業比起民族工業的比重要大得多，而在帝國主義工業中做工的，也完全是廉價勞動力的中國工人，因此，一方面，中國無產階級富有半殖民地的民族特性，另一方面，中國無產者的力量要比資產者的力量來得大。

第二，又正為中國無產者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度中生長起來的，因此，中國無產者所受的剝削是三重的剝削——帝國主義的剝削，資產者的剝削，還加上半封建的剝削。如果說西歐資產階級從榨取殖民地半殖民地勞苦羣衆血汗中，以獲得的額額利潤的一部分去收買一部分本國工人階級上層分子，去緩和與分裂本國工人的鬥爭和團結，樹下其改良主義欺騙的經濟基礎；那末，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則情形又是另一回事。帝國主義在華的工業，對於廉價勞動力的中國工人，毫不放鬆其加緊的慘酷壓榨，帝國主義者把中國工人當成奴隸牛馬，加以任意鞭撻開除，在各方面進行超度的剝削，同樣地利用中國半封建的剝削方法，加之於中國工人身上，以增加其額外利潤。同時又正因為是半殖民地的中國，外貨充斥市場，整個經濟命脈操縱在帝國主義手中，不僅壓抑着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使中國民族工業成為帝國主義的附庸；使中國民族工業不僅喪失了與外貨競爭的能力，

而且要依靠加強工人剝削來苟延殘喘。因為只有對工人施行超度的剝削，半封建的剝削，才能補償其在外貨競爭下的損失。所以不論在中國資本家的企業或外資興辦的工廠中的工人，總是工作時間特別長而工資却特別少，待遇也非常惡劣。在帝國主義與中國資產者聯合榨取下，使中國無產階級忍受着最慘酷的剝削，度着最黑暗最悲慘的生活。中國無產階級受剝削得特別厲害，生活特別痛苦，就使其爭取解放的要求也格外迫切，因而也最容易接受革命思想的影響，最容易團結起來，同壓迫者與剝削者鬥爭，且在鬥爭中特別表示勇敢堅決與激烈，比較不易接受改良主義的思想。但是，這却不是說中國沒有改良主義思想的存在。因為中國無產者之半殖民地的民族特點，所以又使中國資產者可以進行某種程度上的民族改良主義的影響。

第三，中國無產階級的組成部分是比較複雜。在帝國主義向中國積極侵略下，不斷地產生了龐大失業破產的手工業工人、農民、小資產者，他們不斷地流到無產者這一羣中來，不斷地成爲中國無產階級的組成部分。同時，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的落後，『老工人』的數量也比較少，一般說來，中國無產階級是比較年青的。更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薄弱，產業後備軍的過剩，使中外資本家可以隨意開除工人，形成中國無產階級的流動性。這些，使中國無產階級內部存在着不少農民意識，行會觀念，流氓習氣等許多弱點，鬥爭的經驗也比較差。如果上面說的中國無產階級因為所受剝削的殘酷，比較不易受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而這些弱點，却又是一種空隙使中國統治階級得利用行會殘餘的或差役變

相的)工頭制度、或利用流氓頭目來搗亂工人階級的團結，散佈某些改良主義的蒙蔽。

第四，中國無產階級的又一個特點，就是他們由「自在的階級」的鬥爭轉到「自為的階級」的鬥爭的時候，即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在正確的道路上前進。如果說西歐無產階級的鬥爭還經過相當長期的轉灣抹角才轉到正確的革命道路，那麼，中國工人却經過很短的時期，便舉起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

中國無產階級的這些特點、優點和弱點，一面是以後中國革命運動中工人階級卓絕的英勇鬥爭與積極領導革命的重要原因；一面又是以後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時黨內各種不正確傾向和派別的一個根源，及其存在的條件（另一個根源，則為資產階級分子和小資產階級分子混進黨內所散佈的影響）。

二 中國共產黨的產生

跟隨中國無產階級之產生、壯大與覺悟程度之提高，中國共產黨也就產生了。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並不是偶然的，是由於：第一，帝國主義的侵略在中國開辦了許多企業，同時又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相當發展，產生了中國強有力的（雖然數量不大）無產階級。第二，中國無產階級在日常的鬥爭中，特別在參加五四運動的鬥爭中，不僅表現了中國工人力量的偉大，而且提高了中國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而感覺到組織自己政黨的必要。第三，俄國十月革命勝利與共產

國際創立後，在共產國際的積極幫助下，推動着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建立。在這些原因與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出現了。

在五四運動中，因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參加戰鬥，因為十月革命的影響，中國一部分急進的知識分子已逐漸的接受了社會主義的思想。『新青年』一步一步地變成爲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雜誌，而在五四運動這一年(一九一九年)中國急進的知識分子開始出版『每週評論』，介紹社會主義學說，討論蘇聯十月革命；在浙江創辦了『浙江評論』；在湖南毛澤東則出版『湘江評論』。這些刊物對於社會主義思想的散播，是當時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思想上的準備。不但如此，而且有些急進知識分子於五四運動後已在上海，開始在工人中工作，建立工會，組織了機器工會、印刷工會、紗廠工會，爲工人階級利益而鬥爭，在同一時期，北方工人中社會主義者幫助工人十人團的工作，設立勞動補助學校。這是中國共產黨產生在階級基礎上的準備工作。

一九二〇年春，共產國際派威經斯基和楊明齋（華僑，山東人）來華建立黨的組織。首先找到了陳獨秀，遂於一九二〇年五月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當時，首先加入組織的有陳獨秀、戴季陶、李漢俊、施存統、陳望道、俞秀松、李達、沈玄廬等八人，接着張國燾、劉少奇、羅覺、彭述之等亦加入了黨。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最初的小組織的形成。

上海中共小組織建立後，開始在其他地方發展黨的組織：在北平由張國燾發起，建立了黨的組織（最初僅七人），李守常、張申府及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袁明熊等就是在這

個時候加入黨的；在日本由施存統、沈雁冰發起組織（最初四人）；在湖南由毛澤東創立黨的組織；在湖北則由董必武首先建立黨的小組，吸收陳潭秋等入黨；最後，寫信到法國，在勤工儉學會中建立了黨的小組織，周恩來、李立三、羅邁、李富春、王一飛等都是在法國加入黨的；以後陳獨秀到廣東（陳炯明請他去任教育廳長），在廣東也有了黨的組織的建立。這一時期中，同時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凡有黨組織的地方同時就有團的組織。

一九二〇年各黨的小組織中發生了分化，無政府主義者益繼退出了黨。這一分化首先在北平的小組織中開始。北平小組織通過中共綱領時（北平小組織自己擬定的臨時綱領），因綱領中有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條，在討論時，黃凌霜表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爭論的結果，無政府主義者均退出了黨。在中國各地黨的小組織中也發生了同樣的分化（廣濟黨的小組織最初完全操縱在無政府主義派手中）。這時，黨內一面清洗了一批無政府主義分子，一面在組織上又吸收了一些新的分子進來。張太雷、鄧中夏、劉仁靜（在北平加入）、譚平山、陳公博（在廣東）、沈雁冰（在上海）、惲代英（在湖北）等就是在這一時期中加入了黨的。

各地方小組織建立後，工人運動開始加強，同時還出版了各種工人的刊物：在上海為『勞動者』；在北平為『勞動音』；廣東為『勞動聲』。從此中國工人運動就在中共領導下開展起來。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召集了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最初是在上海舉行，在會議快要結束時，因巡捕

搜查過激乃移於浙江之嘉興東湖繼續開會，一天而結束。到會代表共十三人，代表黨員共五十人左右。代表的產生是北平、天津、湖南、湖北、廣東、山東（這時山東也建立了黨的組織）各選派代表二人，日本選派代表一人。到會的代表有：毛澤東、張國燾、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李漢俊、周佛海、李達、陳公博等人（當時陳獨秀在廣東未到會）。共產國際派馬麟（荷蘭人，後加入託派，開除出黨）出席這次大會。

一次大會原擬討論：（一）中國共產黨宣言；（二）中國共產黨章程；（三）勞動運動問題。後因各種關係，中共宣言沒有討論（原來起草之宣言，會後以小冊子形式印發），大會僅討論與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章程，並着重討論了黨的組織上統一的必要。關於工人運動亦提出了具體方針。

一次大會開展了反對合法主義觀點和反對極『左』傾觀點的鬥爭。合法主義的代表人物為李漢俊。他認為今天中國共產黨只需要從理論上進行宣傳工作，只需要辦馬克思主義大學，辦圖書館，出版各種報紙；認為今天黨不應該發展組織，不應該進行工人運動，以為勞動運動在今天是無目的的。另一方面，則有以劉仁靜為首的極『左』派。他主張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奮鬥的目標，反對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反對任何合法運動，認為知識分子都是資產階級思想的代表，一般應拒絕其入黨。（劉仁靜後來成為託洛茨基的走卒）。大會堅決斥責了上述這兩種錯誤的觀點。一次大會反對合法主義和極『左』傾的機會主義之鬥爭的勝利，是以後中共的發展與中國工人運動開展的先決條件。大會對於孫中

山先生的進步運動，決定用黨外合作的形式助他。這原則的決定，是對於後來國共合作，發展廣大的反帝反軍閥的運動，種下了初步的準備。一次大會選舉了中共的領導機關，中共中央在一次大會中便正式成立。

中共中央成立後，黨內工作開始有系統的加強，勞動運動也進一步的推動與發展，建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等組織，出版了『勞動題刊』。一九二一年底和以後，各地工人的鬥爭大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

三 中國共產黨在工人中的活動

誠如上面所說過的：本來在中共未產生以前，中國無產階級早已開始了自己的鬥爭（這點證明了：關於『階級鬥爭』本來並不是共產黨『製造』的）。在五四運動中，不僅上海有鋼鐵業機器廠、印刷、電車工人與滬寧鐵路工人的罷工，而且京奉路唐山工人三千餘也積極參加五四運動，長辛店的工人亦羣起響應，使五四運動加進了一支雄偉的生力軍。雖然當時中國無產階級自己還沒有形成一個政黨，還沒有以領導革命的姿態出現於政治舞台。而工人階級這種鬥爭，恰是特別表現了自己的民族的色彩的。在一九一九年，中國工人的罷工運動已有長足的進展。例如一九一八年參加罷工的人數不過六千五百人，而一九一九年，罷工人數（據不完全的統計）已增加到九萬一千人了。

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經濟侵略中，嘗嘗先注意在中國建築鐵道、開闢航路、佈置其侵略的交通網，因而在中國共產

黨產生後，中共也首先特別注意在交通工人中工作。這是中國工人運動首先在鐵路海員工人中大規模地發展起來的一個基本原因。

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活動下，中國工人階級在五四運動消沉期間開始形成了自己的組織。當時京奉路唐山工人有職工同人會的組織，這是一種爭取工人階級利益的工會組織；在中共還未正式成立時候，長辛店工人有工人十人團的建立，十人團逐漸發展，成立了勞動補習學校，隨後在中共領導下，這種學校後來又轉變為工人俱樂部，並出版『工人週刊』，宣傳工人團結和組織的必要。此後工人的組織便逐步的擴大與發展起來了。

跟着工人組織的發展，工人的經濟鬥爭也日益開展起來。如一九二一年八月間長辛店工人開始進行加薪運動；十一月粵漢路工人因要求加薪而舉行罷工；同一時期臨海路工人舉行罷工，目的在於驅逐洋總管若見；十二月漢口人力車夫及香烟廠工人罷工；這一時期中最大的鬥爭還是香港海員的罷工。

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中華海員聯合會，因要求加薪不遂，領導全體海員罷工（主要的領導者為蘇兆徵——當時蘇兆徵雖未加入中共，但已是香港海員所公認的領袖），前後加入罷工之海員三萬餘人，接着香港全市苦力，運輸工人數萬人亦開始同情罷工。這一大罷工，堅持了八星期之久，結果得到了勝利，工資增加了百分之十五至三十。這一大罷工當時不僅得到了香港苦力工人及廣州工人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北方鐵路工人的積極援助。京漢、京奉、贛海、正太、京

綏等路工人，發起「香港海員罷工北方後援會」的組織，舉行多次大會，發出許多通電和文告，並舉行募捐運動，匯款二千元援助香港海員工人的罷工。這表現了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一開始便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剝削爭取自己的自由的共同目標下逐漸團結起來了。

香港海員罷工的意義，就在「英帝國主義在中國」（愛林諾爾·奔斯著）一書中也這樣說：「中國工人之大罷工，雖始於一九一九年夏季漢冶萍公司鋼廠，然首先當推廣東為工人活動之中心。一九一九年罷工結果，工人得如其要求增加工資。同年，廣州所成立之工會，凡二十六，其運動勢力，及於香港。一九二二年第一次之總工會成立於廣州，相因而產生之罷工事件，發生於各工業區域。在各罷工事件中，香港海員罷工最為重要。此次事件，相持至八星期之久；香港既為英國所屬，且為英國對華貿易中心，遂採用猛烈之處置以鎮壓罷工。

『一九二二年香港殖民地報告有云：海員罷工起自一月十三日迄於三月八日，其進行也，包括大多數之貿易在內，其影響於殖民地之商業甚巨。

『香港政府禁止這六萬罷工工人離港，而大部分之罷工工人，必欲離港，英兵遂開槍射擊。然罷工工人堅不屈服，其結果工資增加百分之十五至三十，而當罷工時，港政府所撤消之香港海員工會之特權，亦得恢復。

『自此次罷工以後，海員之組織，將中國舊式之行會制根本推翻，而成為一爭鬥之團體。影響所及，遂使中國之工人，成為最有力最奮鬥之分子。』

顯然的，這個鬥爭的意義是很偉大的。這個鬥爭本來就是一種民族鬥爭。這個鬥爭更明顯地指出了半殖民地中國工人運動之民族的特點。中國工人運動是在民族鬥爭中發展起來的，而工人運動的發展，其刀鋒就更不可免地要直接地對着帝國主義。不但如此，這個鬥爭的力量及其勝利，又開展了全中國工人的大團結，強大了中國工人階級對於自己力量及其領導革命的信心。

香港海員罷工的勝利，推動了中國各地工人罷工潮流的興起，工人組織也如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與加強起來了。當時工會組織最健全的是『京漢鐵路工會』和『安源礦工工人俱樂部』。繼香港海員罷工勝利接踵而來的，便是三月間上海紗廠工人的罷工；七月漢陽鋼鐵廠工人的罷工；八月間京漢路工人的罷工；九月間安源礦工的罷工。這些罷工大致都得到了相當的勝利。

工人鬥爭的發展，與工會組織的強大，就使中國工人覺悟到全國工人團結一致的必要。在共產黨的推動下，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在廣州舉行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到會代表一百七十人，代表工人二十萬。大會討論了工人參加民主革命、成立全國總工會等問題，這是全國工人團結與全國總工會誕生的先聲。

當時工人的鬥爭雖然得到了相當勝利，可是在鬥爭過程中，不斷受到帝國主義軍閥的壓迫，使中國工人階級迫切要求政治自由，而迅速轉向政治鬥爭的道路。於是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便開始了全國工人的勞動立憲運動，要求國會通過勞動立法案。這個勞動立法案共十九條，第一條是要求承認

工人集會結社自由，第二條要求承認工人同盟罷工自由，第三條要求承認工人團體的契約締結權，同時又要求取消束縛工人的治安警察法和罷工刑律。當然，當時直系軍閥豢養的國會，是不會通過的，結果工人沒有達到目的，但這是中國工人階級積極爭取政治自由的開端。

中國工人積極進行政治鬥爭的另一種事實，便是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唐山五礦三萬餘工人的罷工。這一罷工主要的目的，是反對外國資本家的虐待和要求加薪。這一罷工堅持了二十餘天，結果遭受帝國主義的走狗楊以德的武力壓迫。唐山礦工工會、京奉路唐山工人、洋灰工會均遭封閉，工人受傷者達五十餘人，工人領袖也被捕入獄。

這一件事，不僅引起了北方工人的憤激，而且教訓了中國工人階級爭取罷工集會、結社、言論自由的重要。因此在唐山罷工失敗後，全國各鐵路工會代表齊集北京，要求恢復唐山鐵路工會、鑛工工會和洋灰工會，並承認礦工條件。雖然這一要求當時沒有得到勝利，但由此可見工人階級團結的鞏固與爭取政治自由的迫切了。

這一時期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顯然表現了如下的幾個特點：

第一，中國工人鬥爭與民族鬥爭的聯結，在民族鬥爭中，更促進了自己的覺悟和團結。

第二，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特別是從交通工人中先開展起來，由鐵路海員工人鬥爭的勝利與發展推動了其他工人鬥爭的興起。

第三，因為中國工人運動開展的時候便在共產黨的領導

下，所以從工人小組織的形成與活動便極迅速的走上偉大的罷工運動。

第四，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首先是爭取工人生活改善的經濟鬥爭，這一經濟鬥爭的發展便迅速轉到政治鬥爭。由經濟鬥爭迅速轉變到政治鬥爭是中國工人運動的一大特點，是西歐工人運動中所少見的。

第五，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在鬥爭方式上由請願要求便迅速走上罷工、同盟罷工以至與統治階級的武裝衝突。這是中國無產階級鬥爭的激烈性、堅持性的充分表現，這也是常常停留在某一鬥爭形式下的西歐工人運動中所少有的。

最後，在這一時期工人的鬥爭中，各地工人鬥爭的互相配合與援助，充分表現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團結力量與組織力量。

四 「二七」慘殺的經過

一九二二年京漢鐵路工人的組織（工人俱樂部）已經就緒，且於八月召集了全路代表會議，組織鐵路總工會籌備會，進行京漢鐵路總工會的籌備工作。至一九二三年一月，籌備會決定於二月一日在鄭州開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並邀請各工團各界到鄭州參與典禮。

二月一日前京漢路各分會——長辛店、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順德、彰德、新鄉、黃河、鄭州、許州、鄆城、駐馬店、信陽州、廣水、江岸各分會代表到者計六十五人；各路代表到者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綏、隴

海、粵漢等代表計六十餘人；同時各業工人如漢冶萍總工會、漢陽鋼鐵廠工會、漢冶萍輪駁工會、花廠工會、人力車夫工會、香烟廠工會、揚子機器廠工會、武漢輪船工會、武昌機器工會、武漢電話工會等三十餘團體亦各派代表參加，共約百三十餘人；此外，尚有武漢及各地男女學生及新聞記者三十餘人參加。

正在工人代表準備開會之際，直系軍閥吳佩孚密令靳雲鵬等武力制止開會，因而二月一日各代表整隊赴會場開會時，途中突遭軍警包圍，舉槍示威，阻止代表赴會。工人代表大憤，派代表與之交涉，亦無效，乃奮勇衝開陣綫，擁入會場，正式開會，並宣佈京漢總工會的正式成立。開會時全場四週已盡被軍警包圍，會後，全體代表始衝出重圍，宣佈散會。

會後，軍警任意搗毀會場，迫令鄭州各菜館不得出售菜蔬與工會的代表，派兵監守代表所駐各旅館，不准來賓自由出入及互相談話，來賓出街，則以武裝軍警追隨，使代表與來賓完全喪失自由。當時各代表憤激萬狀，乃召集全體代表會議，決定各代表離開鄭州，並決議舉行總罷工，為反抗軍閥的壓迫，爭取工人的自由而鬥爭。罷工決議說：『我們為爭取自由起見，謹決于四號午刻宣佈京漢路全路總同盟大罷工。同時為了事實上的便利起見，總工會決移江岸辦公，全路一切進行，於罷工期內，全視總工會命令而定。我們是為爭自由作戰，爭人權作戰，只有前進，決無後退的。』

罷工決議發出後，二月四日上午十二時京漢路全體工人遂實行總罷工了。罷工中，工人提出下列五項要求：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漢路局長趙繼賢及南段段長張雲，要求吳、靳及豫當局撤革查辦黃殿辰（黃係鄭州警察局長）。

二，要求路局賠償開成立大會之損失六千元。

三，所有當日在鄭被軍警扣留之一切牌額禮物，要求鄭州當地官長用軍樂隊送還總工會鄭州會所；所有佔領鄭州分會之軍隊須立即撤退，鄭州分會之匾額重復掛起，一切會中損失由鄭州分會開單索償，並由鄭州官長到鄭州分會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日休息並照發工資。

五，要求陰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發工資。

這一偉大罷工給予軍閥資本家以極大的威脅，他們在工人罷工後屢用誘騙或嚇手段來破壞罷工，但均無效，於是一變其陰謀破壞的手段而為野蠻的屠殺了。

先是，『武漢各工團代表自鄭州歸來後，各以此次所受之壓迫與不自由當衆發表，有痛哭者，有憤誓者，奮發激昂的態度實可動天地而泣鬼神！全體議決，願以死力與京漢鐵路工人一致進行。遂於大罷工的第三日，由各工團各派代表數十百人，各持旗幟來江岸慰問，即在江岸舉行慰問大會。當時，合江岸工友到者約萬餘人，首由京漢鐵路總工會執行委員長楊德甫同志報告招待慰問代表的盛意，並申述此次大罷工之意義及希望；繼由工團各代表及真報館記者數十人演說，無不激昂憤慨；次由京漢路總工會秘書代表總工會向衆致辭，略謂「我們此次大罷工，為我們全勞動階級命運之一大關鍵，我們不是爭工資爭時間，我們是爭自由爭人權。」

們是自由和中國人民利益的保衛者。工友們，要曉得我們京漢工人的責任如何重大，麻木不仁的社會早就需要我們的赤血來澆染了！工友們！在打倒軍閥的火綫上應該我們去作先鋒！只有前進呵！勿退却！……」羣衆乘憤怒之餘，遂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由江岸經過租界以抵華界，歷二小當許，沿途加入三千餘人，所遇商民多高呼歡迎，巡捕崗警無敢阻攔，此種情形實爲僅見。又那知同時即有督軍代表與洋資本家在租界正大開會議，準備做從未僅見之大屠殺呢！（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關於「二七大屠殺之經過」的報告』）

至二月七日，在吳佩孚的指導下，蕭耀南便開始大肆屠殺工人了！首先以調解爲辭，誘工會派代表在工會相候談判，當工人代表赴會途中，慘殺便開始了：『遂由該參謀長（指蕭耀南的參謀長張厚生——編者註）戎裝指揮，率領全副武裝二營急馳而至，先將會所包圍，開槍環擊，計放槍在五排以外。當時有工友數百名在工會門前守候消息，躲避不及，又都赤手空拳，無從抵禦，當被亂槍和馬刀擊死者有曾玉良等三十二人，殘傷者二百餘人。在工會前槍殺之後，兵士乃分途搜捕，有一家又被殺男女三口，分會長之弟亦被殘殺，總會委員長之侄則被斬去其腿。於亂殺之頃，軍隊又大肆搶淫，計福建街一夜連洗三次，工人家庭所有細小都被一掃精光。當時情形之慘暴，灤江水漢河亦爲之嗚咽不流！

『當江岸分會被殺害之時，有工友六十人被捕去，該分會正執行委員長林祥謙同志也在內，縛於車站電桿上迫其下上工命令，林君嚴厲拒絕說：「此事乃全路三萬人生死存亡

所繫，我分會非得總工會命令不得開工。頭可斷，工不可開。」如是問答者二次，張厚生即呼喝下令，在數十被捕工友面前將其「梟首示衆」懸首車站。如是至死不屈，從容就義，綱紀謹嚴，非真爲勞動者利益而奮鬥者怎能如此！」（同上）

同日在長辛店鄭州各處亦發生同樣的慘殺。在長辛店被殺者五人，受重傷者六十餘人。這次慘殺，計前後被殺工人三十九名，受傷者三百名，入獄者二十七人，被開除失業者達五百餘人，各地工會均遭搗毀封閉。這就是中國工人運動史上悲壯的『二七』事變。

京漢路工人的罷工與英勇鬥爭，引起了全國各地工人學生以及各團體的聲援。道清、正太、津浦南段、粵漢工人一致罷工援助，武漢各業工人在『二七』慘殺後，由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發佈總罷工命令，自八日起，各業工人相率罷工，結果均在軍閥的武力摧殘下失敗了。湖北工團聯合會及『真報』亦遭封閉，京漢路總工會法律顧問施洋亦遭捕殺。

京漢路工人的鬥爭同時也引起了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的同情與援助。共產國際與赤色職工國際曾爲『二七』事變發出宣言，海參威工團總會和日本朝鮮無產者同盟亦拍電聲援。

中國共產黨對『二七』慘殺更在全中國人民面前指出：『這次漢口的大慘殺，不僅是軍閥慘殺工人的意義，乃是軍閥慘殺爭自由的人民先鋒軍的意義；這個慘殺兇手吳佩孚，不僅是工人階級的敵人，乃是全國爭自由的人民的敵人。「不自由，誓寧死！」現在我們三十九個烈士已經慘死了，軍閥

從北廷等軍閥手中向我們不自由的人民進攻了！全國不自由的人民呀，你們應該一律準備和爭自由的先鋒軍——工人階級——起來打倒慘殺工人的軍閥吳佩孚、曹錕呀！打倒一切壓迫工人的軍閥呀！」（中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爲罷工爭慘殺京漢路工傷工人階級與國民」）

經過『二七』的摧殘，整個中國工人運動受到了暫時的挫折，但中國工人階級仍在秘密的條件下進行着鬥爭，準備新的革命高潮。

五 「二七」的教訓與意義

『二七』事變在中國無產階級面前鮮明指出：中國工人階級鬥爭的開始便遇到帝國主義與軍閥的殘暴壓迫，中國無產階級的解放必須首先經過打倒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 and 推翻軍閥統治的道路才有可能。因此，『二七』事變更教訓了中國無產階級必須參加民主革命。因爲驅逐帝國主義肅清封建勢力的民主革命，對於中國無產階級是有莫大利益的。而且在半殖民地中國，無產階級的利益與中國民族的利益正是一而二。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可以解脫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對下的壓迫與束縛，而取得政治上的自由，這樣去纔與無產階級自己。如果認爲『……資產階級革命完全不表現無產階級的利益，這是大錯而特錯的。這個錯誤見解的結果，或者是走到老民粹派的理論，說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利益相衝突，故我們不要資產階級的政治自由。或者是走到無政府主義，否認無產階級參加一切資產階級的政治，參加

一切資產階級的革命……』（列寧：『兩個策略』）。如果把中國無產階級的利益對民主革命的利益對立起來，那就是大錯而特錯的。這又正如列寧所說的：『凡要想達到社會主義而不願經過民主政治的人，他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都會必然的走到反動的結論上去。』中國無產階級必須在民主革命的勝利中去提高自己的覺悟程度，鍛鍊與組織自己的力量，爭取這一革命的澈底勝利，而轉到社會主義階段上去。

在『二七』血的教訓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中國無產者經過『二七』事變後便更進一步地參加到民族革命運動中來了，開始以其鬥爭的澈底性、堅決性、組織性去為指導民族革命而奮鬥了。因此『二七』事變後，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更嚴重的將民族革命的統一戰綫問題提到議事日程的第一位，而形成了以後的『國共合作』。

『二七』事變在另一方面又教訓了中國無產者：工人階級的鬥爭，必須取得其他階級首先是農民、小資產階級的配合才能取得勝利。無產者的孤軍獨戰是沒有最後勝利的把握的。中國無產階級經過『二七』的失敗，就把爭取無產階級的同盟軍的問題更嚴重的提在鬥爭的日程上。這也就是無產階級在民族民主的革命運動中樹立指導的根本問題。

這些，就是『二七』事變給予中國無產階級的寶貴教訓。

『二七』雖然是失敗了！但『二七』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佔着極重要的地位。『二七』對於以後中國革命有着極重大的意義。

『二七』事變是中國無產者廣泛而有意識的參加全國政治舞台的第一大事變。『二七』事變充分而明白地說明在中

國革命運動中，已經出現了新的革命的偉大力量。這一新的偉大革命力量以它的鬥爭的堅決性、澈底性，以它的與帝國主義軍閥直接搏戰的精神，以它的團結與組織的力量，以它的領導的姿態出現於中國的政治舞台上。

『二七』又是中國無產者在中國革命中樹立指導問題的開始。『二七』鬥爭中的中國無產者的能毫不動搖的以他的堅持性、澈底性與統治階級血戰，這也就在中國民衆面前宣告，中國無產階級指導中國革命的能力，這種導指能力可使中國革命得到澈底的勝利，可使中國從帝國主義的宰割下，封建勢力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二七』就是中國無產者指導中國革命的第一次嘗試！

『二七』又是中國工人運動由經濟鬥爭轉到政治鬥爭的主要關鍵。如果說『二七』前中國工人運動已經參加了政治鬥爭，並且已經迅速從經濟鬥爭開始轉到政治鬥爭，那麼，『二七』則是中國工人階級從經濟鬥爭轉到政治鬥爭的主要表現。因為『二七』不只是立法運動，而且直接反對帝國主義軍閥的統治。

第六講 中國國民黨的 改組與國共合作

一 國民黨改組前夜及改組中的 中國經濟政治狀況

歐戰停止以後，各帝國主義者即圖謀從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新掠奪，取得償補其大戰的損失，戰債和賠款，以及挽救其經濟的破壞凋敝。特別是歐戰後歐洲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除了俄國十月革命獲得了偉大勝利外，其餘的都因社會民主黨領袖的叛賣政策而陷于失敗，帝國主義者這樣在鎮壓自己國內的無產階級革命後，便得移其鋒刃再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了。這裏特別表現的，便是各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掠奪及其在掠奪中國問題上的爭執，而這個問題也就成為各帝國主義者在太平洋爭霸的問題。日帝國主義者利用歐戰機會，在中國獨得許多大的權利，其政治經濟勢力在中國的侵略，已

直接威脅到其他各國（英美等）在華的勢力，並謀獨佔中國的門戶。歐戰停止後，美國即重新倡導其對於中國之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政策，謀以其優越的資本，向中國伸出。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的召集，就是美國所發起的。這會議會拆散了英日的同盟，規定了英美日在太平洋上軍艦的噸數，成立了所謂『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的九國公約。這會議一方面是表現了各國侵略中國的新協調，並給日帝國主義者以某種限制，但另一方面却又正是表現了各國侵略中國競爭的尖銳化，而日帝國主義者且從此更加緊其獨佔中國的陰謀和冒險的侵略政策了。

本來在歐戰期間，日帝國主義者在華設廠的發展，也是很猛烈的，現在其他帝國主義者又重新加入投資設廠的競爭，而日帝國主義者更在這點上絕不讓人一步，更加猛進；在這樣情形下，中國民族工業在歐戰時期發展的僥倖機會是喪失了，一九二二年後，民族工業的發展便再受挫而陷於停滯的狀態了。

在各帝國主義者侵略的新策動之下，中國軍閥內亂又繼續擴大了。中國各方面政局表現了很多的新變動。一九二〇年的直皖之戰，算是中國軍閥內亂繼續擴大的一個新開始。一九二〇年，孫中山先生因粵軍驅逐岑春煊陸榮廷莫榮新等軍閥的機會，自滬到粵，一九二一年中山先生被廣東非常國會選為非常大總統，五月五日就職於廣州，曾有市民數十萬參加，為空前熱烈的慶祝大會。中山先生就職後不久，即準備北伐。一九二三年四月間北方爆發奉直軍閥大戰，直系得勝，發生了驅逐張世昌的政變。在這時候，陳炯明受了帝國

主義者和北洋軍閥的曠使，向孫中山先生倒戈，中山先生是被迫得離開廣州了。這次事變曾給中山先生以極苦痛的印象，同時也表現了中山先生奮鬥的精神。他到了上海之後，曾發表宣言，擬收束非常之局，為民國謀長治久安之道，實行兵工計劃，但為曹吳所拒絕，這點是堅決了中山先生實行革命政策的決心的。

一九二三年春間，孫中山先生因滇桂軍由廣西入粵趕走陳炯明的機會，於是再到廣州，被舉為大元帥。這是造成後來革命根據地的開端。這時中山先生是充滿了革命的熱情的。六月北京發生曹吳驅逐黎元洪的政變，十月曹錕實行賄選做大總統，暴露了舊統治者的極端醜惡，全國各地民衆因此進行了反賄選反曹吳的廣大運動，這次運動對於後來革命的開展，是給了很大的影響的。

一九二二年以來，工人的被剝削是加緊了，但是工人階級的覺悟和團結力是加強了，這在上一講當中，我們已給了敘述。不但這樣，因為帝國主義侵略的新發展和軍閥內亂的擴大，各省苛捐雜稅是更層出不窮了；兵差，拉夫，人為的天災，地租和高利貸的加重，農民運動是用各種形式興起起來了，南方已開始了農民協會的組織（如廣東東江），北方農民原始的自衛鬥爭（如紅槍會）是更進一步地發展了。資產者即工業的發展受到挫折，對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反對軍閥內亂，是有了新的覺悟了。

國民黨歷史的新時期，就是在這樣情勢下產生的。

二 中國國民黨史的發展及其改組

中國國民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的一種特殊的政黨，在各種不同的歷史機遇，由於市民層對革命態度如何而起的主要作用時，時常轉化為各種不同的聯盟。辛亥前，國民黨即是中國同盟會。在中山先生領導下，當時這是革命的聯盟（當時市民層、小市民層、『會黨』——中國下等社會（包括工人與農民）的原始組織——以及反滿的士大夫之革命的聯盟。）

辛亥革命後，一九一二年同盟會即開始分裂，而不久同盟會也即改名為國民黨。當時大部分上層黨人開始與舊勢力妥協，以為革命從此勝利，在宋教仁倡導下，將政黨的活動擺在議會鬥爭之上，而欲實行其政黨內閣的主張。於是，乃合併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促進會四黨成爲一個國民黨，這樣國民黨便成爲一種龐大的政客集團。國民黨的綱領：第一，是促成政治統一；第二，發展地方自治；第三，實行種族同化；第四，注重民生政策；第五，維持國際和平。顯然的，誠如孫中山先生及其他國民黨人後來所公開聲稱的：這種綱領是已消失了革命意義的。民元國民黨實際上已完全喪失了革命的性質，（當時同盟會中一部分革命分子曾因此而痛哭，不願改名），已由同盟會時代的革命聯盟變成當時市民層與一部分較開明的地主，士大夫，和歷史人之改良主義的聯盟。當時國民黨雖然在衆議院中佔了多數的議席（共三九二席，其他黨派僅二二三席）但因為

當時是在北洋軍閥袁世凱的統治下，所謂政黨內閣的目的，不僅不能達到，而且袁世凱組織進步黨與國民黨對抗。而國民黨本身也日漸分裂為相友會、政友會、癸丑同志會、集益社、超然社等等小組織。就在袁世凱還沒有解散國民黨時，國民黨本身實際已經瓦解了。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先生至日本東京，於一九一四年三月『組織中華革命黨，恢復民國以前革命黨之面目，以辛亥覆轍申儆黨人』（『總理全集』：『中國革命史』）。中華革命黨在組織上較為嚴密，加入者須立誓約、打指模、奉孫中山先生為總理，『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當時中華革命黨的主要分子有居正、謝持、張靜江、廖仲愷、張繼、胡漢民等，但組織力量薄弱，而且以為滿清既倒，在誓約中只寫了民權民生兩主義。中華革命黨的政綱同樣地也是帶了很濃厚的溫和色彩的。當時在國內的活動，大都用的還是國民黨的名義。

民國六年，孫中山先生經日本歸國，進行護法戰爭。在這時期中，中華革命黨藉民友系名義在廣東國會中活動，而溫和色彩還是一般地佔優勢。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後，孫中山先生在上海將中華革命黨改名為中國國民黨，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政綱。其所以稱為『中國國民黨』，是在示別於民元的『國民黨』。這可以說是受了五四運動的影響，正驅趕着向革命更生。這時候孫中山先生編辦『建設』雜誌，並著有『建國方略』。

一九二一年孫中山先生在粵就任非常大總統，並到廣西

準備北伐時候，共產國際曾遣代表馮麟由粵轉桂與孫中山先生會晤。一九二二年，蘇聯代表越飛來華，訂立「越飛孫文協定」。在蘇聯代表的幫助下，中國國民黨才開始進行一九二二—二四年的澈底改組。是年秋天，孫中山在滬召集了一些進步分子（當時陳獨秀也在內）起草國民黨改組之計劃，並於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發表國民黨宣言，確定了鬥爭的方針。主要的是：（一）修改不平等條約，恢復中國在國際上自由平等之地位；（二）實行普選制度，廢除以資產為標準之階級選舉；（三）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絕對自由權；（四）制定工人保護法，以改良勞動者之生活狀況、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民生活、確立婦女與童子地位之平等；（五）由國家規定土地法、使用土地與地價稅法。這一宣言顯然是國民黨改組的先聲。一九二三年十月，國民黨發表改組宣言，並開始實行改組，在廣州成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以鄧澤如、林森、鄧仲愷、馮玉祥、孫科、許崇智等九人為中委，並聘鮑羅廷為顧問。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主要議程為：（一）改組國民黨、通過新政綱、新黨章及宣言；（二）通過組織國民政府案；（三）確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加入國民黨問題。這次大會是中國國民黨走上正確革命道路的關鍵。大會規定了國民黨明確的政綱：

『（乙）對外政策：（一）一切不平等條約……應當取消；（五）中國境內不負責任之政府其所借外債中國人民不負償還之責任。（丙）對內政策：（一）關於中央及地方之

權限，採均權主義；（二）各省人民得製定憲法、自舉省長；（三）確定縣為自治單位，其人民有直接選舉及罷免官吏之權，有直接創制及複決法律之權；（四）實行普選制；（五）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六）改善下級軍官及兵士之經濟狀況，並增進其法律地位；（七）設法安置游民土匪；（八）嚴定田稅及地稅之法定額，禁止一切額外征收；（九）改善農人生活；（十）制定勞工法，改良勞工之生活狀況，保障勞工團體，並扶助其發展；（十一）確定男女平等之原則；（十二）勵行教育普及；（十三）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十四）金業之有獨佔性質者如鐵道航路等，當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丁）施政方法：（一）建設之程序分為三期：一曰軍政時期；二曰訓政時期；三曰憲政時期。』

從此國民黨便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為其鬥爭的指南，以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為其政策。這一改組就使中國國民黨在革命的正確道路上邁進了。

國民黨這次的改組，是中國革命史上一個不朽的偉業。推動這次改組的原因，一般說來，有以下幾點：

第一，是中國勞動者與小市民層革命運動的發展。五四以來，愛國運動的狂流和聲勢，曾幫助市民層不少的勇氣；同時，市民層因歐戰以來，自己力量有某種程度的發展，也正感到需要和當前的革命運動在一起，為自身的利益，並望使革命發展適應於自己希望的程度以內。還在改組以前，有些工人農人已開始被容納到國民黨中，國民黨的基礎，由此已有初步的變動，因而影響於改組事業的開展。

第二，是中國民族市民層辛亥以來失敗的教訓。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府後，中國民族市民層即與舊勢力妥協，結果使辛亥革命完全失敗，民族市民層任何改良的希望沒有兌現，民族資本主義依然在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束縛下掙扎着，雖然利用歐戰機會有某些的發展。民國以來，國民黨和南方武人結合的活動，同樣是毫無效果。中國市民層於不繼失敗和失望之餘，迫得要重新尋找革命的途徑。

第三，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和推動。國民黨改組前，中國共產黨就在全中國民衆前面正確指出了打倒帝國主義滿清封建勢力的革命方針，更在國民黨面前提出了國民革命聯合戰線問題。中國共產黨更不斷的在其實際運動中，在其宣言與對時局主張中幫助國民黨向革命道路轉變。

第四，是蘇聯革命勝利的影響及其對國民黨的實際援助和第三國際意見的供獻。蘇聯革命的勝利使國民黨的進步分子不能不對國民黨過去的活動作重新的審定，不能不去尋找革命正確的方向。一九二一年召集了遠東被壓迫民族代表大會，在大會上正確指出了遠東各弱小民族與殖民地革命的方針。當時國民黨亦曾派人參加，這一會議就開始推動國民黨向革命方向轉變。及後越飛的來華，鮑羅廷之任顧問，以及以後之各種實際援助，是國民黨改組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第五，是世界革命運動的發展。當時正是世界革命運動發展的時期，除俄國革命外，如德國的三次革命，匈牙利、奧大利、芬蘭的革命，特別是東方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如土耳其革命與印度的革命運動。這種世界革命運動的發展，也給國民黨改組一個推動。

這些就是中國國民黨改組的原因，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及蘇聯的推動和幫助，是中國國民黨改組的主要推動力。

改組後的國民黨，這時就成為工農市民小市民的革命聯盟了。像改組後國民黨這樣的組織，我們必需要從中國民族自己的特點來了解。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底曾說過：『像左派國民黨這樣的組織，只在受着民族壓迫的環境中才能產生，因為這種壓迫把國內的一切革命分子都聯合到一個組織。』這個說明，在這裡也是適用的。

三 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新發展

辛亥革命時候，列寧對於孫中山主義曾這樣稱道過：『他這理想是深受了世界資本主義文明潮流的數萬萬人民的革命運動而產生的。』所謂孫中山的理想，主要的是關於三民主義的理想。這理想是從百年來近代中國歷史矛盾所發展的三大問題（民族問題、民權問題、土地問題）中抽引出來的。可以說，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已不自覺地進了解決這三大問題的嘗試；也可以說，戊戌政變是對於當時擺在面前的三大問題企圖進行自上而下的解決。然而明白提出了這三大問題和三大原則的，乃是孫中山先生。這三大原則當時明白的提出和確定，正是中國各種矛盾的展開（對外對內的民族矛盾，封建專制政治制度和封建地主土地制度與生產力發展的矛盾）以及中國人民自覺運動和革命運動的進一步長成的反映。

在『辛亥革命』那一講裏面，我們已敘述過一九〇五年，中國同盟會成立宣言所提出的四大口號：『（一）驅除

號稱；(二)恢復中華；(三)建立民國；(四)平均地權。」這四大口號即是三民主義。一般說來，這個宣言是豐富了革命的精神和色彩的。不過，這時期三民主義的欠缺是很大的：第一，如我們所說過的，三民主義在某些部分是模糊的。如當時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主要的，最明顯的，是在推翻滿清朝廷對於漢族的壓迫，關於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則只有模糊的意識。第二，革命的原則是提出了，但是對於解決這革命的原則，實行這革命的原則之革命的手段（革命的方法），却是缺乏的。正是因此，辛亥革命以後，三民主義即淡薄了革命的色彩，而被代替了改良的及溫和的色彩。

五四運動是三民主義新生的轉機。由於革命失敗和妥協受挫的痛苦教訓，由於五四民族覺醒運動的興起，由於民衆力量的啓示，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由於世界革命運動的鼓舞，由於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孫中山先生乃重整了三民主義的旗幟，而十三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便樹立了三民主義的新生命。在這時候，孫中山先生表現了很大的革命熱情。他在致蔣的信中，曾稱：「……今日革命身學俄國不可……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爲師，曠無成就。」孫中山先生認爲中國革命必須是「俄派之革命」，而且主張不讓妥協分子加入，以免妨礙。這一時期的三民主義新生命最大的特點，就是：第一，革命的三民主義和革命的三大政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結合起來，革命的原則和革命的方法結合起來，三大政策成了三民主義的革命靈魂。第二，三民主義增加了新內容：民族主義由辛亥革命前的反滿明確地轉變到反帝，由大漢族主義轉變到中國國內民族的

自由平等和自由聯合；民權主義則進到主張『實行普遍選舉制度，廢除以資產為標準的階級選舉』；民生主義則之抽身的平均地權進到承認國家當給佃戶土地，進到承認『耕者有其田』；進到承認『制定勞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一般說來，三民主義這一些革命內容的新發展，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名義是密切關聯了的。

在民族主義上，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意義，是在於要求中國的獨立自由平等，高舉反帝國主義的旗幟，主張聯合蘇聯和世界弱小民族；在其臨終時的遺囑及致蘇聯遺書中，最為表現了孫中山先生這方面革命的精華。在民權主義上，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義，是在於確定中國為民主共和國，承認政治上人人平等，承認直接民權，主張國家政權的統一。在民生主義上，中山先生的革命主義是在於主張平均地權，而在國民黨改組後，更明白承認耕者有其田，主張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可以相容。

誠然，由於中國民族歷史的特點，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曾被中國市民層和小市民層的根性所苦惱了的。市民層與小市民層有其根性的兩方面——積極方面與消極方面：前者的兩方面是在反帝反封建問題上的革命性與溫和性，後者的兩方面是在對民主革命的革命性與對民主革命之將來的消極性。市民層在進行革命的時候，需要依靠急進的社會力量，而提出急進的原則，使他們靠攏過來，但關於這急進原則的實現，是附以溫和的辦法的。同時，這急進原則事實上還只是小市民層發展自己生產的要求，但小市民層却認為這即達到大同，而形成一種大同的烏託邦。這種市民層與小市民層

的根性，苦惱到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使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內容，在許多方面表現了複雜的交叉。在革命發展的過程中，一些保守派和革命變節者，想利用這點，誇大溫和方面，誇大消極方面，來毀壞中山先生三民主義革命的生命，但中山先生最忠實的革命信徒以及中國共產黨人却堅決爲中山先生的革命精華而奮鬥到底，求其貫徹，也即如列寧在辛亥革命中所預言了的：『把孫逸仙政治綱領和土地綱領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核心，關心地抽引出來，保護起來，並發展起來。』

四 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及其 對於國民黨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在組織上、在工作上都有着初步的發展。至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國共產黨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杭州西湖，到會代表共二十人，代表黨員約百人左右。討論的中心問題爲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與黨的策略路線。大會通過了『中共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大會討論各個問題的全部結晶都在宣言中顯示出來了。宣言中指出：『中國人民應當反對割據式的聯省自治和大一統的武力統一，首先推翻一切軍閥，由人民統一中國本部，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更確切的認定：『真正的統一民族主義國家和國內和平，非打倒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是永遠建設不成功。』宣言中清楚認識了中國革命的力量與無產階級領導的作用，指出：『中國勞動運動是在第一階

段中發展起來，香港海員和其他工人爲經濟要求的罷工運動，足够證明工人們的偉大勢力，工人們的組織近來亦見迅速的擴大。而且工人們處在中外資本家的極端壓迫之下，革命運動是會發展無已的。發展無已的結果，將會變成推倒在中國的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領袖軍。」「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如果貧苦農民要除去窮困和痛苦的環境，那就非起來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貧苦農民能和工人攜手革命，那時可以保證中國革命的成功。」「……手工業者、小店主、小雇主也日趨困苦，甚至破產失業……這個大量的羣衆也勢必痛恨那拿痛苦給他們受的世界資本主義，加入到革命隊伍裏面來。」「……中國幼稚資產階級爲免除經濟上的壓迫起見，一定要起來與世界資本帝國主義奮鬥。」

中共當時就主張在全中國範圍內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去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宣言中說：「各種事實證明：加給中國人民（無論是資產階級、工人或農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資本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因此，反對那兩種勢力的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是極有意義的：即因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獨立和比較的自由，因此我們無產階級審察今日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我們無產階級和貧苦的農民，都應該援助民主主義革命運動。而且我們無產階級相信在今日的奮鬥進行中間，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勢力和民主主義的革命勢力共同動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義革命格外迅速成功。」中共更具體提出了民主革命聯合戰線的鬥爭綱領：

「中國共產黨爲工人和貧農的目前利益計，引導工人們

幫助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綫。中國共產黨爲工人和貧農的利益在這個聯合戰綫裏奮鬥的目標是：

- 一，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
- 二，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
- 三，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爲真正民主共和國；
- 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爲民主自治邦；
- 五，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內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 六，工人和農民，無論男女，在各級議會、市議會有無限制的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絕對自由；
- 七，製定關於工人和農人以及婦女的法律：
 - （一）改良工人待遇：甲，廢除包工制；乙，八小時工作制；丙，工廠設立工人醫院及其他衛生設備；丁，工廠保險；戊，保護女工和童工；己，保護失業工人等；
 - （二）廢除丁漕等重稅，規定全國——城市及鄉村——土地稅則；
 - （三）廢除釐金及一切額外稅收，規定累進率所得稅；
 - （四）規定限制佃租率的法律；
 - （五）廢除一切束縛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

經濟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權利：

(六)改良教育制度，實行普及教育。』

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發表之後一月餘，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它的『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更具體的提出了聯合戰線的辦法：『中國共產黨的方法是要邀請國民黨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會主義各團體開一個聯席會議，在上列原則的基礎上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向封建式的軍閥繼續戰爭；這種聯合戰爭是解放我們中國人受列強和軍閥兩重壓迫的戰爭，是中國目前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戰爭。』

二次大會以後，黨在工人中的工作更加開展起來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已有幾十個職工會，會員人數約在十五萬以上。在青年羣衆中的工作也加強起來了。一九二二年五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青年團的前名）在廣州舉行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全國團員已有四千人。二次大會後中國共產黨開始定期出版中央機關報。『嚮導週報』就是在二次大會後出版的。

顯然的，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在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上前進，它在全中國人民面前同時也在中國國民黨面前提出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它推動着國民黨走上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一直到國共合作。

五 中共決定國共合作的經過

在國民黨大踏步地走向革命的情形下，國共合作在一九二三——二四年終於形成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在某個具體

的歷史情勢中，要求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而由於這共同的目標，在革命發展的某個階段上，中國民族市民層小市民層與中國無產者的聯合成爲必要，這種聯合就在國共合作的形式下表現出來了。

馬克思主義者在相當條件之下和相當時期內，可以參加在一般的革命民主黨內或革命的民生政府內，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合作，這在歷史上，本來是有先例的。馬克思自己及其同志在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中，就曾參加過萊茵省資產階級民主同盟會。而列寧在共產國際二次大會上更這樣演講過：「共產國際在落後的國家中，應有時要暫時的與資產階級民主派妥協或合作，但是絕不能與他們混合，而要保存無產階級運動之獨立性，雖是這種無產階級運動尚在萌芽的形式。」因此，在打倒帝國主義軍閥、爲建立民主共和國奮鬥時，在共同的目標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合作是馬克思主義者所容許的。

此外，當時國共合作的具體條件也是存在的：

第一，當時國民黨已不是一個純粹資產階級的政黨。在「五四」後，國民黨已開始參加了新的成分，已加入了不少小資產階級、工人、農民。而中共加入國民黨可以加更吸收廣大的羣衆參加國民革命，爲國民革命而鬥爭。

第二，以孫中山爲首的廣東國民黨政府，當時並不禁止勞動運動，而且取消了治安警察條例與壓迫罷工刑律，表現對民主政治的擁護。

第三，國民黨同意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政治主張，並且

容許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外組織羣衆，領導羣衆鬥爭。同時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含有革命的內容，可以經過共產黨來發揮其革命的主張。

所以共產國際執委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的特別決議指出：「國民黨是現時中國唯一強大的民族革命組織，它以自由民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一部分學生和工人爲依據。

『因爲中國獨立的工人運動尙居薄弱；因爲中國目前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華代理人——中國軍閥；尤其因爲解決民族革命問題直接有利於工人階級，而現時工人階級又尙未充分化，成爲完全獨立的社會力量——所以共產國際執委認爲：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實行合作是必要的。』

可是，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幫助國民黨的革命事業，並不是說，兩黨應當合併，這種合併對於國民黨和民族革命事業，並無好處，而且會使國民黨失了獨立的諍友，使中國失了勞動大衆力量的組織者和集中者，使中國革命失了最好的舵手；而且，由於中國無產者的存在，要取消其政黨的存在，在歷史上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共產國際當時又指出

『只要國民黨客觀上進行着正確的政策，中國共產黨應在民族革命戰綫上一切運動中幫助國民黨，但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不應與國民黨合併，無論如何不應在這些運動中，隱藏自己特殊的旗幟。』

根據共產國際這一指示，中共於一九二三年六月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到會代表二十人，代表黨員三百

人左右。這次大會代表中有陳獨秀、張國燾、毛澤東、秋白、譚平山、張太雷、蔡和森等人；大會討論中心爲國共合作問題，大會並正式確定了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問題。中共第三次全國大會宣言引進了一些事實，接着說：

『……在在可以證明內憂外患更復加於國民之身，除集合國民自己之勢力、做強大的國民自決運動，別無他途可以自救。也在在可以證明本黨一年以來號召的：「打倒軍閥」「打倒國際帝國主義」之國民革命運動，不是一條錯誤的道路。』宣言中關於革命指導的問題參雜了不正確的觀念，但是三次大會對於國共合作的主張，無論如何是正確的。

第三次代表大會會又修改了黨的綱領。關於推翻帝國主義統治與封建軍閥壓迫的要求，是更加擴大了，但却同樣地疎忽了國際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

中共三次大會後，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國民黨在廣州成立的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就已有共產黨員參加了。至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則正式通過容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正式通過其聯共政策了。於是國共合作就成爲實際的行動了。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和政綱，誠然還有溫和的成分存在。但無疑地，那宣言和政綱在大體上是成了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而那宣言和政綱的革命內容，是留有當時共產黨人的筆跡的。

在這裏我們必須指出：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個別負責者，對於加入國民黨的意義雖是接受了國際的指示，可是還沒有澈底的了解。爲了這個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內，尤

其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有過很大的爭論。一個極端的代表者是陳獨秀，他認為中共的一切工作應該歸國民黨，一切工作應該集中到國民黨，這種觀點實際上是要使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併起來，取消共產黨，這正如我們上面所說的，這種合併是對於國民黨和中國革命都無好處，而只有壞處，而且事實上也是完全不可能的。這種錯誤觀點會部分的參雜到大會宣言中去。另一極端以張國勳為代表；他們『反對在勞動羣衆中發展國民黨的組織，主張工人應該在自己的政黨旗幟之下參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資產階級性的國民黨便不免有混亂無產階級思想的危險。』（見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大會『對於民族革命的運動之決議案』）這種傾向，同樣不了解無產者應怎樣在廣泛的國民革命運動的統一戰綫中去爭取革命的同盟者。這兩種傾向，一種由恩巴主義表現出來，另一種由閻門主義表現出來，但實質都是由於不了解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爭取同盟者和對於民主革命之指導的問題。

六、國共合作與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

國共合作後，中國革命運動有着突飛猛進的發展。首先在國民黨當政的區域廣東，工農運動、反帝運動均一日千里的開展着；在全中國，廣大民衆開展着召集國民會議的運動，到處要求召集國民會議製定憲法，建立民主共和政體。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對時局主張就提出：

「我們的主張是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出來號召全國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多

徵代表在適當地點開一國民會議。

「在北京之國會已成為封建軍閥之傀儡，國民已否認其代表資格。只有國民會議才真能代表國民，才能够製定憲法，才能够建立新政府統一中國；也只有它能够否認各方面有假託民意組織政府統治中國主權。由此國民會議所產生之新政府，須以真正國民革命之力，掃盪全國軍閥及援助軍閥的外國勢力，然後才不愧為統一全國的人民政府，不是一個偏安一隅的政府，更不是一個各派軍閥合作受列強卵翼的政府。同胞們，只有這條路是真能救濟我們中國人脫出外力軍閥二重壓迫的道路。」在中山先生主張國共合作和實行國共合作時候，曾有一部分國民黨溫和派，對於這問題有懷疑或不滿，在國共合作後，這種情形還是存在，有部分不革命反革命的分子即藉口「反共」離開國民黨，而在國民黨內，仍有溫和派與急進派的鬥爭。

溫和派對於中國共產黨有很大的不正確的誤解，比如所稱：「自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其所宣傳打倒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者，其作用係在破壞國民黨在國際之好感。一方面則注意打破國民黨與國民黨各實力派（指當時各派軍閥）之合作，其計劃係在消滅國民黨。」這種見解，在後來證明完全是無根據的：反帝反軍閥的主張，不但不是要消滅國民黨，而且恰是幫助國民黨的革命新生及其力量的發展。溫和派的錯誤行動結果造成了各種不幸事件：如一九二四年九月上海南洋烟廠八千工人罷工，溫和派分子慫恿資本家壓制工人罷工；廣州印刷工人因要求加薪不遂而罷工，溫和派又幫助資本家壓制工人罷工；上海雙十節國民大會中，溫和派會利用

流氓打死黃仁等。

廣州商團是一種買辦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的反動武裝組織（以陳廉伯爲代表）。國民黨改組後，他們依靠香港英帝國主義的幫助，就利用了國民黨一部分溫和派「反共」的宣傳企圖推翻廣東國民政府。一九二四年雙十節，國民黨左翼與共產黨領導廣大羣衆示威遊行，當即遭受商團的屠殺，死者二十餘人，傷者不計其數。屠殺後，商團全體出發，張貼迫孫中山先生下野之佈告，武力威迫商人罷市，並公開邀請蒙炯明氏回粵主持政局。孫中山先生這時表現了很大的革命毅力，藉羣衆的幫助，以武力平定商團，將商團軍擊潰。在中山先生準備以武力平定商團時候，英國的廣州總領事曾提出阻止的哀的美敦書。中山先生即向英國麥克唐納爾政府提出嚴重的抗議，電中最後聲稱：「夫中國反革命黨既屢得英國歷來政府之外交的及經濟的援助，而本政府又實爲今日反革命黨之唯一抵抗中心，故余迫於深信此哀的美敦書之主旨，乃傾滅本政府，對於此種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之舉，余特提出嚴重抗議。」

國共合作後，國民革命運動的發展影響到統治階級內部的分化。首先是馮玉祥之西北軍開始「赤化」：一九二四年十月發生北京政變，馮玉祥倒戈，直系軍閥曹錕與吳佩孚塌台。於是召集國民會議的呼聲又普遍中國。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又發出第四次對於時局的主張，認爲：

「挽救此迫在目前危機之方法，不是各省軍閥的和平會議或國是會議，也不是幾頭元老的善後會議，乃是本黨在去年在北京政變時所主張的及中國國民黨現在所號召的國民會議。只有國民會議才可望解決中國政治問題。因爲它是由人

民團體直接選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思與權能。

「我們希望國民黨領袖們努力號召全國人民的團體促成國民會議，並須努力使他們所主張之國民會議預備會急速在北京召集，更應極力反對軍閥們拿什麼各省軍民長官會議來代替此會，執行此會職權。此預備會之任務，不但是籌備國民會議，我們更應號召各階級的民衆及與各派帝國主義者尙無確實的關係之武力擁護此預備會。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爲臨時國民政府——號令全國的唯一政府。」

中國共產黨更具體提出了這一臨時政府的綱領：

- 一，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第一重要是收回海關，重協定關稅制爲固定關稅制。因爲這是全民族對外的經濟解放唯一關鍵。
- 二，廢止治安警察條例及罷工刑律，保障人民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罷工之無限制的自由權。因爲這是人民對內的政治解放之唯一關鍵。
- 三，全國非戰時的常備軍，均以旅長爲最高級的軍職，廢除巡閱使、督軍、督理、督辦、總司令、檢閱使、護軍使、鎮守使、軍長、師長等軍職，因爲這是杜絕軍閥勢力集中盜國亂政之重要關鍵。
- 四，軍閥之禍罪在最少數高級軍官，失業入伍的兵士們所受壓迫與困苦，與其他一切平民等，今後旅閫司令部應採用委員制，軍餉公開；應改良現役士兵之生活及教育，兵士退伍須給以土地及農具或其他種確實可靠之生活。
- 五，規定最高限度的租額，取消田賦正額以外的附加捐

及陋規，謀農產品和其他種生活必需的工業品價格之均衡，促成職業的組織（農民協會）及武裝自衛的組織。這都是農民目前急迫的要求。

六，八小時工作制，年節星期及紀念日之休假，最低限度的工資之規定，廢除包工制，工廠衛生改良，工人補習教育之設施，工人死傷保險法之規定，限制童工之年齡及工作時間，女工妊孕前後之優待。這都是工人目前最低限度之要求。

七，限禁都市房租加租及建設勞動平民之住屋。

八，沒收此次戰爭禍首的財產，賠償東北東南戰地人民之損失及救濟北方水災。

九，各城市鄉鎮之厘金牙稅及其他正雜捐稅，在國庫收入無多，而小本營商者則因之重感困苦，宜一切廢止。

十，廢止鹽稅米稅以裕平民生計。

十一，增加海關進口稅，整理國有企業之收入，徵收遺產稅，徵收城市土地稅——此等大宗稅收，不但足以補償廢止舊稅——厘金、牙稅、鹽稅、米稅、田賦附加稅及其他各種正雜捐稅之損失，並可用為補助退伍兵士失業貧農及推廣教育之經濟。

十二，為保障知識階級之失業及青年失業計，國家預算中不得將教育經費移作別用，並應指定特種收入如收回庚子賠款等為實行中小學免費優待小學教員及推廣平民教育之用。

十三，婦女在政治上、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

地位上，均應與男子享平等權利。

在全國熱烈要求召集國民會議下，孫中山先生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北上；孫中山先生北上就是企圖在北京召集國民會議。當時孫中山先生的北上宣言，一般是同意了中國共產黨主張的。這時在上海、浙江、廣東、兩湖等地均先後成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各地民衆團體亦紛紛通電擁護國民會議，這是革命方面對於召集國民會議的活動與準備。特別要指出來的，是廣東革命政府當時舉行了第一次東征，這東征是以國共合作後的兩團黃浦「學生軍」爲骨幹。這枝很小的新革命武裝，於最短的時間內成就了孫中山先生多年做不到的事業，很快地打下陳炯明反革命根據地的潮汕。有不少英勇的共產黨青年是在這戰役中殉難了。

正在召集國民會議運動的蓬勃發展下，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舉行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時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黨員數量已達到九百人左右。大會首先討論了國民會議問題以及國共合作中的一些具體問題。大會不僅克服了勞動運動中與國共合作中的一些左的傾向，而且確定了領導召集國民會議運動的具體方針。大會宣言指出來：

「中國的解放運動現在已日見澎湃起來，全國各城市裏的羣衆，正努力達到召集國民會議的要求，差不多都組織了國民會議促成會了。……中國共產黨正式向中國人民說：段祺瑞的善後會議，是段祺瑞用軍閥制度而藉着帝國主義的贊助以統治中國人民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號召全中國的勞動羣衆，起來阻止段氏這

種惡劣計劃。……」

其次，大會通過了黨章以及關於職工運動、農民運動、婦女運動、青年運動問題的決議，這些決議除總結了過去工作經驗外，並規定改善今後黨底宣傳鼓動與組織工作的方針。關於應如何把反帝鬥爭與工農及小資產階級之日常的、局部的、爭取迫切利益的鬥爭配合起來的問題，大會也有詳細的討論。第四次代表大會，並着重指出工人階級經濟鬥爭的重要意義，在決議中說：

『忽略工人經濟鬥爭，不僅要使工人階級本身受到損害，而且必然要減弱民族解放運動。』在農民問題上，第四次代表大會在制定農民部分要求的綱領中，將農民底部分要求提的太不充份，並且未能與根本解決農民的土問題聯繫起來。這顯然是一個根本錯誤。其所以犯這一個錯誤的主要原因，則是由於對於中國革命階段有着不正確的了解。如第四次代表大會關於民族革命運動的提綱中曾說：『在民族解放運動統一戰綫階段之後，接着就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樣一來，實際上就把繼續反帝革命並為反帝革命強固基礎的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階段完全抹煞了。

在反動統治方面，北京之段祺瑞政府為着堵住羣衆的要求，邀請孫中山先生北上，同時提出召集善後會議與國民黨共產黨所主張的國民會議相對抗。根據善後會議，列席善後會議的資格是：（一）有大勳勞於國家者；（二）討伐贖舉，制止內亂各軍最高首領；（三）各省區及蒙、藏、青海軍民長官代表；（四）有特殊資望學術經驗由政府聘任或特派者，不逾三十人。顯然的，這種善後會議是絲毫沒有革命集

殊的。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段祺瑞召集了御用的善後會議，而國民會議促成會亦於同年三月一日在北京舉行，與善後會議相對抗。國民會議促成會會期歷過月餘，到會代表二百餘人。雖然因為北京政權尚在反動勢力中，使國民會議促成會沒有得到什麼結果，但在反對善後會議、傳播革命主張、引導羣衆參加政治活動方面，則有很大影響。

孫中山先生的死（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引起了全國舉行悼追會，這一追悼會在散佈革命思想上，起了極大的作用。孫中山在其臨死時致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信這樣寫道：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病，我增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

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爲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

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合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成真正同志之人。

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纏縛，爲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議，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

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其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盜竊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僅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孫逸仙(簽字)

這封信是中國革命歷史上一個偉大的不朽的文件，而且是世界上最能感動人的文件之一。

第七講 一九二五——二 七年的中國大革命

一 大革命的開始，五卅運動

一 五卅前夜中國經濟危機的發展

與革命運動罷工運動的發展

一九二三——二四年，這是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因為得到社會民主黨反動領袖的幫助，殘酷地把無產階級革命鎮壓下去，而得到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開始；而在殖民地的中國，却正因為帝國主義者侵略的加緊，而發展着經濟危機。在中國，經濟危機與民族危機正表現了特殊的聯結。這種經濟危機的特殊形態，特別是表現於工業發展的停滯狀態，而於一九二五年初尤為嚴重。帝國主義者——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所建立的企業中，為獲得更高度的額外利潤，對於中國勞動者更肆行兇殘的剝削，而中國的資本家，在外

資的高壓下，爲求維持其利潤的獲得，也從延長工人工作時間及減低工資上着想，弄得工人們生活很惡化。農村方面，因軍閥的專橫和內亂的擴大與蔓延，農民所負擔的直接間接的租稅繼續加重，破產流離的繼續更加層出不窮。

◎在民族新危機的面前。在經濟危機的發展中，另一方面，例如上一講所講過的：五卅運動前國共合作後，中國國民革命運動是在蓬勃的發展着。共產黨加進國民黨後，國民黨各方面活躍起來了。國共兩黨合作，在共同的鬥爭綱領上行動，集中與加強了對於國民革命運動的領導，因而一九二五年初召集國民會議運動廣泛的開展着，反帝反軍閥的鬥爭也在更廣泛的範圍內掀動起來，特別是廣東國民革命軍第一次東征的勝利和工人運動更有長足的進步。

中國工人階級，經過『二七』鬥爭後，在鬥爭的經驗上，在組織力量上都加強了。上面我們已敘述了，『二七』的第一週年（一九二四年『二七』）全國鐵路工會秘密開會，成立了全國鐵路總工會，而在鐵路總工會的集中領導下，鐵路工人的組織力量更其加強了。至一九二五年『二七』紀念日於廣州召集了全國鐵路總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到了十二路的代表，共四十五人。會議中，除政治報告與會務報告外，更通過了關於工會的組織、工人的經濟利益、政治權利等等決議。這次會議對於以後的鐵路工人的鬥爭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全國鐵路工人代表會後不久，一九二五年『五一』勞働紀念節日又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這一會議是由當時的全國鐵路總工會、漢冶萍總工會、中華海員總工會和

廣東工人代表會議四大工會召集的。到會的代表共二百八十一人，代表一百六十六個工會，代表有組織的工人五十四萬餘。在會議中，決定加入赤色職工國際，¹⁴並產生了中華全國總工會，通過了許多決議，特別指出工人階級參加反帝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之重要性，而且着重的指出中國工人階級應該成為國民革命的指導的力量與運動的樞紐。會議開幕那天，全體代表參加廣州十萬人的盛大的遊行示威，並與農民代表、青年軍人代表舉行工農兵代表聯席會，顯示工農兵的大聯合。顯然的，這一代表會，對於中國國民革命運動有極大的影響，是中國工人階級準備更劇烈更頑強的革命鬥爭的表現，是中國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運動中爭取指導作用的表現。五十四萬餘有組織的工人參加國民革命運動，就成為國民革命的中心的基本的力量。而五卅運動正是首先從工人階級的反帝鬥爭來開始的。

在工人階級力量加強而帝國主義又進一步的向中國侵略下，於是在五卅運動前中國工人階級便掀起了廣大的反帝鬥爭，舉行不斷的罷工。所以五卅運動是以工人的罷工形式開始。這也就說明了中國工人階級是反帝的中心力量，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指導者。

一九二五年初，首先揭起反帝罷工的義旗的，便是有名的上海小沙渡日本紗廠二萬多工人反對日帝國主義的罷工運動。這一鬥爭的爆發是這樣的：日本內外棉公司在上海共有十一個紗廠，這一公司的日本資本家平時對工人異常苛待，對工人的剝削更為厲害，工人工作時間很長，日夜輪班工作，每班工作十二小時，夜工不加工資；工資很少，普通每

天兩百錢，日本資本家更利用『儲蓄金』及各種方法來剋扣工人的工資；廠中大部分是女工童工，更應用養成工制來教養一批兒童，授以奴隸教育，以代替成年男工，他們無代價的爲資本家做工，實際上是資本家的奴隸。

上海內外棉紗廠工人罷工的爆發，是由於日本資本家開除一批男工以『養成工』去替代而引起的。二月二日『內外棉』第八工廠初紡部全體工人無故被廠方開除。四日被開除工人到日本廠方領取工資，廠方不但不給工資，且將工人拘捕。工人受此殘酷的壓迫，遂一致罷工並提出下面的要求：（一）不准打人；（二）增加工資百分之二十；（三）恢復被開除工人工作；（四）罷工期內工資照發；（五）承認俱樂部有代表工人之權。這一罷工的領導，最初是滬西工友俱樂部，但不久『內外棉廠工會』也成立了。條件提出後，日本資本家完全拒絕，於是二月九日滬西二萬餘工人開始大罷工。接着曹家渡，楊樹浦各紗廠工人也響應罷工。參加罷工工人共計七萬人。罷工的要求是：（一）不准打人；（二）照章發給工資，不得延期，不得無故剋扣；（三）發還儲蓄金；（四）加工資十分之一；（五）罷工期間工資照發；（六）不得無故辭退工人；（七）釋放被捕工人。這一罷工，經過各方的調解，至三月一日始告結束。工人方面得到了相當勝利。這是一九二五年大罷工的開始。這一罷工結束後，青島日本紗廠工人的大罷工又接踵而來。青島日本紗廠工人的罷工，是在上海工人的罷工的推動之下與對日本資本家用野蠻手段制止工人組織工會的憤激下面形成的。四月十九日青島大康紗廠工人開始罷工。工人提出的要求是：增加

工資，日工每人每天一律加大洋一毛，包工按原薪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夜工飯錢一律加倍，取消壓薪制度，因工受傷者工資照發（醫藥在外），一律免收房費，延長吃飯時間至一小時，日人不得打罵華工，規定保護女工，每月給生理假日兩日，工資照發，減少童工工作時間，每天不得過八小時，如工人違犯廠規須工會同意方可處分，公司所謂工人之款應提交工會作教育工人的經費，公司待遇工人須一律平等。這些要求，日本資本家不但不答應，而且用斷絕工人飲食，調動中國警察保安隊向工人示威，來威嚇壓迫工人。因此更引起日廠內外棉、隆興、鈴木等廠工人之罷工。青島日本紗廠工人大罷工，便轟烈的爆發了。參加罷工人數已達一萬八千餘人。罷工爆發後得到了上海日本紗廠工人、全國各鐵路工人特別是膠濟路工人及青島學生之援助。與日本資方相持二十三天，結果工人得到完全的勝利。罷工中工人組織了罷工委員會，並設糾察隊、調查隊、宣傳隊等進行罷工中的一切工作。各廠工會也在罷工中相繼成立。工人的團結愈加堅固。罷工勝利後，工人舉行盛大的慶祝罷工勝利大會，高舉罷工勝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旗幟，歡呼工會萬歲、工人團結萬歲、工人勝利萬歲、工人自由萬歲等口號，散會後結隊遊行，並舉行工會懸額典禮，極一時之盛！

五卅運動前，不僅工人的反帝鬥爭在猛烈的發展着，而且農民運動也開始表現活躍與發展，特別在革命政府統籌下的廣東農民運動得到長足的進步。當時廣東有二十個縣已經組織農民協會，其有名的首領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著名人物——彭湃。農民協會會員全省共有十六萬人。農民的組織力量因

而逐漸加強，農民的政治覺悟也開始提高。在鄉村中農民已經開始了反對苛捐雜稅的鬥爭，有的地方不斷與豪紳地主發生衝突。廣州附近的農民自衛軍在商團事件發生時曾經幫助廣東革命政府去鎮壓商團的叛亂。東江的農民也曾經協助革命軍擊敗陳炯明。這說明五卅運動前廣東的農民已經捲入國民革命運動的漩渦中了。此外河南、陝西一部分的農民也開始鬥爭。河南盧氏縣的農民曾經爲了反對軍閥拉夫派款舉行三次的圍城暴動。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廣東農民第一次代表大會於廣州開幕，代表一百二十餘縣的農民。這次會議成立了省農民協會，統一了廣東農民運動的領導。經過這次會議，廣東的農民更有組織的參加到國民革命運動中來了。

最後，五卅運動前除工人農民的鬥爭外其他階級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也進一步的轉向革命。因爲當時的經濟恐慌更促進小資產階級的破產，而民族資產階級一方面跟隨世界大戰中中國資本主義的相當發展力量也因而加強，另一方面又因戰後帝國主義侵略的新發展，而使民族工業發展受挫，所以他們與帝國主義的衝突也進一步的加劇，這就促進民族資產階級進一步的轉向革命。

這些都說明了五卅運動前夜一面是各帝國主義的繼續侵略，一面是中國各革命階級積極團聚自己的力量以反抗帝國主義的進攻，顯示出大革命的風暴行將來臨。而決定中國革命的性質的，正如斯大林所指出過的：『決定中國革命性質主要因素如下：（一）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帝國主義統治着中國的財政和經濟；（二）封建殘餘的壓迫，因軍閥制度及官僚之壓迫而更加深重；（三）無數百萬工農羣衆

反封建官僚的壓迫，反軍閥制度，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日益增長；（四）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軟弱無能，它依賴於帝國主義的勢力，它畏懼革命運動的發展；（五）無產階級底革命積極性日益增長，它在廣大勞苦羣衆中間的威信日益增長；（六）中國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相鄰近。』這些主要因素、決定了中國大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

二 五卅運動的經過

帝國主義的繼續進攻中國，由於當時廣大羣衆反帝運動的發展，使其侵略受到極大的阻礙。對此，帝國主義就以屠殺鎮壓的政策來求解決，企圖以殘暴的血洗來掃除其侵略中國進程中的障礙，求得對於中國進一步的統治與奴役。於是流血的慘案便不斷在各地發生了。

帝國主義的屠殺首先便在福州開始。福州學生，爲着反對帝國主義的對華教育侵略，於一九二五年四月八日，舉行請願運動。在美帝國主義的指揮下，薩鎮冰便大肆屠殺熱血的愛國學生。『福州男女學生數千餘人，本日向省長請願，露宿公署，薩鎮冰命陸戰隊警察隊並其他軍隊開槍轟擊，槍柄亂打，槍刀亂刺，死七人，重傷數十人，血流遍地，哀聲震天。』（福州學生聯合會電）接着便是五月末日本帝國主義軍閥對於青島工人的屠殺。在青島工人罷工勝利後，資本家用種種方法向工人階級挑釁，不執行條件，並藉口向中國官廳報告謂：『工人不安於工作，必須解散工會。』於是中國官廳召集工人代表，說明『工會應該取消，因爲日本人望着害怕』，並以金錢收買工人代表，企圖分裂工人的團結，

結果，遂以武力封閉工會，但又遭受工人的堅決反抗。至五月二十八日晚，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嗾使下，中國官廳突調大批海軍陸戰隊協同原有武裝警察保安隊和陸軍，馳赴工廠附近駐紮。至是晚三時，即以武力驅逐工人出廠。工人積極反抗，於是軍警開槍向工人掃射，結果工人受傷斃命者八人，重傷者十餘人，被捕者七十餘人。

帝國主義殘暴的虐殺政策的繼續，就開始了五卅的大屠殺。

五月十號日，上海日商紗廠資本家開槍殺死工人顧正紅並殺傷十餘工人。這一屠殺引起各方強烈的反抗，特別是學生。二十一日上海文治大學學生舉行募捐救濟死傷工人，結果遭受巡捕房的逮捕。被捕學生定於三十日在會審公堂開審。另外帝國主義更提出威脅中國資本家的所謂四提案，即上海納稅外人會將於六月二日通過工部局提出的增訂帶刷附律、增加碼頭捐、交易所註冊、取締童工法案。為着這兩件事，上海各校學生乃決定於五月三十日舉行講演宣傳。至五月三十日各校學生二千餘人分頭到公共租界各馬路散發傳單、露天講演，講演顧正紅被殺、學生被捕與反對工部局的四提案。是日上午講演學生被捕數十人，至下午講演學生不斷增加，聽衆亦隨之而增加，而帝國主義也更積極捕人，午後只南京路老關捕房一處已拘留學生達數百名。因而羣情憤激，咸集捕房門首要衆釋放被捕學生。至三時許，聚集於捕房門首之羣衆將近萬人，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全中國人團結起來』，聲震入雲。正在相持之際，三時三十五分，突有一兩捕向空放槍，接着兩捕即奉令平放一桿槍，華捕也向空放

一排槍，這就是五月三十日南京路的大慘殺，計當場死十人，重傷十五人，捕去五十三人。

這一屠殺引起了全上海學生、工人、商人的憤激與反抗，而帝國主義也就繼續五月三十日不斷的屠殺中國民衆。五月三十一日，學生繼續在大雨中遊行、示威、講演、散發傳單。六月一日，南京路到處佈滿講演散傳單的學生、工人、市民，而同時又滿佈帝國主義的機關槍、鐵甲車、砲車、馬隊。學生與西捕不斷發生衝突。十時西捕、印捕、萬國商團繼續開槍屠殺工人、學生、市民，死傷更多。六月二日，小沙渡紗廠工人罷工，被殺死四人並沉屍蘇州河底。接着在新世界帝國主義以機關槍步槍射殺羣衆，死傷極衆。三日屠殺仍繼續：計楊樹浦被殺四人，重傷六人，輕傷不計其數。四日陸徵祥包圍上海大學，沒收一切文書，驅逐學生出校，強迫縣署爲陸戰隊駐紮。

帝國主義殘暴的屠殺不斷的繼續，而中國民衆的反抗與鬥爭也如火如荼的掀動起來了！六月一日全滬已開始罷工、罷課、罷市。至四日、工人的罷工極其高漲；電車、紗廠、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及一切洋行、公司、電氣處、碼頭、報務等工人及華人職員，都捲入了罷工的浪潮中，罷工工人達二十萬，表現了當時上海總工會的作用及其領導力量。除工人外，上海學生全部捲進到反帝的鬥爭中來了。上海所有學校的學生全部罷課，甚至教會學校（如聖約翰大學等）學生亦與校長衝突，加進到鬥爭中來。此外中小商人亦積極參加罷市，各馬路商界聯合會（代表中小商人）且與工人學生共同強請總商會下令罷市，總商會乃於六月三日下令罷市。

最後公共租界華捕大多數也舉行罷崗，以示反抗。

上海罷工、罷課、罷市運動掀起後，即組織了這一運動的領導機關——工商學聯合會。加入這一組織的有：上海總工會，上海學生聯合會，全國學生聯合會，各馬路商界聯合會（代表上海大資本家的上海總商會是沒有加入）。經過工商學聯合會的領導，於六月十一日召集一次羣衆大會。到會的工人學生商人，共二十餘萬，反帝情緒極其高漲。工商學聯合會成立時，即於六月七日提出下面十七條件，內分先決條件四，正式條件十三：

一， 先決條件：

- (1) 宣佈取消戒嚴令。
- (2) 撤退海軍陸戰隊並解除商團及巡捕之武裝。
- (3) 所有被捕華人一律送回。
- (4) 恢復公共租界被封及佔據各學校之原狀。

二， 正式條件：

- (1) 懲兇。從速交出主使開槍及開槍擊斃工人學生市民之兇手論抵，並由中國政府派員監視執行。
- (2) 賠款。因此慘殺案而產生直接間接之損失如(甲)死傷者，(乙)罷工，(丙)罷市，(丁)學校之被損害者等項，須詳細查明，酌定賠償額，應由租界當局按數賠償。
- (3) 道歉。除上述兩項外，應由英日兩國公使代表該兩國政府向我國政府聲明道歉，並担保嗣後不再有此項事情發生。
- (4) 撤換工部局總書記魯和。

- (5) 華人在租界有言論、集會、出版之絕對自由。
- (6) 優待工人。外人所設各工廠，對於工作之華人，須由納稅華人會訂定工人保護法，不得虐待，並承認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之自由，並不得由此次罷工而開除工人。
- (7) 分配高級巡捕。捕房應添設華捕頭，自捕頭以下各級巡捕，應分配華人充任，並須佔全額之半。
- (8) 撤消印刷附律、加徵碼頭捐、交易所領照案。該三案歷經我國政府聲明否認，嗣後不得再提納稅人特別會。
- (9) 制止越界築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範圍外建築馬路，其已成者由中國政府無條件收回。
- (10) 收回會審公廨。

甲，民事案：

- (子) 華人互控案，華法官得獨自裁判，領事無陪審或觀審權。
- (丑) 洋人控告華人案，領事有陪審權，但不得干涉審判。

乙，刑事案：

- (子) 洋人控告華人者，其有關係之領事，得到堂觀審，但不得干涉審判。
- (丑) 華人互控案，華法官得獨自審判，領事無陪審或觀審權。
- (寅) 華人犯中華民國刑法或工部局章程，照(丑)項論，且原告名義須用中華民國

不得用工部局。

丙，檢查處一切職權，須完全移交華人治理。

丁，會審公廨法官，均須由華政府委任之。

戊，會審公廨之一切訴訟章程，完全由中國法官自定之。

己，對於會審公廨之一切事權，除與上（甲）至（戊）五項無所抵觸外，均可根據條約執行之。

(11) 工部局投票權案，租界應遵守條約，滿期收回，在收回以前，租界上之市政權應有下列二項之規定：

甲，工部局董事會及納稅人代表會，由華人共同組織，其華人及納稅人代表數目，以納稅多寡比例為定額；其納稅人年齡出席投票權，與各關係國西人一律平等。

乙，公共租界外人之納稅資格，須查明其產業為已有的或代替的兩層，已有的方有投票權，代理的如屬華人產業，不得有投票權，其投票權應歸產業所有人。

(12) 要求取消領事裁判權。

(13) 永遠撤退駐華之英日海陸軍。

這十七條件的提出，表現了中國國民外交的精神，表現了中國人民在帝國主義面前之對時代的覺醒。

五卅的慘殺，不僅在上海掀起如火如荼的羣衆反帝運動，而且在中國所有中心城市也激起了反帝的巨流，就是窮

鄉僻壤也受到反帝洪濤的激盪！

◎ 六月三日北京五萬餘學生爲五卅慘案舉行壯烈的示威。這一示威在東交民巷與軍警發生衝突。接着又於六月十日舉行二十餘萬人的國民大會，議決積極援助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的鬥爭。同時北京學生聯合會與商會發表宣言，正式宣佈與英日帝國主義實行經濟絕交。在漢口，六月二日學生開始罷課，舉行示威和演講；工人開始罷工；中小商人亦參加到反帝運動中來。帝國主義與軍閥蕭耀南加以殘酷的屠殺，死數十人，重傷三十餘人。在九江羣衆與英日巡捕衝突。在長沙六月五日舉行反帝示威，參加者十餘萬人。其他如青島、天津、南京、廈門、福州、濟南、開封、杭州等地都跟着五卅慘案掀起了反帝的怒潮。特別在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廣東，五卅慘案更給予強烈的刺激。在香港也同樣發生極大的影響，十餘萬工人於六月十九日開始罷工，並提出要求，分爲二部分：第一，擁護上海工商學聯合會之十七條件；第二，對香港要求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通選舉、勞動立法、減低房租、居住自由等六項。因此香港政府立刻宣佈戒嚴，並向廣東政府採取封鎖政策。於是廣州、香港羣衆反帝熱情更爲激躍。六月二十三日，廣州七萬餘工人、學生、市民、軍人舉行盛大的援助滬案示威遊行，至沙面，英兵開槍掃射，英、法、葡砲艦開砲轟擊，當場擊斃羣衆五十二人，擊傷一百七十餘人。這便是轟動一時之沙基大屠殺。沙基慘案發生後，廣州、香港民衆更爲憤激。廣東政府便宣佈與英經濟絕交，封鎖海口；同時香港之中國工人，在中國工人階級著名領袖，中共著名人物蘇兆徵陳延年等的領導下，全部返省，與

廣州工人共同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主持罷工與經濟絕交。

所以在五卅慘案後，全中國特別在城市方面已經展開着空前未有的廣大的羣衆的反帝運動，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與英、日帝國主義實行經濟絕交，驅逐帝國主義海陸軍出中國等等口號，不只是廣大羣衆演講的呼喊的口號，而且成爲羣衆的行動方針了。在這一反帝運動中主要的力量是工人，農民也參加了鬥爭（如在廣東河南），學生是這運動中重要的號手，小商人是積極的參加者，而民族資產者也被捲入了漩渦。這些力量在反帝鬥爭中形成了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的聯盟。這一統一戰線的組成，特別在工商學聯合會的成立及其對五卅運動的領導上表現出來了。

在廣大羣衆的反帝的浪潮下，在反帝統一戰線發展的前面，帝國主義便開始從屠殺政策轉爲分裂政策了，採用各種辦法來破壞反帝的統一戰線。

帝國主義者首先對中國資產者表示讓步，以『司法調查』（就是說五卅慘案須用司法來調查），以『關稅會議』（討論關稅自主問題）來引誘他們，使其脫離反帝統一戰線；另外於七月四日停止供給電力予中國工廠（上海租界的電氣處本是壟斷上海電氣業的）以威脅他們。

在帝國主義分裂政策下，上海資產者竟表現了不幸的動向。他們被帝國主義者所挑弄，第一步修改工商學聯合會的十七條件，減至十三條：第一，取消了優待工人的第六條；第二，取消了永遠撤退駐滬之英日陸海軍之十三條；第三，取消了收回會審公堂之一條，其他一些條件，總商會也加以修改減低。第二步上海總商會決定於六月二十五日停止罷

市，開始復業。第三步壓迫上海日廠工人上工。第四步與中國外僑商會妥協，並暗示中國軍閥封閉上海總工會。奉系軍閥受帝國主義的嗾使，並因資產者動搖的影響，便於七月間放胆開始封閉工商學聯會、海員工會、洋務工會，特別於九月七日這一天，上海舉行二十萬人『九七』辛丑條約的國恥紀念大會後，遊行羣衆又遭受帝國主義的屠殺。接着九月底上海總工會也被奉系軍閥所封閉，許多革命領袖也被逮捕。從『九七』的屠殺後，上海廣大羣衆反帝運動便暫時受到了挫折。

爲着更進一步地團結工人反帝的力量，改善一般工人們的生活和地位，實是必需之舉。五卅後，華商工廠裏的罷工，如七月間上海郵局、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的罷工，以及天津、河南、山東的中國紗廠的罷工，這種罷工就是切實要求政治經濟地位改善的罷工，以求增強工人們的團結和力量，同時也是工人們對於那在帝國主義分裂政策下，而陷於動搖妥協與壓迫工人的泥坑中去的人們，給以一個反抗的回答。在學生方面，因爲學校當局禁止學生參加革命運動而引起學生之反抗，於是學潮也到處澎湃着。

三 『五卅』運動的意義

五卅運動在中國革命史上佔着極重要的一頁。它開闢了中國革命的一個新時期，它是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大革命的開始和預演。在五卅中，帝國主義的殘酷的屠殺政策和毒辣的陰謀詭計——分裂政策，使廣大的中國羣衆認識了帝國主義是中國民衆的死敵，掀起了深刻而廣泛的民族覺醒，

而在各方面加強地團結了自己。雖然經過九月七日的屠殺之後，五卅運動在部分地方受到暫時的挫折，而這是中國大革命前線的前進的轉灣抹角處，經過這暫時的挫折，很快地革命運動又將繼續向前發展，一直到轉入大革命。

五卅運動是反帝統一戰線在羣衆運動中的具體表現。在國共合作後，雖然已經在政黨的形式上開始了反帝統一戰線的形成與建立，可是，真正的全中國的廣大羣衆中與鬥爭中的反帝統一戰線的實現則以五卅運動爲開始。在五卅運動中，每一城市的反帝鬥爭，不僅工人農民參加，學生以至民族資產者均捲入到反帝浪潮中來了（雖然民族資產者是動搖的、妥協的）。市工商學聯合會則是羣衆的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

在這一反帝統一戰線中，表現了民族統一戰線的力量，同時，中國勞動者成爲骨幹與主力軍，同樣在五卅運動的進程中顯示出來了。五卅運動是在工人們的鬥爭中（首先是在工人反帝的鬥爭中）開展出來的。五卅運動最高漲、最激烈的時期，便是上海工人罷工最高漲的時候；工人的鬥爭越是開展，五卅運動也越是開展。正因爲這樣，帝國主義軍閥也首先以破壞工人的罷工來破壞革命運動。無產階級的政黨在五卅運動的過程中是運動的組織者，而且表現了自己的偉大指導能力。本來也可以說：工人們站在運動的最前線，成爲反帝的先鋒隊，正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作用的充分表現；而各城市工商學聯合會，也正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統一戰線在羣衆中的實現。如果當時沒有無產階級政黨對運動的堅持與正確的領導，五卅運動的這種廣泛的深入的開展是

不可能的。

五卅運動也告訴了我們：中國民族資產者是參加了這一運動的，我們應該聯合他們，一塊兒革命，可是在五卅運動中，業已表現了帝國主義者時常利用他們的弱點，挑撥他們，動搖他們，要引誘他們脫離統一戰綫。帝國主義者這種分裂政策及其所可能引起的惡果，本來是需要加以防範的，但這却是機會主義者所不加以深察注意的。

五卅運動也清楚地指出：當着革命高漲時，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雖有激烈的衝突，但在革命浪潮的威脅前面，能夠取得暫時的妥協來一致鎮壓革命運動。中國的軍閥也是如此。雖是日、英、美帝國主義間有着深刻的衝突，但在五卅運動的過程中，他們都是屠殺中國羣衆的劊子手，特別是日、英帝國主義。雖是奉系、直系和其他軍閥間有着衝突，但在革命發展的前面却一致鎮壓革命運動了。另一方面，在情形稍有不同的時候，在上海方面革命運動暫時受到部分打擊的時候，軍閥內部的衝突又將激烈起來，而這種衝突恰又是反映了帝國主義間的衝突；接踵而來的浙奉戰爭就是這方面的明顯表現。

四 從浙奉戰爭到三一八慘案與北方國民軍的退却

自一九二四年冬，馮玉祥在奉直戰爭中回師北京，發生所謂北京政變後，奉系軍閥（主要的是日帝國主義的工具）因而乘機入關，伸張其勢力於華北、華中、直隸、山東、安徽、江蘇、一直到上海均爲其所佔有。奉系地盤的擴張，實際上是日本在華勢力的擴張；而直系軍閥的崩潰，也就是

英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縮小。這樣，雖然在五卅運動反帝前面，日、英等帝國主義暫時緩和其內部衝突而聯合一致以反對革命，但在很快的時間內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間的衝突又加劇起來，帝國主義這種衝突，就從浙奉戰爭中明顯暴露出來了。一九二五年十月孫傳芳組織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自任聯軍總司令（時孫爲浙督），發動反奉戰爭，首先向上海進擊，當時吳佩孚亦乘機再起，自稱十四省討逆聯軍總司令，委蕭耀南爲鄂軍總司令，陳嘉謨副之，協助五省聯軍攻擊直魯兩省之奉系軍隊。

在五卅運動中，奉系軍閥完全在帝國主義的指示下鎮壓反帝運動。在上海，在其他的方面帝國主義也是經過奉系軍閥來鎮壓廣大羣衆的革命運動。因爲廣大羣衆在五卅運動中清楚認識了奉系軍閥是帝國主義鎮壓革命運動的工具，在五卅運動之後，便發生廣大羣衆反對奉系軍閥的運動。所以在浙奉戰爭中孫傳芳便乘機利用羣衆反奉的情緒，在對奉通電中，亦以反對奉系軍閥壓迫愛國運動相號召。可是必須認識反奉戰爭雖然在客觀上有利於革命運動的發展，但依然是軍閥的戰爭；孫傳芳、吳佩孚等也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同樣是壓迫革命運動的軍閥，他們的通電，他們的號召，只是企圖利用當時羣衆的反奉熱情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不過這一戰爭當時的確得到了一部分羣衆的擁護，甚至引起了當時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者的幻想，以爲『此次反奉戰爭雖攙和了一些軍閥勢力，在客觀上却是一種民族解放的戰爭。』顯然地，這是對於浙奉戰爭的過分估計，是錯誤的。

在浙奉戰爭中，奉系軍閥因爲當時反奉運動的發展，以

及孫傳芳、吳佩孚等軍閥得到英帝國主義的幫助，很快地在上海，在津浦線上都遭受失敗。在奉系軍閥的潰退中，奉系軍閥張作霖派張學良、郭松齡入關助戰。但在革命運動發展的情形下，影響了一部分軍閥傾向於革命，而開始了郭松齡的倒戈。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郭松齡在灤州倒戈，率軍出關，勢如破竹，佔領錦州，進逼瀋陽，奉系軍閥更其迅速崩潰。於是日本帝國主義乃直接幫助其工具奉系軍閥，出兵二千五百佔領奉天兵工廠，火藥庫，以日軍喬裝奉軍直接進攻郭松齡，另以飛機八十架轟炸郭軍。在日本直接出兵與奉軍的夾攻下，郭松齡於十二月二十三日遭受慘敗，郭松齡也被捕槍殺。

在反奉戰爭中，廣大羣衆又利用這一時機開展革命運動，因而在反奉戰爭爆發後革命運動又重新高漲。在上海，奉系軍閥失敗後，舉行了廣大的羣衆大會，在大會上還提出了反對關稅會議、反對滬案重查、要求關稅自主、要求啟封工會及各種民衆團體，要求集會、結社、言論、罷工之自由權利。在北京，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舉行廣大的羣衆示威運動，高舉『首都革命』的大旗，以打倒軍閥政府、建設民衆政府、驅逐段祺瑞、收回關稅自主、廢除不平等條約等等爲其鬥爭的目標。其次在武漢、長沙、開封等地也發生廣大羣衆反對奉系軍閥的運動。這一反對軍閥的廣大羣衆運動顯然是五卅運動的繼續。

此外，軍閥中的一部分比較與帝國主義關係不密切的，就繼續進一步的傾向到國民革命運動方面來。馮玉祥領導的國民軍便是如此。國民軍，在五卅運動之後，受到廣大羣衆

的影響，更進一步地傾向於國民革命，而國民軍的勢力也日益擴大起來，擁有京津、直隸、內蒙、河南等地。雖然國民軍還不是民衆的革命的武裝力量，而是軍閥中傾向於革命的軍隊，然而，在國民軍的統治下，革命運動竟得到了發展的機會。例如當時天津唐山鄭州的工人運動及河南直隸某些區域的農民運動都很有發展，只在河南一省，就有將近二十萬人的農民協會會員和六萬多的農民自衛軍。

在革命運動繼續發展與轉向革命的國民軍勢力日益擴大的威脅下，英日帝國主義又重新聯合向革命進攻。這一聯合與進攻便從張作霖、吳佩孚的聯合反對國民軍與三一八（一九二六）慘殺中清楚地表現出來了。奉直軍閥合作後，奉軍又復入關進駐灤州，而李景林、張宗昌之直魯聯軍也在日本帝國主義幫助下向直隸進發。當時國民軍在津南曾擊敗直魯聯軍，於是日本帝國主義又親自出馬了。三月十二日，日艦二艘駛入大沽口，砲擊國民軍，國民軍亦開始還擊。十三日，日本向中國提出抗議。十六日，英、美、日、法、意、荷、比、西八國公使向我國提出嚴重通牒。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因大沽事件在天安門舉行國民大會，到會數千餘人。會後舉行遊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段祺瑞』，『驅逐八國公使』等口號。隊伍至國務院時，段祺瑞便命衛隊開槍射擊羣衆，當場死二十六人，重傷二百餘人，在醫院因傷致命的二十餘人。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經過賣國政府段祺瑞鎮壓革命運動的「三一八」歷史慘劇。

奉直軍閥聯合向國民軍進攻的戰爭卒於一九二六年三月開始，激戰於灤州、通州、黃村等地。四月國民軍被迫守南

口，後又退回內蒙及西北一帶。在三一八慘殺與國民軍退守南口後，北方革命運動即表現了相當消沉的狀態，張吳會見於北京，反革命又囂張起來積極向革命進攻，積極製造黑暗の恐怖。英帝國主義聲言將調英軍來進攻中國，以六十萬鎊爲中國反赤宣傳費。他們在上海組織了一個護憲會，其目的是反對過激主義。中國的反革命派在帝國主義之領導下也組織『反赤大同盟』，進行所謂反共工作。還有所謂『國民制赤會』『人權保障會』等組織，這些組織的共同目的，都是在帝國主義的指揮下，藉口『反赤』『反共』的名義，以進行反革命和賣國的活動。

五卅運動後，中國北部和中部時局發展的情形，一般就如上述。

五 南方革命政府的鞏固與廣東的統一

在南方，五卅運動後，廣東革命政府的力量更加鞏固與發展，也就是革命力量的更加鞏固與發展。這種鞏固與發展，首先是從肅清反革命勢力的鬥爭中獲得的。孫中山北上及其死後，廣東由胡漢民代理大元帥職務，當時黃埔革命軍得到第一次東征的勝利。一九二五年六月間滇軍總司令楊希閔與劉震寰勾結，企圖推翻革命政府。當時革命政府以迅速的手段肅清楊劉的叛亂：六月五日下午令免楊劉職，六日據河南與楊劉交戰，十二日將楊劉都肅清，革命政府遂危而復安。但爲集中力量肅清楊劉，革命軍却迫不得已地退出了血戰而得的潮汕了。

肅清楊劉後，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正式成立（原稱大元帥

府)，以汪精衛爲國民政府主席，並將各軍名目一律改爲國民革命軍。國民政府的成立顯然是革命政府內部更爲鞏固的表現，同時革命政府的成立又是在五卅運動中首先就是省港罷工中湧現出來的。它是當時中國唯一的革命政府。

在革命勢力的鞏固與發展中，帝國主義者也就更積極地採用各種陰謀詭計來破壞革命，首先就是收買國民黨內部的反革命右派份子刺殺國民黨最好的革命先進，當時國民黨左派著名的領袖——廖仲凱（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八月二十日廖氏被刺遇害，其次是援助陳炯明再趨於東江，並聯絡北江、南路、中路反革命勢力，陰謀推翻國民政府。然而國民政府依靠在羣衆力量上終於把廣州左右的反革命勢力肅清：十月初發覺川軍有通敵嫌疑，乃將川軍總司令熊克武逮捕；旋即舉行第二次東征，十月十四日東征軍攻破惠州，十一月將陳部完全擊潰，收復東江；在南路，亦將鄧本鄧部肅清；至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底，廣東除瓊崖外已完全爲革命軍所統一了。

在廣東國民政府的鞏固與發展的推動下，廣東以及中國東南部的羣衆革命鬥爭是在不斷地向前推進。在廣東，省港罷工是繼續着，英帝國主義雖然用盡千方百計來破壞罷工，但是工人階級的鞏固的團結，使帝國主義一切陰謀終歸失敗。罷工的結果，使英帝國主義在香港每天損失一百八十萬元，使繁華富麗的香港一變而爲滿目荒涼的海島；同時省港罷工的堅持，也正使得廣東國民政府更加鞏固，威信更加提高起來。工人的罷工運動，在上海，雖然一九二五年九月底上海總工會被封後罷工運動暫時的停頓，但在一九二六年罷

工運動又很快地發展起來。據當時「響導週報」的統計，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至四月一日，上海有一六、四〇〇工人罷工，罷工時間共五八六、一五〇小時。五卅週年紀念那天，罷工人數共有七萬餘人。自五卅週年紀念後一個月（六月），上海發生百多次的工人罷工，罷工人數共達七萬餘人，罷工時間共三、三六四、六二二小時。這說明在這一時期的工人罷工運動迅速高漲。在這一罷工運動中，工人階級的團結與組織力量也日益增加。一九二六年六月在上海總工會領導下組織的工人有二十一萬七千〇四人，差不多上海所有工廠中都有工會支部的組織，上海總工會的權威也大大的提高了。在其他地方罷工運動也有很大的發展。在武漢，漢口英商香烟廠女工，日本大友紗廠工人也曾相繼發生罷工。

在工人鬥爭的發展上，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全國第三次勞動大會於廣州開幕，到會代表共五百餘人，代表有組織的一百二十四萬一千餘工人。這表現工人的組織比二次勞動大會時更加發展了。同時這次勞動大會開幕，正是英國工人階級總罷工的時候，所以大會代表一致通電聲援，更增加這次大會的意義。

五卅運動後，不僅工人運動迅速的發展，而且農民運動也有飛快的發展。一九二六年五月在廣州舉行了廣東全省第三次農民協會代表大會。據當時的統計，有六十萬農民已經加入了農民協會。在五卅運動之後，許多地方的農民已經從原始的行動轉變為有組織的羣衆運動了。

羣衆革命運動發展的進程中，國民黨內革命勢力也跟着增長起來，於是國民黨中急進分子與溫和分子間的鬥爭又展

其激烈化了。先是一些溫和分子於五卅後在北京召集西山會議，在北京組織了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在上海則組織了辛亥同志俱樂部，在廣州則成立了孫文主義學會。當時帝國主義者就收買了一些反革命賣國分子，如繆斌（北平失陷後，當日寇的偽宣撫部長，）之流，利用這些組織，假借國民黨名義，假借孫文主義的名義，來破壞國共合作，製造謠言，挑撥國共之間的感情，分裂國民黨，以便由此來破壞當時如日方中的革命運動。不幸的，戴季陶在五卅前後，一共發表了幾個小冊子，如：『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中國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他所發揮的理論主要的是從消極方面來了解孫文主義，懷疑中山先生與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所決定的三大政策。這樣子，這兩個小冊子就被帝國主義者反革命分子利用為破壞革命統一戰綫的工具。因此，這兩個小冊子，後來曾遭受了國民黨中央的指摘，認為是不應該出版的。

在國民黨溫和分子與急進分子間的激烈鬥爭中，國民黨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在廣州舉行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到會代表二百五十餘人。由於革命勢力的增長，在大會上急進分子終於獲得了勝利，通過許多革命的決議案，接受了孫中山先生的遺囑與繼續執行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對於分裂分子給予了打擊，對其首要人物，或開除黨籍，或給予警告。

但是也正是在這時候，帝國主義者分裂中國革命的活動更加劇起來。帝國主義者在這時候，不但在北方進行了張吳的聯合，造成了三一八大慘案，而且在南方更進行了挑撥的

陰謀，而發生了廣州三月二十日的事變。三月二十日，帝國主義者曾利用了代表『市民層』的中間派的弱點，經過反革命賣國分子如繆斌等，在國民革命軍中，在黃埔學校中，肆行造謠離間，結果引動了一部分當局者。他們藉口中山艦升火誣蔑共產黨陰謀暴動，調動武裝力量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及僑人住宅，宣布緊急戒嚴，逮捕李之龍（海軍局代局長兼中山艦艦長，當時是共產黨員）及各軍黨代表（共產黨員）五十餘人。這一事變是帝國主義分裂政策的嚴重試驗，而且也明顯地表現了代表『市民層』的中間派在革命中爭求優越地位的企圖及其動搖的弱點。這事變顯然是帝國主義者削弱共產黨與革命勢力的陰謀。

經過這次事變，共產黨及左傾革命青年，就退出了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但這對於革命沒有好處，對於國民黨也沒有好處。因為第一次第二次東征之後，業已証明了共產主義青年軍官在戰鬥中出生入死的勇敢，國民革命軍就是由他們的幫助，克復了大敵的；而且他們的退出，事實上已大大地削弱了自己的戰鬥力，這是在後來北伐中王柏齡所統率的第一軍作戰的經過所明白證實了的。助成這種退出成為事實的，就是當時機會主義者對於帝國主義者這種分裂陰謀，沒有採取過任何適當抵抗的方法。

五月十五日舉行的國民黨中央全體會議時，一部分國民黨人主張在會議中提出『黨務整理案』——主張共產黨在國民黨各高級黨部不能佔委員三分之一以上，共產黨不能當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國民黨黨員不得加入共產黨，共產黨須將加入國民黨的黨員名單交國民黨中央保存，第三國際對於

中國共產黨的指示須先交國共聯席會議通過等。在這時候，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分裂陰謀繼續發生作用，一方面是中共的繼續退却。在帝國主義分裂陰謀下，當時代表『市民層』的中間派雖然繼續有不幸的錯誤舉動，但一般說來，他們還願意革命，而且當時如果沒有左翼革命勢力與廣大羣衆力量及共產黨人的依靠，則廣東國民政府的政權是不能堅固的，並且也不能進行北伐；而且當時北方黑暗勢力重新結合，三一八慘案對於全國的震動，及其最露骨地暴露了北方軍閥爲帝國主義工具的醜惡，使全國人心更趨向於革命統一戰綫，而使帝國主義陰謀無從進一步地實現。所以民族革命統一戰綫沒有因此卽陷於不幸的分裂。當時代表『市民層』的中間派之舉動，大體上還是在於企圖當大革命發展的前面，爭取得自己優越的地位和領導權，以控制革命超出自己所劃定的範圍。當時爲着避免革命的分裂，革命的讓步有時也爲不得已的必需，但這裏同時又必需顧及避免革命力量的削弱；但當時機會主義者是不能理解這種革命的原則的，結果在事實上就造成了許多錯誤，而其後進一步的發展，就影響到後來中共領導機關以後機會主義的路綫之形成。

二 大革命第一階段的发展——北伐

一 國民革命軍的北伐

五卅運動後，中國政治形勢的特點，就是一方面革命運動日益擴大和發展，另一方面反革命派集中一切力量，鎮壓

和破壞革命運動。在全中國各地都充滿着革命與反革命的劇烈鬥爭。然而鬥爭形式除了廣東以外，在最廣大的中國區域內還限於遊行、示威、罷工、罷課、抵制英日貨與軍警衝突等，還沒有走到直接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最高形式。這種鬥爭是沒有法子能夠再長期的繼續下去，而必然向兩條道路發展：或者是反革命勢力把革命運動鎮壓下去，或者是革命力量推翻反革命的統治。中國那時革命的發展更是走向以革命戰爭的形式來進行推翻全國的反動統治。廣東革命軍的北伐，便是這一轉變的明顯表現。所以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實際就是在五卅運動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的結果。

武裝鬥爭的形式，在中國，和其他各資本主義國家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中國因為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度；帝國主義勢力範圍的劃分，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軍閥的封建割據，就使得中國革命發展也不平衡，使中國革命武裝鬥爭形式開始在一省或一區域首先勝利。在這裏首先能組織起革命的軍隊，以便和反革命的軍隊作戰，爭取革命在其他省區和全國的勝利。斯大林在北伐時，論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事實正是說明了這個特點的。在五卅運動後，中國革命首先在廣東得到初步勝利。這一勝利就是革命勢力擴大到其他省區和全國而取得革命勝利的張本。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就是將革命發展到全國去的一種行動。這種行動是以革命戰爭的形式表現出來。

國共合作後，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不斷的向前發展。這種發展到五卅運動便開始了中國的大革命，而北伐則是將國民革命運動將大革命的開始直接轉入大革命。所以從北伐開始

就更直接的掀動了全中國革命的大風暴，推動着全中國的階級捲入大革命的洪濤中。

一九二六年七月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是完全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就是當時北伐的最有力的主動者。因為當時全國革命形勢的繼續發展，無疑地需要以革命戰爭的形式去代替舊有的形式，當時全中國廣大羣衆，也迫切要求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此外廣東革命營壘內部的鬥爭，同樣也需要從向外發展中，從與主要的敵人帝國主義軍閥的直接鬭爭中去求得暫時的解決。但當時陳獨秀個人却反對北伐，違反中共中央的決定，在「響導週報」上發表「論北伐」一文，對於時局有了很錯誤的估計，對於北伐採取消極的態度。顯然的，這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思想表現的一方面，是完全錯誤的。

經過三月二十日的事變，以及五月十五日的國民黨中央全會「黨務整理案」的調度，在北伐進軍之前，國民政府軍制人物有了新變更：國民革命軍建置一總司令，國民政府之下之海陸空軍均受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統轄，其他政治訓練部、參謀部、海軍局、航空局、兵工廠等機關亦屬總司令部管轄，且自北伐動令下後，凡國民政府所屬軍、民、財各部機關均須受總司令指揮，可以由總司令加以委任，此外，國民政府之軍事委員會，國民黨中央軍人部長，也是總司令所兼任。這些調度，從歷史的實質看來，是和那留心於革命和北伐的果實，留心於革命的範圍——這些問題，息息相關的。「番民層」經過這些調度，全國使革命和北伐的果實，完全落在它的手裏。

另一方面說來，雖然經過不幸的中山艦事件，但急進的

革命影響在各軍之間，則仍是很大的，而且還是在發展着，而這種影響的程度，正決定了各軍戰鬥力的強弱。凡是這種影響的程度特別顯大的，則其戰績必特別出人頭地；如國民軍第四軍，這是衆所周知有戰鬥力的「鐵軍」；第二軍第六軍，在廣東時，本來是沒有赫赫之名的，但在後來北伐中，其戰績却有特別的紀錄（當時第二軍政治部主任是共產黨員李富春，第六軍的政治部主任，是老同盟會員後來又是共產黨員的林祖涵），轉向革命的第八軍，在後來北伐進行中，也特別表現了戰鬥力，這些都正是因為急進的革命影響在那裏加強而獲得的。但機會主義者却是完全不了解這種意義的，反而爲顧全某階層的自私意圖，時常自動地從事避免軍隊中這種革命影響的加強，主張不要在軍隊中加強革命的力量以求決定革命的勝利，把革命軍隊與羣衆運動看成兩個不相關聯和互相割裂的革命工作問題；在北伐前，即給大革命鑄成了大錯。

二 北伐軍的勝利

一九二六年七月，廣東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從廣東出發入湖南向武漢前進。在廣大的羣衆的擁護下，北伐軍節節勝利：七月十二日第七第八兩軍破敵於永豐、衡山、湘鄉等處，乘勝追擊，遂於七月十二日佔領長沙。二十一日佔岳州，趙恆惕等都狼狽北竄。接着經過汀泗橋之血戰與賀勝橋一帶之肉搏（敵方吳佩孚親自督戰），於九月七日佔領漢口、漢陽，至十月十日第四、第八兩軍之一部攻入武昌城；從此武漢三鎮完全入於國民革命軍手中。

在江西方面，革命軍第一、第二兩軍於九月二十日進佔南昌，旋因孫傳芳部的反攻又復退出，以後經過不斷的劇烈戰鬪，卒將孫部擊潰與消滅。至十一月四日，革命軍攻克九江，十一月八日北伐軍始入南昌。

在福建方面，敵周蔭人部乘革命軍北伐之際，於九月下旬大舉向潮梅進攻，為第一軍所擊敗。第一軍乘勝進佔永定，旋即於十一月佔漳州。十二月下旬革命軍入福州，不及三月，福建全入國民政府的統治下。

在北方，國民軍日益傾向革命。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馮玉祥由蘇聯返國，十六日發表宣言，稱今後之國民軍完全為民衆的武裝，十七日在五原宣誓就國民軍聯軍總司令職，宣誓接受國民黨主張，率國民軍全體加入國民黨。一九二六年底國民軍奠定陝西全省。

北伐軍在北伐進程中所以能夠迅速勝利是由於：

第一，反動統治的腐敗、動搖與崩潰。吳佩孚、孫傳芳等軍伐在全國革命浪潮前面迅速的崩潰沒落。北伐軍到處，這些軍閥就望風披靡，而帝國主義在革命力量前面亦表示了一時的驚惶失措。同時軍閥內部雖然企圖聯合一致來反對革命，可是因為內部矛盾的存在這種企圖的實現却要經過許多曲折，而且聯合也是有限度的。

第二，是全國廣大羣衆對於北伐軍的擁護。北伐軍所到的地方都得到羣衆許多幫助，如任響導運輸，參加作戰等。譬如在克復平江的戰爭中，「此次北伐勝利，奪取平江，其力量全在農民。」又說「農民大舉幫助……冒彈衝鋒，勇敢登山，敵兵大亂。」北鄉、西鄉、浩口、梓江一帶農民亦

紛紛殺敵。」「此次敵軍被民衆殺死者不下百餘人。」再加岳州之戰，由於農民担任嚮導，繞道而至敵人之背，夾攻敵人，岳州始克。粵漢鐵路工人積極破壞敵人的交通。漢陽兵工廠工人則舉行罷工響應北伐軍的進攻。汀泗橋之戰，得力於羣衆之幫助尤多。所以衆羣的鬪爭參戰是北伐勝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是中國共產黨黨員與左派的模範作用與英勇的鬪爭。當時的北伐軍左派佔極大的影響，軍隊中的共產黨員亦復不少。這些左派與共產黨員在每一戰鬪中都顯示其英勇與模範的作用。在最困難的戰綫上，在最危急的情況下，往往都是以左派所掌握的軍隊去解決戰鬪的。有名的汀泗橋的血戰與賀勝橋的血戰，是左派領導而共產黨員最多的第四軍奮勇作戰獲勝的。克復武昌同樣是以四軍共產黨員的最多一部爲先鋒。

三 北伐中各地的民衆革命

革命勢力的發展，統治了中國很大部分的江山，這不但是軍事上的勝利，而且廣大工農在戰鬥中，在配合北伐的軍事動作中，也團結起來組織起來了。反帝反軍閥的民權革命本來是依靠於工農基本力量而發展起來的，而其所以能得到迅速的勝利，及其勝利的保障，是由於工農力量進一步的發展，尤須依賴工農基本力量進一步的發展。所以，控制這種力量發展的全圖，本來對於革命是不利的。在國民革命軍佔領武漢後，武漢廣大工人羣衆的鬪爭空前未有的開展起來。在北伐軍未到前五月中，漢口紗廠、烟草工人，已經開始鬥

爭；北伐軍佔領武漢後，工人罷工浪潮更加高漲。北伐軍佔領武漢後不上二月，在武漢總工會領導下的工會會員已擴大到三十萬人，工會組織也擴大到二百多個。至一九二六年冬一九二七年春，武漢自郵務、印刷、紗廠、香煙、銀行職員一直到店員、手工業工人無不捲入罷工浪潮的漩渦中。在武漢是如此，在其他地方亦如此。據當時的統計，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止，湖南工會組織由五縣增至四十縣，工會會員由六萬增至十五萬人。這是在工人運動這一方面。

在農民運動方面也是如此。據當時的統計，截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止，湖南一省有五十四縣已有農民協會組織，農民協會會員共有一百〇七萬一千一百三十七人，其中有十萬人以上的組織計四縣，有五萬人以上的組織計六縣，有一萬人以上的組織計十二縣，有五千人以上組織計十二縣，有一千人以上組織計十八縣，不滿一千人的計二縣。這些農民加入農民協會，一面爲着參加革命戰爭，同時也爲着改良自己的生活。農民當時的普通要求是減租、減息、廢除苛捐雜稅、要求武裝、打倒土豪劣紳等。至一九二七年一月間，湖南全省農民協會的組織擴大至二百萬人。在湖北也是如此。在那時，湖北統計二十餘縣有農民協會組織，會員也有十餘萬。其他如江西、福建等地，在革命軍所到的地方，工人和農民的鬥爭也擴大的發展起來。

在北伐勝利與工農奮鬥的發展上面，帝國主義又施行其屠殺政策了！英帝國主義乘英輪兩艘被楊森扣留之機會（因英輪撞沉木船十數隻，溺死人民數十人，官兵五六七人，故爲楊森扣留），以兵艦三艘駛近萬縣，用巨砲對準萬縣縣城

兩岸及南京街商場萬縣中學掃射，發砲三百餘響，更用硫磺炸彈焚毀萬縣商店，計被炸燬商店二百餘家，民房不計其數，死人民官兵五六千人。這就是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的萬縣慘案。帝國主義的這種慘無人道的殘殺，不僅不能阻止中國民衆反帝運動的高漲，相反的，反帝鬥爭却進一步的發揚起來。在重慶，曾因萬縣事件舉行三萬餘人的示威遊行。漢口、上海、廈門等地反帝的熱潮更因此而洶湧澎湃起來。

帝國主義的屠殺同時也在武漢發生。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至三日，武漢舉行廣大羣衆的慶祝國民革命軍勝利的大會。在這一慶祝大會中與英帝國主義的軍隊發生衝突，英兵以刺刀殺死刺傷羣衆三十餘人。這便是一月三日的事變。這一慘案發生後，武漢羣衆在憤恨中於是晚召集緊急會議，並議決：

一，要求政府向英領事提出嚴重抗議，限英領事於七十二小時以內答覆下列條件：

- (一) 英政府須負責賠償此次同胞死傷之損失；
- (二) 英政府須立即將肇禍兇手交中國政府依法懲辦；
- (三) 英政府須立即撤退駐漢英艦及英界之沙包電網等作戰物；
- (四) 英政府須向國民政府道歉；
- (五) 英租界內華人須有集會、結社、遊行、演講之絕對自由；
- (六) 英租界巡捕及義勇隊須一律解除武裝；
- (七) 英租界須由中國政府派軍警管理。

二，同時要求政府自動辦理下列各項：

- (一) 立即收回英租界；
- (二) 立即收回海關；
- (三) 立即取消英輪在中國之內地航行權；
- (四) 立即撤消英人在華領事裁判權。

三，如英領事對於國民政府所提之條件不能接受時，民衆決自動封鎖英租界，實行對英總罷工。

四，實行對英經濟絕交，由總商會通告，嚴禁買賣英貨。

這一次決議提交國民政府。當時國民政府是革命的政府，全部接受，轉提至英領事館，結果，在羣衆的威脅下，英國政府只得完全答應。在羣衆的威力下自動收回了漢口英租界。這表現羣衆力量之偉大，使英帝國主義不能不屈服與讓步。這是中國民衆自動收回租界破天荒的第一次，這是大革命偉大的果實之一，這事變使全世界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大革命的前圖，都感到極大的震動和驚慌了。

在革命運動發展的怒潮中，羣衆中的積極分子不斷的湧進到革命政黨中來，因為在北伐勝利的過程中，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也大大的擴大了。中國國民黨從北伐開始時的五十萬黨員增加到五百萬黨員左右。中國共產黨員亦由五萬人擴大到五十萬人左右，而魯進的勢力也隨着革命的發展而加強起來。革命政黨的擴大與組織的鞏固，也就是革命運動更是一日千里的向前開展起來。

四 上海的三次起義

一九二六年秋冬間，在北伐軍進攻江西，孫傳芳節節失敗中，上海的情形異常混亂。上海的資產者發起自治運動，羣衆反孫傳芳擁護革命的運動亦益形高漲。在十月十六日夏超在浙江宣佈獨立，軍閥內部非常動搖的情形下，上海共產黨領導機關決定舉行起義。然而這一個起義終於失敗了。當時共產黨的領導機關雖則做了這樣決定，但事實上却全無準備，當時參加起義的武裝工人隊伍只有一百多，其他沒有武裝的工人隊伍亦屬微少。本來起義是一種藝術，正如列寧所說過的：『決不可以憑藉一種秘密的結合或是一個政黨，而必須依靠在一個先進的階級之上。起義必須依靠着全體民衆革命力量之高漲。起義必須在革命高漲到極頂的轉變時期時起義起來，即必須當羣衆先鋒隊的活動力量達到了最大限度時，即當敵人的營壘中和軟弱的不澈底的不堅決的同信革命的隊伍中發生最厲害的動搖時起義起來。』（『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一三九頁）然而這一次起義的情形却不是如此。第一，不但當時起義是依靠着少數的黨員和少數的武裝隊伍，而且共產黨都沒有把起義的領導放在自己手裏，反而交給了一個資產者的代表者。第二，在當時，上海工人階級與羣衆的鬭爭還沒有走到廣大的革命潮流高漲的頂點，參加起義的羣衆只是極其微少的一部分。第三，當時孫傳芳在上海統治的動搖還沒有走到不能繼續統治的地位，而且他還能夠擊潰與鎮壓夏超的倒戈，而起義的開始正在夏超失敗之後。確實說來，上海第一次起義並不是羣衆的武裝起義，而是少

敵人的軍事陰謀。這一軍事陰謀的結果，當然只能是失敗。

一九二七年一月間，北伐軍在民衆力量的幫助下，發展更其迅速。十一月四日九江陷落，孫傳芳部隊被擊潰退至南京。上海的情形更其混亂，一方面孫傳芳準備退却，另一方面張宗昌部準備來滬。羣衆運動更其發展了，到處出現學生、工人的大批宣傳隊，散發大量的傳單。上海於十一月八日及十二月十二日曾召集二次羣衆大會，反對孫傳芳及張宗昌來滬。至二月十七日北伐軍佔領杭州，二月十八日一部分北伐軍佔領嘉興。中國共產黨爲幫助北伐軍的進展，遂準備舉行上海第二次起義。首先上海總工會於十八日晚發出總同盟罷工命令。十九日全上海總同盟罷工開始。第一天參加罷工人數達十五萬，第二天（二十日）罷工人數增加至二十七萬五千餘人，罷工的第三天（二十一日）罷工人數增加至三十五萬。統計在上海總工會號召下參加罷工的工人有三十六萬以上。這表示工人階級參加鬥爭和響應北伐軍的積極性有了極大的增漲。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時武裝起義開始，罷工工人開始襲擊軍警，解除軍警武裝，同時一部分海軍同情於起義，開始砲擊高昌廟兵工廠，甯北南市有些地方發生工人與軍警的巷戰。不過，結果二次起義還是被孫傳芳用野蠻殘酷的手段打擊下去了。二月二十四日上海總工會下令復工，略謂「非因退讓而復工，乃爲準備更大的鬥爭而復工。」

二次起義顯然與第一次起義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上海廣大的工人羣衆積極參加了這次起義，這是一；第二，上海的羣衆鬥爭比第一次起義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第三，孫傳芳的反動勢力動搖崩潰更其厲害。然而這次的起義還是失敗

了，爲什麼呢？原因是：武裝起義沒有能夠與北伐軍的行動配合起來，或發動城郊的廣大游擊戰爭與起義配合起來，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還很差，動員其他中間階層的羣衆來參加的工作和瓦解反革命軍隊的工作，還作得很不夠，特別重要的，就是事先在反革命的軍隊中沒有重大的工作，沒有用一切力量從反革命的軍隊中去動搖其軍心，爭取其士兵甚至中下層的軍官到起義方面來，沒有好好去組織反革命軍隊的叛變到革命方面來，因此，還不能最大限度地去孤立反革命者。

二次起義失敗後，孫傳芳用最殘酷的手段屠殺工人，用大刀砍殺工人領袖以及散傳單看傳單的工人，並懸首電桿，拋屍道旁，以殺戮來威嚇工人。這更引起了羣衆之深刻憤恨。三次起義雖然失敗，但毫無疑問的，是給了孫傳芳的要害以極大的打擊，促進了孫傳芳的沒落，並促進了北伐軍節節勝利。

三月十一日『上海鐵路工人罷工，滬寧鐵路在真茹附近被便衣隊拆毀。十二日上海各民衆團體在北軍的控制下，進行市民代表會，開臨時會議，舉定丁曉光等三十一人爲臨時執行委員，宣告受國民政府節制，建設民選政府。』（『中華民國政治史』，北平文化學社出版）三月二十四日，北伐軍進入南京。另一方面，在杭州方面的北伐軍亦直趨上海。三月二十一日國民革命軍已達龍華。上海工人羣衆雖則經過前次起義的失敗，但却益高漲着極大的革命熱情和革命毅力，進行響應北伐軍的行動，從事結束上海反革命的統治。三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時上海總工會發佈第二次總同盟罷工命

令，在上海總工會號召領導下面，參加總罷工的工人竟達八十萬人，上海工人絕大多數都參加了這次罷工。接着武裝起義便開始了。工人開始奪取軍警武裝，並佔領各個區域，向駐車站的直魯聯軍進攻。經過兩天一晚（從二十一日午至二十二日下午六時），經過劇烈的巷戰。三次起義終於勝利了。直魯軍的首領——畢庶澄逃入租界。當起義開始時，上海總工會派代表至龍華，請求北伐軍的將軍派隊前來幫助工人的起義，然而當時那將軍却遲疑沒有派兵，到了第一師向上海進軍時，這時上海工人階級已經完全依靠了自己的力量佔領了上海了。

三次起義勝利了。上海無產者與共產黨人驚人的勇敢與犧牲，表現了中國民族之活潑的生命，這勝利馬上震動了全世界。領導起義的中國的共產黨人，如羅亦農，如趙世炎，後來雖則慘死在清黨的苦迭撻中，然而也們的名字，和上海起義，和中華民族，是歷萬古而不朽的。

三次起義之所以能夠得到勝利，是由於當時上海的革命高潮已經到了最高的頂點，廣大的無產階級已經具有拚性命爲着起義的決心，最廣大的無產階級參加了起義；同時反動統治也極度動搖，雖則還未能發動廣大游擊戰爭在上海四周，但國民革命軍已迫近上海，只離上海數十里路；雖則國民革命軍沒有立即進軍以配合起義，但仍然對於起義是很大的幫助。而且在客觀上，還是一種武裝起義與革命軍進兵的結合，成了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這是當時的最便利於起義的時局。不但如此，在事前，起義也有着更好的準備：曾組織各階級的代表會，在羣衆中進行廣大的動員，起義前

路工人早已罷工，使敵人無法集中軍隊鎮壓起義；其次曾大量組織工人武裝力量，糾察隊有了五千人；最後，起義時間選擇得極其適當，總同盟罷工後即開始起義，起義開始後即採取了堅決進攻的戰鬥。然而關於爭取反革命軍隊中的士兵工作，從反革命軍隊內部去動搖和瓦解反革命軍隊的工作，還是沒有及時很快地去做，這仍是三次起義最大的缺憾。假如這方面有很好的工作，則起義將有更強大的力量，而且會有更大的勝利，而且會影響到起義後的變化。

起義後，由共產黨的發動召集了上海市民大會，選舉了代表，組織了上海市民政府。但是機會主義者在進行這事業中，沒有能在上海市內及其四郊，發動最廣大的民衆選舉運動以從事於這政府的建立，而這政府既因事先沒有能發動最廣大的市民（甚至最落後的市民）起來參加，沒有最大限度地進行自上而下的武裝勞動者，沒有宣佈明確的革命政綱，因此沒有立即引起最廣大的市民羣衆的密切關心，使他們團結在這市民政府的周圍，結成最堅固的革命長城。機會主義的領導者當時忙着拉攏資產者的代表參加市民政府，怕市民政府中沒有資產者的代表便不能進行工作。而資產者的代表却因為當時上海的實際權力操在上海武裝勞動者的手裏，不願意參加市民政府，他們忙的是要尋找一種武裝力量，來首先解除上海勞動者的武裝。機會主義的領導者，沒有找到資產者的代表，所以市民政府只是形式上的成立了，而沒有切實進行任何工作，並且放棄了爭取當時對革命有好感的有力軍隊到革命方面來，以便孤立帝國主義者反革命派資產者的陰謀。但資產者却藉了機會主義者之助，去進行取得勞動

者起義的果實，達到自己的目的，造成了革命的大不幸，清滅了上海工人以鮮血和性命所換來的事業。

但不論怎樣，上海的三次起義充分表現出了中國無產者在民族革命運動中的英勇的領導作用，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最光榮的一頁，而革命到這裏已經到了一個緊急關頭，革命是發展到了階級的新結合的階段了。

五 大革命中的帝國主義與軍閥

在北伐的勝利過程中，在中國大革命如火如荼的發展前面，帝國主義用盡了一切方法來破壞革命。

首先，帝國主義積極組織北方軍閥抵抗北伐軍的進攻。英日帝國主義都積極指使與援助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等軍閥來反對革命。可是在大革命的前面，這些軍閥都不能夠阻止革命向全中國的發展，吳佩孚在革命的鋒芒下迅速瓦解崩潰了，孫傳芳也遭受慘敗，奉系軍閥同樣不能擋住革命的洪流。帝國主義的這一策略顯然是失敗了。

其次，帝國主義企圖直接出兵干涉中國革命。英帝國主義聲稱出兵十萬征服中國，企圖以自己的武裝力量來抵抗北伐軍的進攻，可是這種企圖終於沒有實現。這是由於：第一，帝國主義間存在着劇烈的衝突，英帝國主義的出兵將遭受到其他帝國主義的反對；第二，當時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雖然進入到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時期，但以巨額的軍費的支出來征服中國仍然感到困難；第三，英國無產階級對於英帝國主義的出兵進攻中國的反對和牽制，如英國工人的總罷工等。這些原因就使英帝國主義大規模出兵進攻中國的企圖不

能够完全實現，但在上海，却是集中了相當的兵力的。

帝國主義破壞中國革命最毒辣最陰險的策略，便是破壞國民革命統一戰綫的分裂政策，這種政策是帝國主義一貫的技倆，也是時常可以收到成效的一種手段。帝國主義曾經以一些讓步來引誘中國民族資產者退出統一戰綫，譬如：在上海，帝國主義除用關稅會議、法權會議來收買中國資產者赴宴，告訴他們需要與帝國主義聯合，一致反對革命，同時工部局並吸收一些中國資產者參加為董事。『孫傳芳阻擋廣東軍隊前進的失敗，使帝國主義列強相信，利用本地軍閥來破壞國民革命的工具的傳統方法，現在已不能完全適合實際了。同時，帝國主義列強之互相競爭，使他們不能聯合而實行公開的武力干涉。帝國主義正在找尋適應現在局面的新方法，這種新政策，就是趨向於承認廣東政府……然而，這不過是外交手段，其幕後，還隱藏着帝國主義反革命的陰謀毒計。』『帝國主義看見軍閥不能作消滅革命運動的有效工具，於是用和平方法，在民族革命勢力中，找尋他的同盟者。帝國主義者企圖叫醒民族資產者，使之脫離革命戰綫。』（國際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決議）帝國主義的這種政策在他自己口中也說得非常明白。下面便是一個有趣的上海『字林西報』（英帝國主義的報紙）的社論，這是在收回漢口英租界後發表的：

『雖吾人不願在未得詳細報告之前有所評論，然目前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之政治色彩亦不可不加以注意。暴動或者是偶然的不能前知的一粒火星，可使羣衆發狂，然而此等暴動能創造歷史，並且常常是建立一個新政府的機會。國民黨有溫和派（他們主張維持秩序）與極端派（他們主張擾亂秩序）是

公開的事。極端派甚懼溫和派掌握政府大權。他們對於英國公使與國民政府間諒解之可能，極爲怨恨。他們深怕他們的活動將因藍浦生與陳友仁間之談判而縮短。他們尤其恐怕的是英國對華的友誼的提案（即新提案）已博得華人之好感因而使他們之反英宣傳失敗。極端派因此將利用一切機會再煽起反英的火焰，此非因彼等深恨英國，實彼等以此爲政治活動之手段。

『今漢口事件實爲試驗國民政府有沒有能力、配不配的一個非常的機會。一個政府而能保護生命財產商業，則爲正當之政府。現在國民政府擔任保護漢口英租界生命財產之責任直到事態能使英國自行負責之時爲止。若國民政府不克負此責任，則吾人甚覺慚愧（意謂看錯了人故自慚）。即反對國民政府者，見了國民政府之能維持秩序與法律，亦將棄而與國民政府爲友。非然者，彼等反對國民政府之意見將更堅決。最後決定將於此後數日內國民政府處理漢口事件之態度而覘見之。如果羣衆是壓靜了，如果沒有罷工與抵制，如果貨物能應市場之需要而自由進出，如果外人無生命之憂，則國民政府是証明了有權力。非然者國民政府之前途就可悲觀。

『今全世界咸注目漢口事件，大英是能忍受的。華人終將認識究竟誰是他們的朋友，大英能靜待公平之解決。但若羣衆洶洶不休，而國民政府袖手旁觀，則英人之忍耐將至終結。似乎國民政府已擔任了保護外人生命財產之責任了。吾人將視其究竟辦到怎麼樣的圓滿。當一羣極端的暴動發狂的時候，政府辦事是極揀手的。有價值，莫如武力維持秩序、

負責任、有決斷等等。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應該能夠做出來給全世界看，証明他們（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是有權力，有決斷的。換言之，如果他們沒有辦法，則保護生命財產與商業的方法一定可以找到。現在是無可躲閃的時機，不論是英人方面或國民政府方面。』

這篇文章反映了當時帝國主義者真正的企圖，而且他們也正真實地半明半暗地做挑撥離間的實際工作。黃郛（這個業已蓋棺論定的日本帝國主義者走狗和反革命陰謀家）與王正廷等輩的活動，也就是帝國主義者進行挑撥離間工作的實際寫照。

北方一個日本特務機關長官於華北事變後，曾公開說到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大革命時所感到的恐怖，因而用各種方法以挑撥當時國共合作，而使革命戰線分裂。

爲破壞革命，帝國主義者更謀腐化革命的內部。『爲使民族運動內增加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勢力起見，於是那些迄今還站在民族革命鬥爭之外，或甚至仇視革命的某部分大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開始轉變到國民政府方面。這種舉動的目的，是從革命的聯合（無產者，農人，城市小資產者）的手中，奪取革命領導權，以阻碍革命的發展。這些反革命舉動的主謀者，便是國際帝國主義。』（國際十一月決議）當時一些軍閥的轉向革命，並不是爲着革命而來，而是在大革命的壓迫下，在不能夠抵抗革命勢力發展的情形下，爲着保持自己的勢力，保持原有的地盤，不能不換上革命的外衣，同時也爲着破壞革命，由公開的從外面反對革命，轉而鑽進革命營壘中從革命的內部來反對革命的一種陰毒的策略，這

種政策正是在帝國主義的指示下，而與帝國主義的分裂政策合演的雙簧。中國大革命進一步的發展與深入，這些軍閥就必然的扯碎痔髮的革命外衣，而暴露其醜惡面目了。

六 『四一二』的『苦迭撻』

大革命的發展，使千千萬萬落後的羣衆，日益捲入到大革命的洪濤中，這是爭取民族解放的勝利與保障民族解放的澈底的途徑，帝國主義者正因此而驚慌起來，但民族資產者因爲缺乏政治的沉着與遠見，就不幸而上了帝國主義者挑撥離間詭計的圈套，把友人錯看成敵人，把敵人錯看成友人，對於民族解放真正的基本力量，認爲『如芒在背』，拘泥於『控制革命』和『奪取領導權』的狹窄胸襟，忽略了民族當前的大敵，忽略了民族革命的大局，他們這種動搖，在福州總工會委員長譚贊賢被殺的事件中，已表現得很明顯，到了上海勞動者的反帝反軍閥的第三次起義，以及帝國主義者在上海的襲擊，而登峯造極，並由此急轉直下地面演成了中國革命史上最殘酷的不幸事件，這就是『四一二』的苦迭撻。漢奸小醜，如黃郛、陳羣（南京失陷後，在南京傀儡政府中當僑內務部長）之輩，就在這時候，大顯號角，借清黨的名義，大肆屠殺曾與國民黨共過革命患難，而在革命中最爲出生入死的共產黨人，屠殺革命先鋒的工農羣衆了。

先是在一九二六年冬天，由於帝國主義的挑撥政策，南昌與武昌之間，曾發生了關於國民政府遷都地點的爭論，爭論的結果，大多數國民黨中央執委的意見，同意遷都武漢，因爲當時兩湖工農大衆革命運動的發展，武漢已成爲革命中

心，革命就應當依靠這中心，來發展全國革命的運動和領導全國的革命戰爭。

這個爭論雖則後來是那樣決定了，但毫無疑義的，帝國主義者却再利用了這爭論的罅隙，來擴大南昌與武漢之間的分歧。革命軍的繼續向東南發展，本來是一種正確的方向，但帝國主義者與反革命的陰謀家（黃郛等），却正是利用這點來促成當時軍事首領與武漢的分裂，帝國主義者與反革命陰謀家計劃着要在東南建立反對革命的根據地以便與武漢對立。在向東南的行動中，反革命的陰謀家更鼓唆沿途屠殺工農羣衆的顛覆，壓制羣衆運動的發展。

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國民黨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舉行於武漢，這次會議的中心口號是提高黨權，決定將政治、軍事、外交、財政等大權集中於黨。全會通過的議案中，改選常務委員九人，另舉軍人部長與組織部長，重新選舉軍事委員會委員十五人，改用主席團制，通過了軍事委員會大綱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例，決定出征動員令須由軍事委員會議決經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交總司令執行之。這些本來是國民黨內自己一種民主的決定，但帝國主義者與反革命的陰謀家，却利用武漢這種決定，就更加緊地挑撥離間，去促進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去促進革命統一戰線的分裂。

在分裂革命陣線的反革命陰謀下，福州反革命分子首先公開發動屠殺革命分子，接着上海一些流氓頭子即組織所謂『中華共進會』等組織以搗亂破壞工人的組織，並取得帝國主義的協助共同向上海無產者進攻。四月十一日晚，資產

階級代表者即已調集軍隊準備大規模的屠殺。準備就緒後，即於該晚派大批流氓偽裝工人向工人糾察隊襲擊，於是糾察隊與流氓發生衝突，資產階級的軍事代表者乃乘機藉口工人內訌，於是晚將工人糾察隊繳械。至十二日，全滬工人聞耗大憤，羣集開北開羣衆大會，並整隊往司令部請願。請願羣衆行至寶山路時，資產階級的代表者即派大批軍隊迎面開槍屠殺，繼以機關槍掃射，一時屍橫滿街，堆積如山，適大雨如注，血流遍街，死傷工人不計其數。這就是上海的『四一二』大慘殺。當時上海一些知識界的名流，目擊這個慘殺，曾聯名發表意見，認爲主義可以不講，但不能不顧及人道，對這個慘殺，表示了重大的抗議。繼而上海大肆拘捕與慘殺共產黨員和工人羣衆領袖。親日派黃郛等就是在這慘酷的苦迭捷中，彈冠相慶，得了上海市長等職務，陳羣等則充當滿身血穢的劊子手，時人把他和當時上海警備司令楊虎的名字並稱，稱爲『虎羣』。上海屠殺後，接着廣東亦於四月十五日大舉逮捕與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無數民族的精華，就在這樣殘酷的政策下犧牲了。革命英雄陳延年趙世炎就在此時先後犧牲了的。

『四一二』的苦迭捷，說明了中國資產者退出了國民革命的統一戰綫，中國大革命便進入了另一個新的階段。

對於『四一二』苦迭捷，當時託洛茨基主義者主張上海工人要採取決死的戰鬥。『……但是，他們不懂得，中國革命不能很快地發展，其一部分原因，是因爲目前國際環境比一九一七年要不順利些（在各帝國主義者間沒有戰爭）。他們不懂得在不順利的條件之下，後備軍還沒有準備妥當，是

不能够採取决死的戰鬥的，正如一九一七年四月或六月間，布爾塞維克不採取决死的戰鬥一樣。反對派不懂得，在不順利的條件之下，要是不避免（要是可以避免的時候）决死的戰鬥，這就等於幫助革命的敵人。」（斯大林）

從三次起義不屈不撓的鬥爭看來，上海工人階級曾表現了自己有極大的革命毅力的，然而革命是應該正確地利用這種革命毅力，而不應該隨便浪費這毅力。如果革命在某迷途的陰謀面前，能事先進行警戒，並努力爭取當時對革命有好感的第一師第二師站在革命方面，則即使不能防止苦迭捷的發生，也將給苦迭捷以有效力的抵抗，對革命全局且將有重大的影響，但機會主義者却完全解除了這警戒，這是很大的罪惡！到了事後，情勢已發生了另一種變化，在這時候革命不去進行决死的戰鬥，而是應該去準備力量，準備將來真正决死的戰鬥；如不去做這樣準備，如不為這樣準備去避免可以避免的决死的戰鬥，結果就將造成自己更大的失敗和不幸，而這也恰是革命敵人所願望的。陳獨秀機會主義者事先既完全解除了革命的警戒，事後又完全解除了真正的革命準備，這就是他罪惡的繼續，而當時託洛茨基主義者要求决死的戰鬥，事實上正是機會主義罪惡的另一面，是爲了幫助革命的敵人。

託洛茨基主義者藉口『四一二』苦迭捷，當時大吹特播，非難國共合作，非難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第一階段與民族資產者合作。託洛茨基主義者看不見中國是一個被壓迫的民族，否認被壓迫民族革命中建立革命統一戰綫的必要，看不見像十三年改組後的國民黨，正是半殖民地的中國環境

中產生的，這種民族壓迫的環境把國內一切革命分子都聯合到一個組織內。託洛茨基主義者看不見國民黨在其作反帝鬥爭時候的意義上，比較那克倫斯基，蔡爾特這一類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是要高出三丈的。即使那用各種方法來陷害國民黨急進分子和共產黨人的民族資產者的代表人，在其變節前，都要比克倫斯基和蔡爾特高出一些，因為克蘇兩人都進行戰爭，來爭取和壓迫土爾其、波斯、米索不達美亞和加利亞等等，以鞏固帝國主義，而中國民族資產者的代表者却進行過戰爭——無論好壞——反對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壓迫，這樣就減弱了帝國主義。（參考斯大林與中國勞動大學學生的談話，第二個問題）但一到『民族資產者變節了，它同時却失掉了與羣衆的聯繫。』這是最生動的歷史辯證法，不理解這種辯證法，就不能指導革命的前進。

在北伐過程中，正表現了國共合作的『互相幫助，互相發展』：經過國共合作，才成就了孫中山先生生平多年關於進出長江的企圖，國民黨力量才大大發展起來，國民黨聲望才大大提高起來，成為國民黨空前未有的盛事；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幫助了擴大革命的領土，同時也變為羣衆黨，取得公開組織無產者的可能，以及開拓接近農民的道路。國共合作是互利的，歷史正是這樣做了的，而這種互利，正是有利於中國革命，有利於中國民族。反之，帝國主義者和反革命派正是反對國共合作，而又反對國共互利的，帝國主義者所陰謀的，不僅在加害於共產黨，而也正是在加害於國民黨，同時也就是在加害於中國民族，這道理是極明白的。在那裏國共分裂的地方，那裏國民黨在羣衆中的名譽聲威就一落千

丈，正如許多國民黨人所公開承認了的，一切腐化墮落的分子，官僚政客，就因此得鑽進國民黨內，去作惡爲非，而且不管其願意不願意，都迫得要向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低頭。託洛茨基派的所以反對國共合作破壞國共合作，除了說明他們是爲帝國主義者效忠而外，不能找得其他的說明，這道理也是極明白的。

三 大革命的第二階段

一 「四一二」苦迭捷後的新形勢

『四一二』苦迭捷『是中國革命運動轉折之一』，中國大革命因此受到部分的失敗，同時也使中國革命進入更高的階段——從過去工人、農民、民族資產者，城市小資產者的革命統一戰綫轉入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了。『民族資產階級離開了民族戰綫，跑到反革命的營壘去，革命雖有部分的失敗，雖受了×××之徒的叛變，但是走進了一個更高的階段，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無產階級的聯合分裂了，開始轉變爲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的聯合，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同時加大。』（國際一九二七年五月決議）武漢革命的國民黨成了工農城市小資產者的聯盟。『……中國革命已發展到自己的第二階段，已經開始由全民聯合戰綫發展到千百萬工農羣衆的革命，發展到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將更甚加強和擴大反帝國主義，反豪紳封建地主，反軍閥以及反對×××反革命的鬥爭。』（斯大林）

當時託派（託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拉狄克等）對於民族資產者離開革命的估計，認為是中國革命的失敗，國際曾嚴厲指斥了這種錯誤這見解。國際認為，『四一二』的苦迭捷，是『中國革命的部分失敗，相當地加強了反革命的聯合。但是……若說這個失敗，便決定了革命的全部命運，這是錯誤的見解。這見解之所以不正確，僅舉一端便可瞭解。他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大敵，而置帝國主義勢力與資產階級間之關係不顧，且同時看輕了勞動羣衆偉大的無間的運動。要曉得帝國主義用盡手段向革命進攻，在民族革命戰綫中，一切動搖分子中間，佈滿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如果反革命的策源地不得國際帝國主義的保障……早被勝利的革命軍打得粉碎。共產國際執委認為一切支部的必要任務，是向工人階級及農民，說明事實的本相，要知帝國主義的軍隊事實上佔據了全中國的工業區域，正是中國反革命的主要力量。』事實也正証明了國際的估計，『革命雖有部分的失敗，而另一方面，過渡於更高階段底發展，更有力的動員羣衆之發軔，農民運動之擴大，起義武裝隊之組織，此項與日俱增的組織武力，屢次戰勝了叛軍，雖然反革命的恐怖猖獗萬分，而工人階級的組織繼續保存，共產黨及國民黨左翼之增大無已——凡此種種，都是中國革命繼長增高之主要徵象。』關於革命這種種的繼長增高，底下我們即將有所敘述。

四一二政變後，四月十七日武漢國民政府發表了斥責四一二『苦迭捷』及罷免其有關人物職務的命令，接着於四月二十五日武漢舉行羣衆大會，到羣衆三十餘萬人，反對四一二清黨舉動。東南方面實行封鎖武漢，反革命分子到處假借

『反共』爲名，與帝國主義勾結，進行拆散原有的工農革命組織，擴張白色恐怖。

武漢與南京之間在對內對外的政策，均表現了分歧，同時也正是表現了不同的統治。

在那時發生兩方面的北伐：一方面是南京的北伐，一方面是武漢政府的北伐。五月上旬南京的軍隊渡江北上，進佔清江浦、蚌埠、海州、徐州等地。武漢政府的軍隊由唐生智率領亦於同一時候向河南進攻，配合國民軍擊潰奉系，佔領鄭州、開封等地。（著名共產黨軍人蔣先雲即於河南戰役中殉難）。『在中國革命過程中，那已告終的階段的特徵，在於兩個營壘對峙：一方面是外國帝國主義、封建軍閥與買辦階級——一部分大資產階級——的營壘；另一方面是民族的資產階級、農民、手工業者、工人的營壘。這個階段有由兩個營壘對峙變爲三個營壘鼎立之趨勢，削去資產階級，使之與無產階級、手工業者、農民之『左派聯合』對抗。目前的局面，正以此三派鼎立爲其特徵。×××屠殺工農但仍反對北方軍閥。』（國際八次執委全體會議決議案）但是一般說來，這三個營壘的劃分，在當時實是有限的，而全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兩個營壘的劃分，則是無條件的，而且事實上，三個營壘這種情況是不能長期繼續下去的；民族資產者力量薄弱，不能形成自己的一個營壘，必然日益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接近。所以『戰鬥的全般邏輯，將變三派爲兩派，爲新式的兩派。』事實的過程完全証明了國際估計的正確。

二 武漢的革命與反革命

『中國革命中鉅大的困難，尤其是因帝國主義聯合勢力的武裝干涉或他種干涉，以及中國國內動搖的社會成分叛變革命投降敵方所生的困難，造成了目前鬥爭的條件；爲戰勝這種困難計，必須廣大勞動羣衆加入鬥爭始可。只有這些羣衆參加積極鬥爭，才能造成一種政權，打退內部的反革命及帝國主義的干涉，消滅封建制度的殘餘，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造成中國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的軌道上之先決條件。』（國際）爲着戰勝革命的困難，戰勝動搖者，求革命的擴大與深入，在武漢政府統治下的工農運動更飛速的發展起來。爲着鞏固革命，工人反抗了資本家的怠工，而且爲着鎮壓反革命的活動，組織了工人糾察隊，工人已部分地武裝起來。工會的組織更形擴大，把手工業以至大工業的工人都組織起來了。而總工會則在工人羣衆中樹立了無上的威信。農民鬥爭也大大的開展起來了，農村中反對土豪劣紳抗租抗糧的鬥爭如火如荼的發展起來，特別在湖南，有的地方已經沒收了中世紀剝削者的土地，農民自己動手分配了土地，有些地方則『擄標』預備分配土地。不僅如此，而且農民組織了自衛軍，有的地方拘捕豪紳地主戴高帽子遊街。農民協會發展得很迅速，只在湖北一個省分，一九二七年三月農民協會會員爲八十萬人，而到了五月十五日已增加到二百萬人。差不多到處都有農民協會，而農民協會在許多地方成爲鄉村中的實際政權。『農民革命……這是中國革命中新階段之主要的社會經濟內容。』（國際）

在另一方面，帝國主義、軍閥、豪紳、地主、資產者則積極的向武漢革命勢力進攻，動搖武漢政府內部的力量。帝國主義用經濟封鎖的政策來封鎖革命的武漢，造成武漢經濟的困難。而有的資本家則故意關廠息工，有的奸商罷業，停止貿易，造成許多工人失業，工人生活艱難困苦，紙票跌價，日常需用品漸形減少的現象。一些小資產階級，處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於是便動搖起來，上層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則開始高唱工農運動過火，成爲準備變節的藉口。

當時羣衆運動中部分的『左』傾幼稚病是存在的。帝國主義者以及反革命派一方面恐怖革命的真正深入與革命動員的廣大，另一方面却要找尋『左』傾幼稚病，誇大左傾幼稚病，利用左傾幼稚病，並故意冒牌做出種種左傾幼稚病的事實，嫁罪於革命黨人，製造各種荒唐無恥的謠言（如所謂武漢『婦女裸體遊行』），加誣革命黨人，爲的要挑撥革命陣線中的互相猜忌，埋怨，惡感和分裂，並破壞國民對於革命的同情和信仰。不幸的，武漢上層小資產階級者的代表，居然也藉此作爲變節的護身符了。

在這種困難的情形下，夏斗寅反革命的進攻開始了。夏斗寅（獨立十四師師長）部本是當時武漢政府用以防止四川軍閥部隊侵入武漢的部隊，但至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却乘武漢革命軍入豫之際，接受反革命派指示，率部叛變武漢政府，聯合劉佐龍部（十五軍）與四川軍楊森（二十軍）向武漢國民政府進攻，企圖推翻武漢國民政府。結果反革命的企圖沒有實現。經過武漢國民政府和共產黨動員一切力量去反對夏斗寅的進攻，經過葉挺部的英勇戰鬥，至六月初旬

終將夏斗寅部擊退，武漢國民政府才轉危爲安。

這一情形說明當時武漢政府是處於一個緊急的關頭，一面是內部與外部的敵人積極向革命進攻，一面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已經在極端的動搖中。顯然，在這緊急關頭的前面，武漢政府和國民黨只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廣大地發展農民革命，確定改善工人的地位，繼續開展廣泛深入的羣衆運動，廣泛的武裝工農羣衆，首先武裝那已經有組織的覺悟的部分，使工農羣衆成爲武漢國民政府真正的柱石；同時大大發展國民黨的組織，驅逐國民黨中的反革命分裂分子，使國民黨掌握在真正革命派手裏，使國民黨成爲廣大的羣衆組織，成爲真正平民的政黨；澈底改革政府，把一切無望的分子驅逐出武漢國民政府，造成真正可靠的武力，改編舊有的軍隊，把國民政府放在選舉制的基礎上，成爲强有力的民族革命的政府，使革命政府與民衆間親密聯合起來；『不擴大羣衆運動，沒有農民革命，不堅決改善工人階級地位，不變國民黨成爲勞動羣衆的真正偉大的組織，不繼續加強職工會，擴大共產黨，不造成武漢政府與羣衆間之最密切的聯合，則勝利的完成革命是不可能的』。（國際）這是一條革命的道路。另外一條道路，那就是在困難面前，繼續動搖，繼續懼怕與遏止工農運動的發展，反對土地革命，屈服於民族資產者，跟隨它變節，向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妥協。這是一條反革命的道路。

三 武漢上層分子從動搖走向變節

在武漢的困難緊急情形之下，武漢政府上層的領導分子

(上層小資產階級代表)及其他還留在武漢內部的軍閥、豪紳、地主的代表和一部分資產階級的代表，便從動搖走向變節，領導着武漢政府向那與革命相反的道路走。本來，這些上層分子有的就是反革命派在武漢國民政府中的奸細，反革革派經過他們來動搖武漢的革命勢力。在南京與武漢、武漢與北方的鬥爭中，帝國主義、豪紳、地主、資產者盡量運用威嚇利誘方法來動搖武漢政府中的上層分子，帝國主義用炮艦政策，用經濟封鎖來威嚇武漢政府，另外更用種種辦法來收買留在武漢政府中的軍閥，推動他們起來反對革命，同時兩湖工農革命鬥爭的發展與深入，又直接威脅到這些反革命派的階級利益。

這種動搖與變節的開始，繼夏斗寅的進攻而來的，便是馬日(五月二十一日)事變。事變前一日，一部分反革命部隊已將益陽縣工會、農民協會佔據，解除農民自衛軍與工人糾察隊的武裝。二十一日許克祥任長沙圍攻省工會、省農民協會及一切革命組織，捕殺共產黨員及革命的工農羣衆在百人以上，所用的手段極其野蠻而殘酷。

接着五月二十九日唐生智發出豔電，謂『湘省黨務悉爲跨黨暴徒及本黨不良分子操縱，……三湘七澤已成羣魔亂舞之場，城市鄉村盡陷雞犬不寧之際。』無疑的，這只是一種反對革命的藉口。

馬日事變和唐生智的態度，使動搖者更陷於動搖，而陳獨秀機會主義者的手腳忙亂，可恥的制止對於反革命的抵抗，任令革命分子受反革命的野蠻殺戮，更幫助了上層小資產階級分子的由動搖走向變節。

武漢上層分子從動搖到變節的明顯表現，便是所謂發現第三國際「破壞」國民黨之決議案（由羅易交與汪精衛看）。所謂陰謀，就是：第一，實行土地革命，從下而上從上而下的來沒收與分配土地；第二，消滅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加上從兩湖挑選的五萬工農分子，組織新軍隊；第三，改造國民黨，使國民黨成為羣衆的組織。如果當時第三國際真的有這樣主張，也不過是完全為着革命的利益；為着革命的需要，為着國民黨的鞏固與發展，這是青天白日堂堂正正的希望和主張，並非所謂陰謀。可是已經決心叛變革命的人却以此為口實，來遂行其反革命的企圖。於是六月五日武漢政治會議議決解除鮑羅廷之顧問合同。武漢政府的走向不幸道路已經是非常明顯的了。

在北方，為反革命所動搖的西北軍領袖，自負着寧漢的調解。六月十日馮玉祥發起召集鄭州會議，武漢方面之汪精衛、孫科、唐生智、張發奎、譚延闓等均到會。會議結果是：第一，唐生智部全部由河南回師武漢，鎮壓工農革命運動；第二，河南的軍事，完全由西北軍擔任。可是當時陳獨秀機會主義者對於這會議尚在夢中，還舉行過盛大的會議去歡迎反革命的陰謀者。

鄭州會議後，六月十九日南京要人與馮玉祥又舉行鄭州會議。會後，馮玉祥致電武漢國民黨領袖，推動他們走上不幸的道路。

六月二十九日何健（三十五軍軍長）發出反共訓令。明令部隊與共產黨分離，拘捕與慘殺共產黨員。七月十五日武漢政府舉行分共會議，正式決定與共產黨分裂，而中國共產

黨亦發出宣言，撤回參加國民政府之共產黨員並痛斥反革命之罪惡。七月十五日分共會議後，武漢上層分子公開封閉工農組織，壓迫羣衆運動，逮捕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大規模殺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他們甚至提出口號：『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武漢當時的慘殺，並不亞於上海『四一二』的慘殺。革命的武漢便成爲反革命的畏縮地了。

『四一二』苦迭捷後中國革命受到部分的失敗，武漢苦迭捷後中國革命遭受到嚴重的失敗。曾經參加民族革命戰線的資產者以及上層小資產階級代表分子都投到和革命相反的方面去了，剩下的只有工人、農民、城市貧民的革命力量，繼續爲完成中國革命而鬥爭。

四 南昌起義

七一五後，工人、農民、城市貧民還是繼續革命，企圖挽救革命的失敗。七月三十一日武漢上層分子公開屠殺黃包車夫，漢口工人遂於八月三日宣佈同盟罷工反抗這種反革命的殺戮。在農村中農民革命鬥爭還繼續的深入。在南昌方面有了歷史上著名的八一起義。南昌起義是以武裝力量反對革命變節者的屠戮，保持革命勝利和挽救革命失敗的嘗試。八月一日國民革命軍葉賀軍（賀龍之獨立十五師，葉挺之十一軍二十四師，共約兩萬餘人）在南昌起義，成立革命委員會，以宋慶齡、周恩來、譚平山、張國燾、李立三、鄧代英、賀龍、朱德、吳玉章、郭沫若、鄧演達等二十五人爲委員。八月五日葉賀軍退出南昌向廣東進發，經撫州、宜黃、廣昌至石城、瑞金，在五田市擊潰饒大鈞部，退出至會昌，又與黃紹

雄部激戰一晝夜，卒將黃紹雄部擊潰，旋即折回福建長汀；經上杭、武平、三河壩，直下潮汕，九月十三日，賀葉軍遂佔領潮汕。賀葉軍佔領潮汕後於湯坑、潮州、三河壩等處與贛東黃紹雄、徐景堂、錢大鈞等都激戰數日，終於失敗。失敗後的隊伍一部分衝至海陸豐與當地農軍配合，一部分以朱德為領導，由三河壩退至福建，至尋鄒入北江，這部分隊伍更是以原紅軍第四軍的基礎，也就是一軍團的骨幹。南昌起義失敗的原因，在客觀上是敵人的力量過於強大，在主觀上是指導者還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第一，是沒有明顯的政綱；第二，對於發動農民革命不堅決；第三，起義後，曾得到許多武器，沒有把這些武器適當地武裝民衆，退出南昌時，有許多是白丟掉了；第四，沒有自下而上地在民衆各種組織的基礎上，發動羣衆的選舉制，建立起真正平民的政權；第五，當時廣州是各方爭執的中心（當時南方各派系均欲奪廣東為己有），因此，也成為革命所可進攻的弱點，賀葉進軍是應向廣州進發，並應聯合張發奎第四軍部隊中的中下級急進革命分子，但結果葉賀進軍却是向了潮汕，這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是錯誤的。然而南昌起義是企圖以武裝鬥爭反對反革命的苦迭捷，挽回革命的勝利繼續推動革命前進的嘗試，這一行動是對的，而且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光榮的一頁。

五 武漢時期的中國共產黨

武漢時期中國共產黨是處於負責的緊急的關頭，當時中國共產黨擔任着中國革命緊急關頭的艱巨任務，中國共產黨路線的正確與否，關係着整個中國革命，對於當時形勢有着

決定的作用。中共黨人，中共無數的中下級幹部，在大革命中繼續發揮自己對於革命的勇敢與犧牲的精神，為革命冒萬死而不辭，繼續團結千百萬羣衆於革命的周圍，做了正確的工作，如果中共中央當時能夠堅決執行布爾塞維克主義路線和國際的指示，中國革命當可戰勝部分的失敗，戰勝革命武漢的困難，戰勝動搖者，推動革命繼續前進，至低限度亦能使中國革命免除遭受最嚴重的失敗而減輕中國革命失敗的程度。然而就在這負責與緊急關頭前面，中國共產黨中央因陳獨秀的領導犯了最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這種嚴重錯誤是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

在這緊急關頭面前，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在武漢舉行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到會代表約百人左右，開會時間繼續了半月之久，這次大會，是在完全公開環境中舉行的。武漢國民黨領袖汪精衛、譚延闓、徐謙等均以來賓資格參加開幕典禮，並向大會致辭祝賀，以代表國共兩黨親密的合作。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任務是在於總結過去工作的經驗，指出中國革命今後發展的前途與確定黨在最近時期內的任務。經過討論之後，大會指出，在這一時期以內，黨的領導機關，因誤解民族統一戰綫之故，犯了不少錯誤，對於民族資產者在革命中的態度，有了偏向的見解，在北伐時期，黨『並未充分注意到，在革命領土擴大時，必須加強革命底社會基礎』（『第五次代表大會決議』），所以也就不能鞏固工農的聯盟以及鞏固工人階級在工農聯盟中的領導作用。大會駁斥了陳獨秀機會主義的理論，大會關於中央報告

所通過的決議，大部分是與國際立場相等的。

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所討論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提綱。大會完全和一致接受了這一提綱。大會議事日程上的第三個問題，就是土地問題。大會對於這個重要的問題，却並未給以明確的徹底的解決。後來不久，根據國際的指示，中國共產黨修改了這一個決議，更加徹底的走上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立場。

陳獨秀是中共發起人之一，而且在這次大會上又表示贊成大會關於斥責他的機會主義錯誤的決議，於是大會又繼續選舉他擔任最負責的工作。五次大會前及在大會上，瞿秋白等曾在理論上進行過反對彭述之和陳獨秀等右傾機會主義政策底鬥爭。但一般地說，這種鬥爭未能充分的進行，而且只限於黨的上層範圍以內，以致不能引起全體同志和廣大羣衆的注意和參加，因此也就不能有系統地深刻而廣泛地及時的真正的給陳獨秀彭述之等機會主義錯誤以致命的打擊。在後來事變發展過程中，由陳獨秀獨攬之黨的實際領導，不但沒有在實際上糾正了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而且還把機會主義發揮到登峯造極，結果使中國革命遭到極可痛心和可恥的挫敗。

陳獨秀機會主義路線在事實上的主要表現，可以綜合如下：

第一，陳獨秀的機會主義，主要地在政權與軍隊的問題上表現出來。列寧說：「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而政權最重要的工具便是武裝。這些始終是陳獨秀所完全不了解的。陳獨秀始終未夢想到革命中這個根本問題。武漢政

府時代，國際反對託洛茨基主義者提出蘇維埃，因為當時武漢國民政府是革命政府，當時提出這口號，就是推翻武漢革命政府，拒絕擁護武漢政府，是直接幫助反革命。但國際同時指出：要『用國民黨收容廣大民衆，使羣衆選舉國民黨的指導機關，經過這些在選舉制的基礎上建設的組織，成立民族革命的政府——這是勞動羣衆和革命的國家政權間聯合的特殊形式，此形式適合中國革命的目前階段。因為武漢政府統治下各省狀況之不同，則地方政權的組織，在最初時期必然採取種種色色的形式（在鄉村間「農民委員會」，「農民協會」政權，以及國民黨委員會政權等等）。共產黨人組織地方政權時的主要任務，便是領導廣大勞動羣衆，領導千百萬工農羣衆參加組織，組織成後，參加工作。』毫無疑問的，只有這樣做，才能強化武漢國民政府，去戰勝一切困難和動搖，而革命的國民黨政權，本來就應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可是陳獨秀不但在『四一二』以前，不關心這問題，即在『四一二』以後，也完全拒絕了革命實際的苦痛教訓，不敢實際去處理這個問題。中國共產黨決定參加國民政府工作，為的是要加強國民政府革命的權力，自上而下地推動革命的發展，猛烈反抗各種反革命的陰謀，主張勞動者與農民的利益（這種利益在我國與民族利益在實質上互相符合），但當時在陳獨秀領導下，像後來中共『八七告同志書』所指出的：

『共產黨員在得到委令後兩月，才開始組織自己的部務。農政部長譚平山（共產黨員）就職典禮時的演說，除批評他是可恥的外，沒有別的話說。他對於土地革命沒收土地，消滅土豪劣紳地主階級在農村中的政權，都默默無言，他却

說了一些自由主義的「改良農民的狀況」、反對「過火」的話。譚平山就職後馬上就發表對農民的訓令，禁止農民反對豪紳的「妄動」，違反則「嚴罰」。

「農政部及勞工部與其他的官僚機關並沒有什麼區別。在此數月內他們沒有公佈一個減輕工農痛苦狀況的法律，沒有一個改變城市與鄉村中剝削的法律及改良經濟關係的法案（勞動法案，減租，農村自治法等）。有些並沒有預備向政府提出，這些部長的共產黨員工作，照國際的議決案是聚集自己的力量來與羣衆聯繫，來維持羣衆運動，但實際上則成了最腐爛的資產階級官僚統治，只是在羣衆面前消去共產黨的面貌；我們沒有一個革命的建議，對於武漢政府包庇反革命之種種錯誤，也沒有一點批評，特別是農政部長的政策，除了說他是反對農民的政策，孟塞維克的政策，簡直沒有別的適合名稱。土地問題應是農政部頂主要的問題，但是完全被他忘却，甚至農政部發到各省的調查表，竟無一關於土地關係問題。譚平山上任第一件事實，就要打算「鎮壓」湖南農民運動；中央對此是贊成的，並且還要他到湖南去做出征的領袖，實行恢復「秩序」的任務；這一次出征已經成行，但走到了目的地，而長沙已發生反革命的叛變，……。」

「當譚平山結束他那不光榮的總長之地位時，還是藉口長期請假的退出」，去迎合反革命者和準備變節者的希望，而且，「請了長假還不够，還要說：「因政局困難，不能納農運於正軌」；共產黨部長在最負責任的時期中，由戰場上脫逃還不够，而且重新要向農民進攻一次。每開部座常開一門，從這幾句話裏得到的什麼結論？即：一，農民運動走上

不正的道路；二，只有武力能糾正他，因為共產黨員的部長有了共產黨與羣衆組織的完全威權，尙還不能「納入正軌」呢！這是直接承認許克祥之在湖南，夏斗寅之在湖北的動作是對的，這簡直是直接號召反革命們的代表進攻革命。共產黨員的部長在政府內做了這些玩意，還不是共產黨的最大恥辱嗎？但是中央對於譚平山的聲明，不僅沒有處罰，並且沒有發表一句話。本來中央亦無從反對起，因為這是他自己的政策。」（八七告同志書）

在武裝問題上，陳獨秀機會主義者更做了極不可寬恕的錯誤，自三廿事件後，陳獨秀一直不願並且實行阻止在軍隊中去加強革命的幹部和力量，結果是削弱了許多革命軍隊的戰鬥力，削弱了軍隊的革命化，陳獨秀機會主義者只注意了上層的外交，而完全忽視爲了中國革命，對於當時隸屬個人的隱備軍隊，有加強革命力量的必要，有改造的必要。武漢時候，國際曾指出過：『改編軍隊的問題，編制絕對委身革命的隊伍，軍隊與工農組織的聯絡，建立軍隊中幹部，改編傭兵爲革命之常備軍，在目前特別需要。』國際接着又指出：應把武漢革命的勞動者與農夫編成絕對可靠的隊伍，在軍隊內建立忠心不拔的革命影響和幹部。這些都被陳獨秀束之高閣。不但如此，陳獨秀在最緊急的關頭，不僅不想依靠革命的武裝，擴大革命的武裝，去軟化動搖者，去軟化那對於革命準備變節的人，去準備對於不幸事件的抵抗，而且自動地把武漢革命的支柱之一的勞動者武裝——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繳械，以適合反革命者和變節者順利地屠殺革命叛賣革命的願望，幫助了反革命陰謀的實現。

第二，陳獨秀機會主義具體的表現，便是在於把國民革命與工農利益機械地分裂出來。歷史上證明：工農是中國國民革命最主要的力量，中國國民革命沒有廣大工農羣衆的參加，則反帝勝利是不可能的，這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上及政綱上，都是明白承認了的。但陳獨秀機會主義者却昧於這最粗淺的道理，爲着適合資產者的願望，總以牽制工農革命運動爲能事。機會主義者不願盡力去要求增進勞動者羣衆的物質生活，不願堅決的要求改良工廠生活，提高勞動者的社會生活，確立勞動者一切的民權權利。在下層羣衆中，曾不免有一些過左的現象，但是要糾正過左的現象，不是要追隨動搖者的尾巴空叫『過火』，而是要有堅決的政策，而當時中共中央却沒有一種堅決的政策。『中央有些文件之中堅決說「過火」怎樣不好，中央竭力的解給工人聽，說不應佔領工廠，即使工廠主的故意閉廠，也不應當：說不可以封店，及使店東故意抬高物價，也不可以。』（八七告同志書）但却不設法究竟如何對付反革命者的任意破壞經濟生活，如何在經濟生活上，組織革命的秩序，來制止枉法不軌的投機反革命分子，或則對於那怠工和故意關門的工廠，在某種程度上採取工人監督生產的政策。中共中央『又說不該自由逮捕』，但却不知道應該進行何種方式去組織革命法庭，以對付反革命的混蛋惡棍，來維持革命的秩序。機會主義者事實上不能糾正『過火』的現象，而是嚮口『過火』來麻痺革命，並且正因爲他們沒有堅決的革命政策，正更幫助了下來一些自發『過火』的現象。

在農民運動中，機會主義者也除了空喊『過火』以外，

不能有所作為，如果有所作為，那就在阻止革命對於反革命的抵抗，助長反革命的威風。馬日事變時，許克祥慘無人道地屠殺革命分子和工農，當時『因湖南共產黨員的建議徵調農軍，進攻長沙的反革命，如果農民的武裝進攻不受黨的指導機關的懦弱之猶豫的阻滯，那末，一個長沙城被十萬農軍所包圍，並不是不容易打下來的。最後的幾分鐘，正當進攻長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的委員湖南黨部的指導者下了一個命令，取消進攻長沙的計劃，說武裝進攻長沙可以引起整個政局之糾紛，應當等一等中央的訓命；隔了一天，中央的信到了，也說應當等一等進攻，先團結些力量，等國民政府來解決。停止進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農軍，大多數農軍因此而退却，只有兩大隊偶然沒有接到命令，居然衝城攻打反革命派，經過堅決的奮鬥，方始因為衆寡不敵而退却。這一總敗退的結果就使反革命大奏凱歌，後來弄到幾日全省的大反動。中央在農民暴動的關頭，表現這樣沒有鬥爭的決心，簡直等於出賣革命，這是無論如何不能辯護的，的確是我們黨歷史上的一個污點。』（八七告同志書）

機會主義者始終不了解：對於土地問題的解決，可以進一步地激發絕大多數的人民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可以造成極大量極堅強的民族革命軍。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雖則不可以混為一談，但却是互相關聯的，而且在某種具體的歷史條件和環境中（如在當時的武漢），為着推動民族革命洪流的開展，還應不怕把土地革命放在民族解放運動政綱上的主位。在當時土地革命運動中，下層會有些自發的『過火』行為，而且有些反革命奸細及土豪劣紳，故意製造過火現象，以破

壞國民革命軍人及農民之間的感情。當然，如果不懂得善於運用革命的政策，無條件的同時向各方作戰，這是愚笨的辦法。事實上，爲着打擊和孤立農村中主要的敵人——大地主，革命對於革命軍人、小資產階級、小地主的土地政策，是應該靈活，應該做必要的讓步，應該警戒過火的行爲，但機會主義者的問題却不是爲着警戒這種過火的行爲，以求農民土地問題的解決，而是藉口反對這種『過火行爲』，以反對土地革命。

正是因爲機會主義者分裂國民革命與工農利益，所以他們始終沒有認真想到武裝工農的問題，沒有想着武裝工農的必要，沒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農軍隊。革命的軍事組織對此完全沒有工作，沒有提及一般革命黨員的軍事訓練——這實是無產階級政黨第一等重要的責任，沒有提及有系統的集聚那零碎散亂的工農武裝隊，使後者一有組織的堅固力量時，便做發展革命的真實的擁護者；沒有想盡方法去得武器以武裝工農。機會主義者那時認爲武裝工農難以實現的，甚至於以爲是有害於與國民黨軍隊領袖聯合的，經過如此之久的時候，機會主義者忽然『積極』起來，不過恰好是相反的積極，決定叫漢口工人糾察隊，『爲避免挑撥離間的衝突起見』，自動的解除武裝，造成革命史上最可恥的一頁。

第三，陳獨秀機會主義具體的表現，便是對於同盟者的關係。陳獨秀機會主義者對於同盟者的關係，不是爭取他們到革命方面來，不是批評他們在具體問題上或緊急關頭的動搖，不是準備防範同盟者走上不幸的道路，準備孤立變節者，而是隨同盟者的尾巴，機會主義者沒有獨立的政策，而

是根據同盟者的喜怒為轉移。國際決議上說：

「中國共產黨的先鋒，保有自己獨政治面貌，與最左的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的政治面貌要有區別。

「共產黨在任何環境中，不能與其他任何政治組織相混同，它應有獨立的力量；它是一國之內的特別階級，即無產階級最澈底最革命的階級組織。因此，共產黨對於宣傳自己的觀點，在自己旗幟之下動員羣衆的工作，決不能自己束縛起來；它不應該放棄批評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之民權派的動搖不定的權利，只有這種批評，才能推動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左傾，並鞏固工人階級在革命鬥爭中之領導權。」但陳獨秀所執行的恰是相反。陳獨秀完全忘記了列寧對於世界無產階級的名訓：要幫助動搖者，首先要自己不動搖。陳獨秀機會主義者相反地，去幫助動搖者更加動搖起來，幫助他們走上叛變。陳獨秀機會主義者對於國民黨，不想幫助它去擴大和延長其革命的生命，幫助國民黨變成真正平民的政黨，而却是隨波逐流，幫助一切腐化分子、動搖分子、變節分子，去支配國民黨，腐化國民黨，冒牌國民黨而作惡為非。

陳獨秀機會主義的實質，不是別的，而正是資產者代理人在無產者營壘內散佈的政治影響。這種資產者代理人企圖在共產黨內，腐化共產黨，限制中國革命的發展，模糊無產者的政治面目，斷送中國革命。

在國際上，機會主義者用另一種方式與陳獨秀機會主義為表裏的呼應的，是託洛茨基派。託派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認為是反海關的革命。託洛茨基認為「中國民族革命的根本原因是在於中國海關為帝國主義者所操縱，因此以為中

國現在革命主要是一個所謂反海關的革命。』(斯大林)『這個觀點，正是張作霖陛下顧問們的觀點，如果託洛茨基觀點是正確的，那末，要承認張作霖和×××也是對的，因為他們一樣不願意土地革命，又不願意工人革命……。』託洛茨基、拉狄克等否認中國有封建殘餘存在，或以爲這些封建殘餘沒有多大的意義。斯大林當時尖刻地這樣提出問題：『若以爲中國革命的基本原因是在海關不獨立，而不在於與封建殘餘及其擁護者——帝國主義作鬥爭，那末，中國現時的土地革命還有什麼內容？土地革命及其沒收和國有地主土地等要求自何而來？既然這樣，則認爲中國革命爲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還有什麼根據？難道土地革命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不是一件千真萬確的事實嗎？難道土地革命，可從天上落下嗎？像湖南、湖北、河南等省，數千百萬農民羣衆已轉入偉大的土地革命，成立自己的政權，自己的法庭，自己的自衛力量，驅逐地主，據平民辦法來對付他們——難道這不是事實麼？若說封建軍閥壓迫不是中國壓迫力量的主要形式，那末，這樣雄壯洶湧的農民運動自何而來？如若不承認帝國主義是壓迫中國農民的封建軍閥主要的同盟者，那末，數千百萬雄壯洶湧的農民運動可怎樣同時能帶着反帝國主義的性質？僅在湖南一省，現在農會會員數目已達二百五十餘萬——難道這不是事實嗎？而同時，湖北、河南現在農會會員數目又有多少，最近將來在其他各省，又將達到多少，「紅槍會」，「大刀會」等等——難道這些都是空想，而非實際，難道可以認真說，數千百萬農民提出沒收地主土地的口號，起來幹土地革命，不是反對真正不用懷疑的封建殘餘，

而是反對可放在括弧內的想像的封建殘餘嗎？託洛茨基已走上張作霖「陛下」僚佐們的觀點，難道還不明顯嗎？」

託洛茨基、拉狄克等的否認中國土地革命，與陳獨秀的反對土地革命，正是異曲而同工的。

託派當時又要求當時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當時託派「認為退出國民黨是很合宜的，但是在現在當一切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竭力要求把共產黨員趕出國民黨的時候，他們却要求退出國民黨，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要放棄自己的戰壘，拋棄自己在國民黨內的全盟者，以取得革命敵人的歡心。這就是：削弱共產黨，破壞革命的國民黨，幫助上海的加雅科派……」（斯大林）託洛茨基的主張與當時陳獨秀對於國民黨的態度（即上述的幫助一切腐化、動搖的、變節的分子去支配國民黨，腐化國民黨，冒牌國民黨，而作惡為非），也恰是殊途而同歸的。

託派當時要求立刻在中國組織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當時「組織蘇維埃，這是什麼意思呢？第一，不能在任何的時候組織蘇維埃。組織蘇維埃只是在革命浪潮特別高漲的時候。第二，組織蘇維埃並不是一場空話，它成立首先就是反對現存政權的機關，是為奪取政權而鬥爭的機關。一九〇五年是這樣。一九一七年是這樣，現在在武漢政府區域內組織蘇維埃，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提出反對在這些區域內現存政權的口號，這就是說，提出組織新的政權機關反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的口號，因為現在這些區域內，除了革命的國民黨政權而外，沒有其他的政權，這就是說，把成立和鞏固現在革命的國民黨所依靠的工農羣衆組織例如罷工委員會，

農民協會、農民委員會、職工總會、工廠委員會等等的任務，混淆起來了。這就是說，他們不懂得中國革命目前所處的階段。這就是說，給中國民衆的敵人新的武器來反對革命，來散佈謠言，說中國並不是在進行民族革命，而是要把「莫斯科蘇維埃化」機械的搬到中國去。」（斯大林）在實際上，託派正是用偽「左」的面貌，來幫助革命敵人，託派不願意去處理當時具體的革命政權問題，以推動革命前進，而却是在當時就要造成兩種政權，破壞共產黨與革命的國民黨之合作，推翻武漢革命的國民政府，這與陳獨秀的反對強化武漢國民政府的革命基礎，把國民政府交給動搖分子，腐化分子，也正是殊途而同歸的。

後來託洛茨基主義與陳獨秀主義的合流，在歷史上並不是可怪的，因為本來就是「同氣連枝」的啊。

中國大革命中，中共中央之所以被陳獨秀機會主義所影響，所支配，最後形成了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還由於當時中國共產黨鬥爭經驗的異常缺乏。當時中國共產黨還是極其幼稚極其年輕的黨，還沒有經過大革命風暴的激盪，還沒有領導過大革命鬥爭，因而在大革命複雜的情況下便不能夠以列寧主義的策略去正確解決各個問題，去領導中國大革命。

武漢上層分子變節後，中國共產黨改變了機會主義的領導，中國共產黨於八月七日召集了中央委員會的緊急會議，這一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轉變的關鍵。在這一會議上嚴厲的批評了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央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指出中央過去執行的路線在客觀上等於叛變革命的行動，粉碎了國民革命戰綫中機會主義的錯誤，改造了黨的領導機關。八

七會議並發表告同志書，揭發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指出以鐵黨的總路線，確定了土地革命的中心口號。但八七會議仍有其缺點，八七會議還不能圓滿地展開在兩個戰線上的鬥爭，所以，對於一些政策問題，還不能恰當地處理，而這却是和後來盲動主義傾向的發展有關係的。

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又召集了十一月的擴大會議，在會議中更明確的確定了土地問題的策略，提出蘇維埃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並指出準備好的聯絡好的武裝起義的必要。但十一月的擴大會議還存在着對革命形勢和革命性質之估計的『左』傾錯誤，錯認中國革命性質為『不斷革命』。後來國際對此曾有嚴正的指摘，認為這種想跳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張，其錯誤與託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的錯誤相類似，抹煞了中國革命最大的特性——半殖民地的革命。中共六大大會也指摘說：『十一月擴大會議在決議案上，對於中國革命的估量，不正確的採用了「無間斷的革命」的名詞，於是解釋革命為不斷的高漲之可能，就可以發生由此而得到不正確的策略。同時對於布爾塞維克的起義政策的觀念，很是模糊的，於是有不正確的估量和策略，及過於忽視敵人力量的觀念——這些可以成為盲動傾向的根據。因此，沒有嚴厲的防止黨內已經發現的盲動主義的傾向（這種極左的傾向正是很有害的）。』

四 廣州起義與中國革命新旗幟

一 武漢變節後中國階級力量的新結合

南昌起義的失敗結束了中國革命第二個時期——左派國民黨時期。而廣州起義則成了大革命的退兵之一戰。武漢變節後，中國階級力量又重新結合，資產者自『四·二』後，就一步一步地完全投進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懷抱裏去，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結成反對革命的聯盟。一部分上層小資產者在武漢變節，也走到反對革命的營壘中去了。所以在武漢變節後，在帝國主義的指揮下，封建勢力、買辦階級、資產者和一部分上層小資產者重新結合，築成一道反對革命的障棧；同時，這些反對革命的營壘內部却仍然存在着劇烈的衝突。寧漢合作後，不斷的發生彼此間頑強的爭執，並且這種爭執，一直發展到爆發戰爭，首先是寧漢戰爭與粵桂戰爭。

國共分裂後，由於反革命的進攻，廣大羣衆在大革命時代所獲得的利益都喪失了。一切民主權利取消了，苛捐雜稅恢復與增加了，資本家重新向工人進攻，地主又回頭來鎮壓農民了，工會、農會及一切革命組織遭受封閉解散，革命的羣衆和領袖與共產黨員繼續遭受到最殘酷的虐殺，革命是受到了嚴重的失敗。

可是，當時廣大的工人農民却不斷地以武裝起義的方法來回答反革命的進攻，以武裝鬥爭的形式來反對革命的叛變者。企圖經過這種鬥爭來保持革命已得利益，挽回革命不利的

形勢，推動革命繼續前進。因而開始了湖南湖北的秋收起義與廣東海陸豐的農民起義。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海陸豐的農軍於十月三十日十一月一日佔領海陸豐。在起義勝利後，即沒收與分配地主階級土地，建立蘇維埃政府。這是中國建立蘇維埃的最早的開始。湖南萍鄉安源的農軍，於九月間佔領了湘省所有的重要縣份——平江、瀏陽、萍鄉、醴陵、株州。在湖北則有鄂南、蒲圻、咸寧、嘉魚、通城、通山、崇陽等地武裝農民騷動，並截斷武長路交通至半月之久。但兩湖的秋收起義大半還是失敗了。『秋收起義在許多地方擴大了黨在農民羣衆之中的影響，將土地革命的口號滲入了廣泛的農民羣衆的意識之中，後來繼續發展的農民鬥爭，以至於許多蘇維埃區域的創立，大致亦由秋收起義的影響。但是秋收起義政策的機械的應用，就是發生有些地方玩弄起義和軍事冒險的行動』（中共六次大會決議）。其次在上海武漢南京也不斷的發生工人的罷工運動，可是這些鬥爭大都遭受到打擊。大體說來，當時已表現了革命潮流向下低落的趨向。在這種革命潮流向下低落的趨向中，廣州的無產階級又英勇的以革命的武裝起義，企圖來推動革命車輪的前進。

二 廣州起義的前夜

在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失敗過程中，中國無產階級曾給反革命以最有力的回答，刷洗了機會主義者所給中國革命和無產階級的恥辱，這便是廣州無產階級的武裝起義。這一起義結束了中國的大革命，成爲革命形勢低落過程中『退兵的一戰』，同時展開了中國革命新的旗幟——中國

蘇維埃的願望。

隨着上海「四一二」的苦迭捷，「四一五」後，廣東革命黨人和工農羣衆即不斷橫遭殺戮，武漢變節後，張發奎軍隊回師廣東，十一月十七日以「護黨運動」的名義推翻了李濟陳黃紹雄的統治，發生了粵桂戰爭，這一戰爭的爆發，造成廣州混亂的局面，大部分軍隊調至前線作戰，廣州市內軍隊日益減少。同時羣衆在新政客軍人的統治下，仍受到了極大的壓迫剝削，他們封閉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取消了省港罷工工人的權利，壓迫罷工工人出公共宿舍，逮捕及槍殺罷工工人，並令反對革命的「改組委員」佔領工會會所，更用一切方法剝削民衆，因此廣大羣衆表示極大的憤恨。當局所派的「改組委員」到處爲工人所驅逐，工人自己選舉工會的委員。十月十四日爆發海員罷工。這一罷工引起各業工人的援助，並舉行二萬工人的大示威運動，廣大工人不顧警察的壓迫和拘捕，在羣衆大會上，公開的擁護自己的革命工會和共產黨，抗議反革命分子把本來青天白日的革命旗幟，用爲屠殺革命分子的恐怖旗幟。接着有印刷工人的罷工，這一罷工雖受到白色恐怖的壓迫，但並不能消滅工人的罷工運動，並且更引起工人階級的憤恨。十一月初，工人羣衆開始反對白色恐怖的示威。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紀念日舉行了廣大的羣衆紀念大會。至十二月初，羣衆鬥爭更加高漲，海員、郵局、印刷、汽車等工人都起來鬥爭。工人羣衆堅決要求武裝起義，並且自動的武裝起來準備起義。

農民方面，自四一五後，曾發生過幾次的起義。饒樂軍至廣東時，農民舉行秋收抗租的起義。十月以後，各縣農民

改重新起義，特別是如上面已敘述過的，海陸豐的農民起義得到偉大的勝利而且組織了蘇維埃政權。接着在東江許多縣份中也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十一月七日在海陸豐舉行蘇維埃大會，並派人向廣州工人羣衆請求援助，其餘在北江瓊崖等地也發生農民的起義。

士兵羣衆方面，同樣動搖得非常厲害，表現對軍閥統治不滿，而同情於革命，並組織士兵委員會，要求改良士兵生活。特別是大革命時代第四軍的士兵，因為大革命的影響和革命的傳統比較深入，更同情工人的鬥爭。十二月初，在許多士兵的秘密會議上，整連整營的士兵都擁護中共的主張，要求起義。

三 廣州起義的經過與失敗

在廣大羣衆熱烈要求起義的態勢下，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遂在張太雷領導下，討論了起義的問題，並決定舉行武裝起義，進行下面的準備工作：（一）確定起義的總政綱；（二）起義的軍事上的準備；（三）廣州蘇維埃之組織；（四）經過赤色工會動員工人羣衆；（五）士兵中急進的工作；（六）農民中的準備與聯絡。至十一月二十六日，廣東省委公開號召羣衆起義，並提出下面的政綱與口號：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反革命，打倒一切軍閥，立刻釋放一切政治犯，工農武裝起來，勞動民衆之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絕對自由，一切工會會所歸還工人，肅清一切工賊走狗，立刻恢復省港罷工工人權利，照原薪津貼失業工人，增加一切工人的工資，工人監督生產，沒收反革命者的房屋給勞動民衆住，

撥出大資產者的財產救濟貧民，土地歸農民，消滅土豪劣紳地主，改良士兵生活，增加兵餉至二十元大洋，組織革命兵士委員會，反對軍閥戰爭，兵士委員會監督軍費的開支，制裁一切白色恐怖的劊子手，工農兵聯合萬歲，工農兵代表會議政權萬歲，中國民衆和蘇聯聯合萬歲，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同時並明確的提出幾個最主要的口號：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飯給工人吃，土地給農民耕，一切政權歸工農兵蘇維埃。這些口號得到了廣大羣衆的擁護。

在軍事上的準備，則組織了革命軍事委員會爲起義總指導機關，組織二千工人赤衛隊，兩連敢死隊。在廣州駐軍中，教導團大部分是在共產黨的影響下，警衛團的士兵大多數也同情革命。在準備起義過程中，共產黨的口號，在兵士的會議中得到了熱烈擁護。其次，並由工人、農民、士兵選舉了蘇維埃的代表。

至十二月初，廣州形勢更形混亂，東西北江南路都捲入軍閥戰爭的漩渦，廣州駐軍異常空虛。在羣衆的熱烈要求下，共產黨廣東省委乃正式決定於十二月十一日舉行起義。

十二月十一日早，武裝起義開始了。首先解決教導團的反革命官長，繼而教導團士兵與工人赤衛隊分頭向各機關及其他隊伍襲擊，將砲兵團警衛團及其他反對者的隊伍完全繳械，佔領了政治分會、財政廳、電報局、電話局、製彈廠及其他各機關。在起義中，工人階級異常堅決勇敢與反對者作戰，自動前來領槍作戰者約五六萬人。起義開始後，即建立了廣州蘇維埃政權，以蘇兆徵爲主席，各部的組織爲：勞動

——周文雍，土地——澎湃，海陸軍——張太雷，肅反——楊殷，經濟——何來，司法——陳郁，秘書長——惲代英，總司令——葉挺，總參謀長——徐光英。起義開始後，蘇維埃即宣佈與執行蘇維埃政府的任務：（一）組織蘇維埃政府；（二）擁護蘇維埃政權；（三）實行蘇維埃的政策；（四）向反革命進攻；（五）打通與海陸豐聯絡的道路；並即正式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建立工農革命軍；設立肅清反革命委員會；更公佈蘇維埃政策，主要的內容是：對於工人階級，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恢復並擴大省港罷工工人的權利，由國家照原藉津貼失業工人，一切工人都增加工資；對於農人，一切土地收歸國有，完全歸農民耕種，消燬一切田契租約債券，消滅田界，各村各區即日成立蘇維埃政權；對於貧民，沒收資產者的房屋給貧民住，沒收他們的財產救濟貧民，取消一切捐稅，債務房租，全市房屋為公有，沒收一切當舖，貧民的質物無價發還；對於士兵，國有的土地分給士兵失業人民自由耕種，組織士兵委員會。這些任務和政策，因為蘇維埃政權只存在三天，所以還沒有能夠完全實現，同時，就當時的政治環境和革命任務看來，有些部分也有過左過早的，應該避免提出的；然而能夠實行的政策也有不少已經實行了。

起義後，反革命的各派軍隊便立即聯合一致向廣州蘇維埃政權進攻，帝國主義者更以兵艦掩護敵人向廣州蘇維埃進攻。結果，廣州蘇維埃政權在廣東工人英勇血戰之後終於失敗了。起義的英雄張太雷即在戰役中犧牲了。廣州起義失敗後，反革命軍閥更殘酷地大批屠殺工人，被殺的不下七八千

人。廣州起義跟着工人階級光榮的犧牲而失敗了。

四 廣州起義失敗的教訓與意義

廣州起義爲什麼會失敗呢？失敗的原因是：由於反革命的武裝佔有極大的優勢，起義一開始，反革命便調動三師軍隊及民團向廣州進攻，並以軍艦掩護部隊的進攻；起義的工人武裝隊伍，沒有軍事經驗，這些隊伍都是在兩三天中編制與訓練出來的，有的還不能使用武器，雖然在作戰中工人赤衛隊拚死應戰；各帝國主義（英、美、日）且派遣海軍陸戰隊登岸幫助反革命軍隊向廣州進攻。這些就是起義失敗的客觀原因。

同時在共產黨領導機關方面，在領導起義中也存在不少錯誤：第一，雖然廣大的羣衆參加了這次的起義，但是羣衆中的工作還差，羣衆的組織和團結還沒有十分廣泛和鞏固；軍隊中的工作也不充分；在起義前沒有在工人階級中發動總同盟罷工；黨對黃色工會工人採取不正確的策略，使得黃色工會能夠利用來蒙蔽一部分工人來反對起義；沒有切實組織選舉的廣州蘇維埃以爲起義之機關；沒有在近郊農民中進行必要的工作，發動游擊戰爭，與工人起義配合起來；同樣沒有能夠使海陸豐的蘇維埃很快地以武裝力量來幫助廣州起義。第二，在起義開始後，沒有採取靈活的進攻策略向敵人進攻，沒有能夠立即靈活地首先的去佔領重要的機關，如兵工廠軍械局，沒有立刻去進攻與佔領反對者最重要的區域，使得反對者能夠從容不迫的集中力量向我們進攻，使得我們的起義隊伍，陷入防禦的地位。第三，軍事指揮方面還不能

統一，紅軍總司令部本身陷於動搖，張太雷犧牲後軍事上便失了統一的領導，此外，當形勢不利時，又沒有及時善於組織退却，保存力量（當時蔣起義隊伍靈活地在某種程度上退到海陸豐是有可能的），以致在起義失敗時遭受極大的犧牲。

廣州起義是在中國大革命開始低落的時機，廣州無產階級英勇的企圖以武裝起義來保持革命的勝利，但它沒有及時得到全國民族革命鬥爭的直接幫助，所以廣州起義終究是失敗了。然而廣州起義在革命的歷史上有它的重大的意義。

廣州蘇維埃的出現，開展了中國革命蘇維埃的旗幟，在中國蘇維埃運動上有着重大的意義，而且在東方殖民地革命運動中也有極重大的意義，它告訴東方被壓迫民族，蘇維埃不但在世界先進的國度中可以建立起來，而且在較落後的被壓迫的民族中也可以建立起來，依賴蘇維埃去取得民族的和社會的解放。

第二，廣州起義中，充分表現出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能力，說明了中國無產者的能領導中國革命貫徹到底，解放中國民族並進而解放廣大勞苦羣衆。

第三，廣州起義充分表現了中國無產階級與農民羣衆的革命聯合。過去廣大農民希望着城市工人的起義與領導，而廣州起義已給予了回答，蘇維埃政府提出了土地農民問題，使工農運動更爲密切的聯絡起來。

第四，廣州起義中，清楚的揭露了那些平日說漂亮話的政客軍閥的反對革命的面目。廣州起義失敗後，那些平日說漂亮話的軍人政客屠殺七八千工人，使他們的招牌完全

破產。

國際六次大會說：『大會認為將廣州起義認做自動的企圖是絕對錯誤的。廣州起義雖是中國革命過去時期中中國無產階級之英勇的退兵時的一戰，雖是指導方面有很大的錯誤，但是仍舊是革命之新的蘇維埃階段之旗幟。』

國際六次大會『告中國工農書』更說：

『廣州起義已經深入勞動羣衆的意識之中，這是中國工人之偉大的英勇的模範。將來廣泛的工農羣衆起義，組織在列寧主義的徹底堅決的策略之下，得着國際無產階級之贊助的——必定要成爲中國之勝利的十月革命。』

五 廣州起義失敗後中國革命進入低潮

廣州起義的失敗說明用武裝起義來保持革命既得利益，推動革命繼續前進的嘗試是失敗了。廣州起義失敗後，中國革命已經進入低潮時期。國際執委第九次全體會議曾指出：中國大革命的浪潮已經過去，『……在許多工業中心裏，因遭受反動勢力屠殺壓迫的結果，工人運動是有相當的消沉。』

無產者政黨的策略應該轉向領導羣衆的日常鬥爭，爭取廣大的羣衆，以準備新的革命高潮。國際在上述同一決議中這樣指出：『正因爲如此，現時黨的工作之中心，是在爭取幾千百萬的工農羣衆，對於他們的政治教育，組織他們，使他們圍繞着黨及黨的口號（沒收地主階級土地的口號，八小時工作制，統一中國，解放中國於帝國主義壓迫之下，推翻現有政權，工農獨裁制，組織蘇維埃）。』

可是有一部分革命黨人却沒有正確估計到當時形勢的特

點，而繼續武裝起義的方針，結果走向盲動主義，關於這一點，國際早就警惕了我們的。在上述同一決議中，國際說：『現時形勢之中的最大危險，就是，工農運動的先鋒，因為估計現時形勢的不正確而過於輕視敵人的力量，可以脫離羣衆而過於竄進，散亂自己的力量，而使敵人得以各個擊破。如果共產黨不了解羣衆與爭取羣衆之必要，如果它不能戰勝種種使它忽視準備羣衆到新的革命高潮之企圖，戰勝種種使它忽視準備當前的中心任務之嘗試，那麼，共產黨一定要被擊退而散亂自己的組織。』

由於對當時形勢估計的不正確，首先是過分估計革命敵人的崩潰，在廣州起義後，無產階級政黨的政策就沒有能夠充分地及時轉變，沒有充分的開展反盲動主義的鬥爭，於是盲動主義錯誤一直到中共六大大會（一九二八年八月）才受到重大的打擊。

五 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總結

一 大革命的意義

一九二八年國際六大代表大會論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革命鬥爭的事實時，曾特重地這樣指出了：『在這些事實裏，最重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事件，就是中國大革命。中國大革命，直接說來，是把數千萬人民捲入自己的漩渦，而間接說來，則把數萬萬人民捲入自己的漩渦，這些人山人海的羣衆，第一遭地以如此偉大的力量起來與帝國主義鬥爭。』

中國與安南印度鄰近交界，這更加大大提高中國革命的意義。最後，中國革命的進程本身，它的民權性質，及其轉變成無產者革命的必然性，整個在國際無產者面前，完全表明出中國革命底偉大國際意義。」

我們民族是這樣偉大的民族，在人口上，比起任何民族，佔世界第一位，這民族佔世界人口總數四分之一，這民族有四五千年文明的歷史，這民族在革命面前動員起來，是如何可驚的力量呀！而對於全世界文明史的發展，又是如何可驚的作用呀！就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說來，其動員的廣大，我們可以說，除了俄國十月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外，在歷史上，也還是沒有先例可比的。就這點來說，我們就可以知道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

大革命誠然是失敗了。革命的性質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民族的和土地的解放是沒有完成。雖則如此，然而中國廣大的革命民衆和一切革命戰士並不因此而悲劇而哭泣。因為任何一次革命的勝利成功，不會不經過任何挫折與失敗而獲得的。革命的發展不是直線的，而有其轉彎抹角的時候，革命的發展是曲線的前進，是螺旋式的向上發展，可是總的方面終會達到勝利的目的。大革命是失敗了，可是失敗就是成功之母，它留給了我們以寶貴的教訓，這種教訓是付了很大的代價換來的，這種教訓是中國一切革命戰士寶貴的財產，一切中國革命戰士都應該從大革命的經驗與教訓中去學習，爲着中國革命的徹底勝利。

大革命雖是失敗了，但它同時又教育與鍛鍊了所有參加大革命的革命階級。在大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廣大的民衆在

鬥爭中認識了自己的敵人和自己的敵人的一切陰謀詭計，認識了自己的朋友，認識了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真正能爲着他們的利益而犧牲而奮鬥到底。在大革命的風暴中，廣大羣衆的政治覺悟無疑的已經大大提高了，而廣大羣衆對革命的信心也因此而更堅定。中國民衆在大革命中也學習了戰勝敵人的各種鬥爭方法，從罷工罷課一直到武裝起義革命戰爭的鬥爭形式，都爲革命階級所使用過，這種鍛鍊，對於以後的革命發展顯然是有着重大的意義。大革命失敗後，蘇維埃運動首先從南方特別是大革命鬥爭特別深入的區域發展起來，顯然這是與大革命對於廣大羣衆的教育和鍛鍊有着密切的關係。所以列寧說：『革命是擁有多麼偉大的開明教育與組織的力量，革命數月總比政治停滯十年光陰所教育的公民，有時要更迅速而完滿。』（『革命政府與革命軍隊』）

革命力量是最偉大的力量，這一偉大力量在大革命中大大的發揚了。革命的力量摧毀着軍閥的營壘。在革命力量前面，軍閥望風而逃，帝國主義驚惶失措。在革命力量前面，英租界收回了，偉大的上海會一時在工人階級手裏。偉大的革命力量解決了最困難最危急的戰鬥（如汀泗橋，賀勝橋之役）。所以在革命進程中雖然不斷的發生着新的困難，然而依靠革命的力量就足以戰勝一切困難，克服一切困難。

中國大革命不僅在中國革命史上佔着最重要的一頁，而且在東方民族解放運動中起了領導作用。大革命推動了東方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同時大革命也說明了中國革命是破壞帝國主義統治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國革命也就是世界革命的組成部分。因爲中國革命的反對帝國主義，就直接搖動了帝

國主義的統治，當時中國大革命顯然給世界資本主義相對穩定以沉重的打擊。

所以中國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絕不是空空過去了的，它給予我們的寶貴的經驗與教訓正是以後革命勝利的財產。『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總演習，便沒有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勝利』，那末，我們這次大革命，便將成爲以後勝利的中國革命預演。

二 大革命中的各階級

革命是歷史的舞台，它可以清楚的表演各階級的特性和作用及其全部面目。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就是這樣表演了的。

第一，中國大革命是從工人階級的反帝鬥爭開始的（五卅和省港大罷工就是明顯的事實），而工人階級以廣州起義的『退兵時的一戰』收東了一九二五——二七轟烈的中國大革命。中國工人階級成爲中國大革命的先鋒隊，成爲大革命的骨幹。大革命中充分的表現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偉大力量，說明了無產者是革命最堅決和貫徹的領導者。

第二，農民參加革命的積極性及其爲中國革命的主要動力之一，也在中國大革命的過程中最鮮明的表現出來了。中國農民在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殘酷榨取下，迫得他們要起來爲革命而鬥爭；在北伐的戰爭中，農民積極的協助北伐軍擊潰了反動軍閥，在大革命遭受失敗時，農民積極爲保持革命已得利益而鬥爭，它在大革命中成爲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

第三，城市小資產階級，如小商人、手工業者，學生及城市小有產者，他們曾經積極參加過革命，然而在革命困難面前，他們時常會搖動猶豫。

『但是小資產階級搖動猶豫的態度，大部分是由於革命階級運動的力量來決定的，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鬥爭愈堅決愈激烈，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愈深入，則小資產階級愈能轉向左傾，愈能站到革命戰線上來；反之，如革命的階級及共產黨自己也表現動搖、不徹底、不堅定，則小資產階級愈傾向有產階級的營壘，反革命的營壘。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除自己的堅定與果決外，沒有更真實的領導小資產階級的方法。

『列寧屢次的說過：「誰要幫助動搖猶豫的人，必先自己開始便應當不動搖不猶豫。」我們是應當記着，社會之中既然發生了兩大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鬥爭，小資產階級便無論如何不能有自己獨立的策略；他或者和資產階級同道，或者和無產階級同道，無產階級應當明瞭小資產階級之搖動是不可免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它自己應當有堅決的政策，去以革命的方法解決目前的問題。』（中共八七告同志書）

在武漢時期，橫在革命面前，是有無數的困難需要克服，同時一部分較富裕的上層小資產階級者對於革命的展開，也感到相當的畏懼。這上層小資產階級者就極厲害的動搖起來了。而陳獨秀機會主義者的動搖，就幫助了上層小資產階級的代表者由動搖走到變節。

第四，大革命最清楚暴露了中國民族資產者的兩重性。因為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妨礙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他們需要

革命，他們可以參加革命，可是當革命運動的發展超過了資產者所能控制的範圍，在帝國主義威脅利誘下，它又離開革命，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妥協，回頭來反對革命。中國革命的歷史，首先是大革命的過程，完全證明了這一論斷。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曾經領導過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曾經參加大革命，如在五卅運動中與北伐過程中。但它參加革命的目的，固然一方面是希望在某種程度上解除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壓迫，他一方面是在於控制這一革命，奪取革命的領導權，以限制革命的發展。因而，在大革命進一步發展，特別是上海三次起義後，他們就離開革命，而與革命為敵了。

第五，大革命中暴露了帝國主義、買辦、豪紳、大地主、軍閥的狰狞面目及其反對革命的陰謀，證明了他們是中國革命的殘酷的敵人。

大革命的任務，首先是打倒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最堅決的反對中國革命，它使用着破壞中國革命的一切可能手段：直接出兵干涉，屠殺政策，威脅利誘，組織與援助中國軍閥，抵抗革命的進攻，組織革命營壘中反革命力量，來破壞革命等，而當時一切手段特別是注意於陰謀分裂民族統一戰綫。帝國主義成爲中國所有反革命的靠山，成爲反對革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然而帝國主義內部仍有衝突，雖則反對中國革命是一致的。大革命時，主要的是反對日英帝國主義，可是當着革命的刀鋒集中到英帝國主義時，日本帝國主義便暫避革命的路芒，正因爲如此，所以大革命會利用過帝國主義的衝突而首先打擊了英帝國主義。但無疑問的，革命的發展，正證明日帝國主義者却是中國民族最主要的敵人。

中國買辦資產階級是隨着帝國主義的侵略而產生的，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與帝國主義在華的利益大體上是相符合的，因而反對帝國主義也就損害到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這樣就決定了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可是，當着革命開始時，其中一部分，爲着企圖腐爛革命內部，從革命內部制止革命的發展，同樣可能混進到革命陣線中來，而冒用國民黨的名義，藉口『反共』以反對革命，破壞革命統一戰綫。

豪紳地主是封建勢力的代表者。大革命鬥爭的深入就將要掃除封建殘餘，因而他們是堅決反革命的。可是，在革命開始時，同樣爲着企圖從革命內部來朽爛革命，制止革命的發展，仍可有一部分混進革命陣線中來，和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者同樣，冒用國民黨的名義，藉口『反共』以反對革命，破壞革命統一戰綫。

軍閥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產物，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的上層政治建築，是革命的主要對象之一。但在大革命『打倒軍閥』的威力下，有些軍閥都一變而冒稱爲國民黨的『忠實信徒』。這是由於革命的力量使得軍閥無法抵抗，同時影響到其內部的動搖，於是有的就爲着保持他們自己的勢力和地盤，爲着利用革命來擴張其勢力地盤，或者在帝國主義者的政策陰謀下，就轉到革命營壘中來了。他們曾企圖在革命內部來反對革命，特別是革命形勢不利時，軍閥便露其原來面目暴露無遺了。我們對於一些軍閥的投向革命旗幟下，不是採取排斥的態度，而是應該採取適當的方法，使之有利於革命，並相機將他們率領下的部隊加以徹底的改造，加強這些部隊的教育，改變其成分，使之革命化，

使那些軍隊成爲革命的武裝力量，此外應該活用他們的『革命』，而在他們統治下的區域開展革命運動。

三 大革命失敗的原因

中國共產黨六大大會曾指出過大革命失敗的原因：

『中國革命雖然最初有很大的發展，終於受了失敗，革命在這一歷史階段裏，沒有充分的力量戰勝當前的許多困難，這些客觀的困難和原因之中，應當說到：

『一、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帝國主義，是一切反動力量的組織者和支配者。帝國主義利用自己政治上經濟上的威力，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做些小小的讓步，威逼利誘的分裂民族聯合戰線，用賄買軍閥的舊方法，用武力的炮艦政策壓迫革命，實行經濟封鎖，利用自己的強大威力（銀行、公司、軍艦、軍隊等）——造成阻礙中國革命發展和勝利的最嚴重的困難之一。

『二、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的聯合戰線。資產階級在革命的初期是參加革命的，這一事實早已伏下它必然要退出革命戰線的叛變。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暫時削弱了革命的勢力而加強了反革命的聯盟。

『三、中國軍隊是僱傭軍隊，這是中國軍閥的特點。因此，反動派有着數量上很佔優勢的武力，許多地方這種武力是足以決定勝負，革命曾經利用這種軍隊，可是這些軍隊的軍官都是豪紳地主的代表，他們兵士羣衆大多數人已脫離了生產的羣衆，和工農的聯繫比較很弱，當時軍隊還是豪紳封建地主及資產階級的馴服的工具。

『四、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中國無產階級實行嚴重鬥爭的時候，農民運動才開始發展（例如五卅或上海三月起義時）。中國工人階級本身組織太弱，又是很分散的、它的力量並不充分，可是很早就加入政治鬥爭的舞台。首先受着反動的歷次打擊，沒有得着農民方面及時的贊助，中國工人階級沒有能等到農民運動發展到羣衆的廣大的規模就受着打擊而失敗。地域上革命的爆發也不平衡，南方的廣東、湖南、湖北，農民已開始推翻豪紳地主的政權、沒收地主的土地，有些地方已開始分配土地，可是，在北方，那時農民才開始鬥爭，還在開始解放運動的嘗試。這種情形，當然使資產階級封建豪紳的反動更加容易實行自己的任務。

『五、城市上層小資產階級，極大部分是和半封建土地關係有密切的聯繫，並且和外國資本家相當關聯，這種小資產階級分子動搖而背叛革命。當反帝國主義運動及土地革命急劇進展之中，這些小資產階級日益動搖，而終至於投降到豪紳資產階級的反動營壘裏去。

『六、機會主義的錯誤：

『（甲）然而客觀上的困難，並沒有完全決定中國革命必然要失敗的力量。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認為：中國革命失敗主要的原因，就是當時無產階級先鋒的共產黨指導機關的機會主義政策，當革命危急存亡的關頭，離開布爾塞維克路線的機會主義政策，客觀上簡直是背叛正在鬥爭的勞動羣衆的利益。這種機會主義的政策，最先是由於中央委員會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及聯合戰綫的任務有不正確的觀念。不能保持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不能對於革命同盟者實行階級的批

評，不去動員革命力量，以求戰勝自己的暫時的同盟者之反動的企圖，有時候反而阻止羣衆運動的發展，以遷就自己對於聯合戰線的不正確的觀點，這樣，中國共產黨當時的指導機關，就使中國革命受着不可免的失敗。

「（乙）當時共產黨指導機關，不去發展土地革命和羣衆的階級鬥爭，却只做上層勾結工夫，隱蔽階級的矛盾，不去爭取軍隊，不去武裝工農，不能利用參加政權機關的機會去爲羣衆謀利，所以在緊急關頭不能打破敵人的包圍——實際上是斷送了無產階級的領導。這都是機會主義的最高表現——尤其是馬夜事變的政策是最可恥的機會主義的表現。

「最後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未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這樣也便使英勇鬥爭的工農竟至於失敗。」

四 大革命對於我們今天的教訓

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度，中國國民革命要戰勝自己強大的敵人——民族的敵人，必須善於最廣大地集中民族的力量和最廣大地動員民族的力量。大革命中的國共合作和工農生活的改善運動，就是這種集中力量和動員力量的途徑。國共的合作，造成了大革命勝利的發展，這是不可爭辯的；而國共合作的分裂，造成了大革命的失敗，這又是不可爭辯的。今日殘酷地進行滅亡我民族的日寇，就是當年最積極地陰謀分裂國共合作的（這本是日本特務機關所公開承認的）。不幸，當權政黨的當時一些人物缺乏政治的遠見，竟中了敵人的陰謀，實行分裂的政策。沒有那一度的分裂，決不會有大革命的失敗，沒有大革命的失敗，日寇是不敢那末

輕易進行「九一八」的強盜行竊的。創鉅痛深，這是需要當年有關的人物深長反省的。

當時國共合作，是在革命很困難的環境中進行的。這兩黨的合作，曾共過了許多患難，克服了許多困難。在患難中，中國共產黨曾盡了「患難之交」的極高友誼，幫助了國民黨的組織和力量的鞏固和擴大。中國共產黨，用自己一切的力量和方法幫助了國民黨鞏固廣州革命策源地，統一廣東，進行北伐。共產黨在最困難的戰役中，在民衆革命潮流中，用了極高度的犧牲精神去挽救革命的危難，爲革命的前導，這就是國民黨人也很多是異口同聲的，正因爲共產黨在國民革命中是這樣堅強的力置，是國民黨最好的患難之交，是最大公無私和克己爲友，是這樣幫助國民黨力量的伸展，所以帝國主義者就用一切方法，來進行挑撥離間，用「反共產」的口號，來離間國共合作，來陷害國民黨忠真的革命戰士和領袖（如刺死廖仲凱先生）；正如當時蔣介石先生在追悼廖仲凱先生時所說的：「現在我們的環境非常險惡，處在四面楚歌之中，最厲害的是帝國主義用反共產黨的口號，來離間我們同志，中傷我們同志……」。也就是因此，所以當時蔣介石先生與汪精衛先生都在廖先生被刺後一致地認爲要繼續國民革命，就「應當與反共產派的人爲敵」，他們警告大家，要識底覺悟，不要中敵人的奸計。

蔣介石先生在廣州軍事委員會議演說時，對於帝國主義者的陰謀詭計，曾有一段痛切的演說：「外國資本帝國主義是一樣什麼東西呢？好如毒蛇身軀美女頭面的一樣怪物，苟有人和他一會流淚顧盼，其結果必至喪身亡國。我革命黨人

應澈底知道外國帝國主義與軍閥勾結，縱橫捭闔，其用心之險惡，總是令我們中國人自相殘殺，他好實收漁人之利。」不幸的，在大革命過程中，帝國主義者這種陰謀詭計，竟造成了國共合作的分裂，並造成了國共的自相殘殺。而結果最陰險狠毒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就起而實收漁人之利。

國共的分裂，首先是我們全民族的受害，這是無疑問的。同時，國共分裂以後，共產黨及社會中最純潔最精明強幹，敢作敢為的分子，固然遭受非常不幸，然而這不能看為一黨一派的不幸，而同樣地是全民族的不幸，因為那死者受難者，都是民族的精華，民族靈魂的寄託者，是費了民族許多力量，才培養出來的。再則，分裂以後，受害的也決不只是共產黨，同樣地是國民黨。國民黨是由於國共合作壯大起來的，因為國共合作，國民黨力量才大大發展起來。十年中國國民黨雖則是統治的政黨，但我們可以說：國民黨組織的發展不但沒有超過大革命國共合作的時代，而且反而要減少得極多，這正是因為國民黨因國共分裂而和羣衆失掉了聯繫，同世，一切腐化分子，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甚至有些賣國賊，都乘機加入國民黨，借國民黨名義以營私誤國賣國，進行剝奪國民黨的革命生命，甚至許多在國民黨統治的地方，竟連國民黨的組織都沒有，或者簡直不要國民黨的組織，這都是在國共分裂以後才有的現象的。

革命需要領導，而這種領導的必要，是為了能保障革命的勝利和發展。那一個政黨能在政治上進行這樣的保障的，就可以保障其在革命中的領導。可惜的，這點沒有被當年缺乏政治遠見的人所認識。當年關於領導權的爭取，事實上，

就是關於國民革命前途的爭取（或則使革命中止下來，半途而廢，使國民革命的事業重新失敗，或則使革命繼續擴大和深入，使國民革命的事業澈底勝利）。這種爭取，當然是不能免的，在革命方面說，還是必要的；但是這種爭取，在革命統一戰綫的營壘中，應當採取和平的，政治的方式，應當歸之民衆的政治的公決；而一切合作的政黨要珍重自己的革命生命，珍重民族的前途，就要尊重民意的公決，而不應對於民族統一戰綫進行武力的分裂，更絕不應反戈來屠殺革命黨員和工農大衆。但當權政黨當時的一些人物，不幸的，竟實行這種武力分裂的政策，使民族鑄成大錯。

當時中共領導機關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却又是相反地對於這問題採取完全消極的態度，錯認無產階級在革命中應當追隨資產者的尾巴，喪失自己政治上與組織上的獨立；當資產者表現其變節的搖動的時候，陳獨秀機會主義不能拿定立場去防備它這種變節，不能把工農利益的發展與國民革命的發展結合起來，不能發展革命的力量來保衛革命的力量；反之，却事事遷就資產者變節的企圖，分裂國民革命與發展工農利益的關聯；而在革命最緊急的關頭的時候，即解除自己的武裝，表現完全沒有辦法，臨陣脫逃。在事實上，陳獨秀正是幫助了革命統一戰綫的分裂。這對於革命，對於民族，實是大罪惡。

大革命時，國共合作雖然規定了合作的鬥爭綱領，但還缺乏爲綱領鬥爭的堅持性，沒有根據綱領來更進而互相勸勉，互相督促，以求實行，來批評同盟者的動搖妥協的傾向與行爲，特別在武漢時期，中共上層領導機關甚至將國共合

作變為私人間的勾結，喪失無產階級政黨獨立的政治面目。這一錯誤教訓我們：無產階級與其他階級的聯合，也就是說統一戰綫的建立，要在一定綱領上形成起來，絕不是私人間的勾結，無產階級的政黨必須將這一綱領在國民中作深入的廣泛的宣傳，並動員國民為實現綱領而鬥爭，而共產黨就必須成為執行這一綱領的模範與先鋒，幫助同盟者對於綱領的實施，如果同盟者對於這一綱領的每一違背行為或動搖的傾向，都應給以善意的規勸，都要在羣衆中給予善意的批評，以國民的力量來求得綱領的澈底實現。

大革命中，不論是國外的與國內的敵人，其反對與破壞中國革命是一致的。但敵人中間仍然存在着衝突。這就告訴了我們：應該利用敵人間的這種衝突，使之有利於革命的發展，利用這一衝突以便集中力量去打擊最主要的敵人。斯大林指出革命的後備軍間接的有：「（一）在本國各個非無產階級間的矛盾與衝突，這些矛盾與衝突是可以被無產階級利用去削弱敵人的力量 and 加強自己的後備軍的；（二）與無產階級國家敵對的那些資產階級國家間的矛盾、衝突和戰爭（例如帝國主義戰爭），這些矛盾、衝突和戰爭是可以被無產階級在進攻時或迫不得已而隨機應變地實行退守時所用的。」（『列寧主義概論』）列寧也曾這樣指出：「要想戰勝更有力的敵人，只有用最大的力量，並且必須最謹慎周到，細心敏捷的，一面利用敵人間每個（即令是最小的）間隙，利用各國資產階級間各國內部各種資產階級間的每個利益的衝突。他方面利用每個（即令是最小的）可能的機會以獲得羣衆的聯盟者，儘管這個聯盟者是一時的、動搖不定的、靠不住

的，有條件的，都不要緊……。」（『左派幼稚病』）

最後，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的經驗與教訓也向我們指出：領導每一革命必須要善於根據形勢的變化來改變自己政策鬥爭方式與工作方法。

五 大革命經驗之歷史的總結

一般說來，廣州起義是革命的退兵一戰，但這不是簡單的退兵一戰。廣州起義要算是大革命經驗的歷史的總結。大革命有兩個基本的弱點：第一是沒有澈底推翻舊的國家機器——幾千年來最腐敗的官僚政治機構，特別如縣政府這種接近下層的政治機構，簡直沒有任何變動，這是便利於反革命的復辟的；第二是沒有根本改革舊的僱傭軍隊的系統，國民革命軍雖則有些嶄新的軍隊制度（如政治部、黨代表、軍民聯歡大會），但大體上却還保留了僱傭隊伍的個人系統，這也是便利於反革命的復辟的。革命曾企圖經過武漢政府的發展來糾正這兩個弱點，但因為武漢的迅速變節和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却沒有成功，而無產者領導下的廣州起義正是糾正了大革命這兩個弱點，指出了中國國民革命要得到澈底勝利之先決的條件，必要變更舊的官僚機構和僱傭軍隊系統，而創造直接民權和真正國民武裝。

關於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各階段的發展過程，一位世界革命的率領者在一九二七年八月，曾給了以下的描寫：『如果第一個階段底特點，在於革命底鋒芒，主要的是反對外國帝國主義，那末，第二個階段底特點，却是這麼一個事實，就是革命用自己鋒芒，主要的去反對國內敵人，首

先就是反對封建主，反對封建制度。第一個階段是否解決了推翻外國帝國主義這個任務呢？沒有，沒有解決。它把這個任務遺交於中國革命底第二個階段去實行。它對於革命羣衆只給了第一次推動力，推動他們去反對帝國主義，以便結束自己的運動，並把這件事業移交於將來。應當設想：就是革命的第二個階段，也不能完全解決驅逐帝國主義者出中國的任務；它對於中國工農廣大羣衆給予更進一步的推動力，推動他們去反對帝國主義；但是它進行這件事業，爲的是要把這件事業底完成移交於中國革命以下的一個階段，移交於蘇維埃的階段。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難道大家不知道，在我們的革命歷史上，雖然在另一種環境裏，在另一些條件下，也發生過類似的事實嗎？難道大家不知道，我們革命底第一階段沒有完全解決自己的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務，而把這個任務移交於革命底下一個階段，移交於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就完完全全地解決了剷除封建殘餘的任務。因此，如果在中國革命的第三個階段上不能完完全全完成土地革命，如果革命的第三個階段，推動千百萬農民羣衆，喚起他們反對封建殘餘，而終於把這件事業的完成移交於革命底下一階段，移交於蘇維埃的階段，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這對於將來的中國蘇維埃革命只有好處。」

這段生動的描寫，表現了這位世界革命的率領者如何天才地把握了革命過程每個具體的環節，而且表現了他極深刻的天才之歷史預見。這種預見是和中國實際的鬥爭結合起來，雖則這實際鬥爭是極曲折，極變化萬端的。一個歷史週期過去了，歷史還沒有做到完成，民族情勢的突變使得人們

要更換題目來工作。我們現在轉到另一個歷史新週期。簡單重複了歷史是沒有的，然而歷史或會叫人根據新的工作，新的經驗，在不同的時間下，在不同的方式下，在不同的規模下，把舊的歷史經驗靈活地溫習一遍。而這對於中國民族只有好處。

勘 誤 表

頁數	行數	錯	正
9	7	取據	取的
	8	根英	根據
	11	而旋	而對
	12	，的	，旋
	13	廣西并	廣西被
	14	三月對	三月英
	15	訂被	訂立
	16	交換調	交換并
	21	停有功	停戰有功
18	15	上江上游	長江上游
22	10	擴大羣衆	廣大羣衆
23	17	巧矣哉！	慘矣哉！
25	14	這種理想社	這種理想社會
30	13	進積極幫助	的積極幫助
	14	的攻下失敗了。	進攻下失敗了。
	末2	主義 (編者註)	主義——編者註)
35	17	大連、旅順 地。	大連、旅順各地。
	末3	及營口爲爲	及營口爲
41	末4	曾有從邏羅	曾有從暹羅
44	15	具體的辦法就是：	具體的辦法就是：扶
47	9	明治維新 樣	明治維新一樣
55	7	九龍	廣九



A541 212 0019 1044B

頁數	行數	錯	正
55	末5	僅有古綏	僅有平綏
58	15	利用帝國	利用中國
59	末5	(九〇五年開辦，	(一九〇五年開辦，
67	末2	工程營首先	——工程營首先
69	7	西藏、青海	西藏、青海……
96	末5	活動性	活動性
97		(第一行前，漏掉一行)	相的)工頭制度、或利用流氓頭目來搗亂工人階級的團結，
98		(第一行前，漏掉一行)	國際創立後，在共產國際的積極幫助下，推動着中國無產階級
100	10	宣共產黨章程；	國共產黨章程；
	11	國言沒有討論	宣言沒有討論
120	末2	國民黨的基礎，	國民黨的基礎，
131	1	張國燾、毛	張國燾、毛澤東、瞿秋
137	13	中國共產黨於會	中國共產黨於一
	14	四次大一	四次大會
151	13	收回會審公廨	收回會審公廳
152	3,4,6,	會審公廨	會審公廳

1610429



东安书店

蔡东安市场旧书店
册数
定价 70